



圆 明 园 丛 书
圆 明 园 劫 难 记 忆 译 丛



译丛主编：[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Négoci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en 1860

黄皮书日记

BARON GROS

[法] 葛罗 著

赵勤华 译

中 西 書 局



上架建议 历史/回忆录

ISBN 978-7-5475-0157-3



9 787547 501573 >

定价：25.00元

圓 明 園 叢 書
圓 明 園 劫 難 記 憶 譯 叢

译丛主编 [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Négoci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en 1860
黄皮书日记

BARON GROS

[法] 葛罗 著

赵勤华 译

中 西 書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皮书日记/(法)葛罗著;赵勤华译.

—上海:中西书局,2011.1(2011.3重印)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布立赛,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主编)

ISBN 978-7-5475-0157-3

I. ①黄… II. ①葛…②赵… III.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史料 IV. K25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667 号

圆 明 园 丛 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黄皮书日记

[法]葛 罗 著

赵勤华 译

责任编辑 张安庆

助理编辑 毕晓燕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157-3/K·026

定 价 25.00 元



出版前言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永远的伤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150多年的精心营建，占地350公顷，建成了200多座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和园林，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中除了中式宫殿和园林之外，还有乾隆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47—1759）间，由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著名宫廷画师、建筑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设计建造的西洋楼。王致诚在乾隆八年（1743）11月1日写回法国的长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夸赞，称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这封信及其内容，对18世纪欧洲大陆卓兴中国园林之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建筑学家邱治平在《圆明园》一书中对圆明园的价值作过一番相当精到的评论，他说：“圆明园堪为世界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材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浩繁，显示出

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称为文化艺术博物馆。”布立赛先生则用更易为人们理解的比喻作了评价：其价值远远超过现在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总和。可就是这样一座其中也包含着法国人、意大利人智慧而设计建造的圆明园，却毁在了欧洲强盗之手。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法兰西两国，为何要派遣“远征军”征战中国，劫掠并焚毁早已被欧洲人推崇为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联军多少人马？海军、陆军、骑兵怎么组成？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两军如何协调？深入中国的联军后勤保障如何保证？战争期间，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战争经过怎样？在英法军人眼中的清朝政府、清军部队、中国民众是怎样的状态？等等，这些情况，在中文的历史记载中只有泛泛的语句、概括性的言辞。因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英法联军在 1860 年劫掠和焚烧了圆明园这样一个概念性的结论。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没人能够解答。因而有无数的国人甚至是非常有名望的专家学者都误认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是八国联军。就这样，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一系列细节、过程……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淡去了，国人的记忆也就模糊了……

2000 年 10 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参观了颐和园后，来到了圆明园。圆明园里的一片废墟、苍凉空地，深深地震动了这位法国学者。2003 年，布立赛先生在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揭开了被西方主流社会刻意掩盖了 140 多年的历史真相。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了解，到 2010 年 6 月，法文版《1860：

《圆明园大劫难》已经累计销售2万册。2005年9月,因法国《欧洲时报》的支持和推荐,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期间出版了中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关注。在与圆明园渊源甚深的达园宾馆举行的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布立赛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中国文化深厚的爱,展现了他无尽的中国情结,并对英法联军的反人类、反文明暴行表示强烈谴责。他说:“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19世纪帝国主义掠夺完全一脉相承。”“1860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布立赛先生在会上表示,希望和中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愿意把他撰写《1860:圆明园大劫难》所依据的英法联军将军、医生、翻译、外交官、士兵等人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提供给中国学者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15种亲历记录:英军7种,法军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

中西书局立足“中”“西”二字,非常关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观念差异和交流、摩擦、争吵、战争等各种形态,十分重视本译丛的编选、翻译、编辑、审校和出版工作,特别约请著名翻译家许钧和王大智、汪洪章、应远马等先生承担翻译重任。

这些图书,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异常珍贵和重要的。因为它们亲历者在战争结束后的1860—1875年间出版的战争回

忆录，比如联军统帅英国将军格兰特就是在1875年7月审定回忆录书稿校样后去世的。有的是亲笔撰写，有的是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有的是口述记录，较为真实可信，且叙述细致、丰富。布立赛先生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前言》中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诚然，这15部回忆录，不仅有表达人类正义，回国后真诚悔恨，认为战争可耻的——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更多的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对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中国民众的丑化等。如法军上校杜潘说，联军占领天津后，当地“居民都能够理解我们远征的目的——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大肆破坏这个国家，而只是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又如葛罗在回忆录中记述联军的共同说法：联军并没有像恭亲王所说的那样洗劫了这座宫殿，只是根据战争法，分享了战斗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夏宫后来遭到洗劫并被部分烧毁，那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盗匪所为。此外，也有对中国与英法文明差异和观念差异造成冲突的非常详尽的客观记录。在记叙中，不仅存在着史实的误差，也存在着观点上的问题。比如，法军首先进攻并抢劫圆明园，但举火焚烧圆明园的是由米启尔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师。这个观点，中文史料也有相同记载，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布立赛先生都已采信，也已被一些中国学者采纳，并在其著作中作出表述。但是，译丛中的多部回忆录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法军虽然反对焚烧圆明园，但他们主张应当焚烧紫禁城。因此，英法侵略军的罪孽是同等深重的，恐怕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外学者依据中文、英文、法文，以及俄文、日文等相关文种

的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对英法各自的历史罪孽、历史责任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抢劫已然可恶，焚烧罪孽更深！又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蒙昧时代在 9600 万年之前；将钦差大臣所携关防误认为是皇帝玉玺；在引用清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时，将其他清朝官员误认为早已革职查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另外，还有不少将地名、人名拼写错误，如将同仁堂误为同济堂等等。这些误差和错误的存在，深刻表明了，当时的英法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很不了解，存在很多的误区。为了完整地向学界呈现回忆录的原始状态，提供回忆录记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存真原则，照实翻译，照实编辑，照实出版，希望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注意辨别，并注意对关于美化侵略战争、丑化中国的言论，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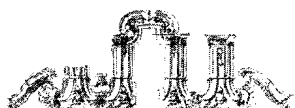
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主任十分重视圆明园史料研究，积极支持并承担了全部出版经费，资助中西书局选编、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供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了解这一段惨痛历史。相信此译丛的出版和其他圆明园研究成果的刊布，有利于圆明园管理处查找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线索，推进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许钧教授帮助审核译稿，纠正了一些译稿中存在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错误。值此译丛正式付梓之际，谨向圆明园管理处及陈名杰主任和三位教授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推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纪念圆明园罹难 150 周年，还原历

史真相和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祈福未来，为共建人类和谐未来而努力。

中西书局

2010年9月28日



序 一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 1995 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 10 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 150 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 8000 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

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 1860 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 现任参议员
巴黎 2010 年 7 月



序 二

今年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上海中西书局的来函，信中提出希望翻译出版一套由当年参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官兵撰写的战争回忆录。

2010年10月18日，将是北京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日。

本人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于2003年末在巴黎出版。经由徐忠良先生的倾力相助，该书的中文版于2005年夏天在中国顺利出版发行。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该书附录的150余种参考书目中精心挑选出一批较为重要的书稿，撰写者包括当年亲历战争的著名军官、外交官、翻译官、记者、军医等等。

这套丛书中首先当推法军首领库赞·蒙托邦将军所著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因其在1860年9月21日率军攻占八里桥时的卓越表现，蒙托邦将军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之爵位。但由于种种因素困扰，此书在其完成70年后，也就是1932年，才由蒙托邦将军之孙付梓刊行。

此时蒙托邦将军过世已久，在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曾经多少次我提起笔想把当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在已经出版的有关此次远征的书籍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或无意地对这次远征行动的曲解，

每当此时，我就更急于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付诸实施。”这段文字没有注明日期，但应当是写于他临终之前。作为远征活动的幸存者，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但最终，八里桥伯爵也未能如愿。

人们不禁怀疑其中的隐情。当年，对于他率领法军抢劫圆明园的行为，舆论界始终毁誉参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于他的儿子(1889年去世)，也无法做出是否要坚持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决定，想必，他是害怕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

丛书也收录了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他是当年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黄皮书(等同于英国的蓝皮书)汇集了当年的外交事务信函往来，内容涉及中法两国在1860年间的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葛罗男爵是一位极其坦诚的人，性格温和沉着，并与中国清朝的钦差大臣恭亲王相处融洽——这与他的英国同行、傲慢的额尔金勋爵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为英法联军的翻译，年轻的埃利松伯爵也从另一角度见证了这次远征行动。他的行文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披露了远征行动中大量的细节与内幕，他笔下对圆明园的描写尤为出色。但由于此书字里行间对英国同盟军做了非常不客气的叙述，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这本《翻译官手记》推迟到1886年才得以在巴黎出版。

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暴徒，他从北京圆明园掠回了大批的艺术珍品，并于1862年在德鲁欧饭店大肆拍卖。然而他的这本《远征中国》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当年英法联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疯狂抢劫圆明园的可耻行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此并无丝毫羞耻之心。

海军上尉帕吕在《远征中国纪行》中以一个海军军官独有的视角

展现了这次军事活动。如果当年没有海军的从旁协助，这次远征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实现。在法国，他以一名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此外，贝齐亚上尉的《中国之役：1859—1861》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正是他以一种异于大多数盟军战友的口吻，首次使用了“劫掠”一词，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定性为犯罪行为。

作为随军医官，阿道尔夫·阿尔芒著有《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他通过大量的信件，试图以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描述陌生的异国世界，此书内容的有趣之处远非其简单的书名所能体现。

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远征军前往中国，他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以监督军队的军事行动。他的法语书名同帕吕的如出一辙，内容也均出自官方的书面报告。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国家军事行动的部署和考虑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一书汇集了大批被法军从北京圆明园掠回国内，并奉献给当时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艺术品。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被展示在枫丹白露城堡的一个侧殿，距巴黎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此类作品众多，我尽量从中选出最具历史价值的，最富教益意义的文稿，并努力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其实还有很多较好的文稿，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内，尤其是吕西·阿尔芒的《远征途中的私人信件》、弗达比翁的《中国的战争》、远征行动结束后病逝于中国天津的柯利诺将军所写的《回忆录》，以及夏西隆、莫特雷西、盖互雷、拉弗雷的手记，等等。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套丛书未能收录诺戈尼的《中国战事记忆》一书，该书已经绝版，或许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能觅到它的踪迹。远征结束后，随军官员约翰·路易·德·诺戈尼带着大批令人

瞠目的赃物回到法国，并对这种偷盗行为百般辩解，声称他是向北京的中国军人以及商贩购买的！为此，他还编写了一本图册目录。对这部分内容，中国的读者也许有较大的兴趣，从中可以了解当年被英法联军夺走的文物细目。也许将来某日，我们可以看到此书的出版……

伯纳·布立赛

巴黎 2010年9月19日



序 三

咸丰十年（1860）十月，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惨痛的文化劫难。但是，西方的学者不愿意正视历史，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而中国的学者，由于缺乏有关的史料，特别是英法联军方面的史料，无法对侵略者的罪行进行充分的揭露。14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关于这场文化浩劫的论著问世。

2000年10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来到了圆明园遗址，一代名园的残垣废墟及其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为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也为身为法国人而深感羞愧。回到巴黎，他想更多地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在查阅图书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很少，更没有一部关于圆明园的专著。于是，他决定写一部论述圆明园的史书。他多方搜集当时亲历这场侵华战争的将军、士兵、外交官、翻译官以及随军的医生、牧师、记者等留下的文字记录，进行深入研究，并多次到中国考察收集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这场文化浩劫的力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文版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人民群

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和批判了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他们购买了该书中文版的版权并无偿提供给浙江古籍出版社使用，并帮助组织专家进行翻译，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出版。

2005年8月3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法国《欧洲时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皇家大饭店隆重举行《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首发式。我应邀参加，见到了伯纳·布立赛先生，并得到了由他签名的赠书。

2005年9月5日，我参加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达园宾馆联合举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伯纳·布立赛先生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愿意将他手上所有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和资料提供给中国的专家学者，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再写一部关于圆明园的史书。先生的慷慨，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英文、法文的书籍和资料，能够阅读的人不多，影响有限。翻译出版，工作量很大，而且不会像畅销书那样得到高额的回报道。在注重经济效益的今天，谁愿意为一座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的皇家御苑作出牺牲呢？

但是，社会总是要发展的。伯纳·布立赛先生已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面的路，有识之士会继续走下去的。为了表示感谢，我将由我主编的一部近一百万字的关于圆明园的大型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1999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赠给了伯纳·布立赛先生。

2005年10月，我收到了徐忠良先生寄来的《圆明园图书系列计

划》，其国外部分就列入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附录的 150 多种英文、法文图书目录，准备选择其中“有价值且不雷同的予以翻译出版”，希望我帮助筛选。读了这个计划，我对徐忠良先生的见识和魄力深感钦佩。身为清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如此盛举，岂能置身事外？就我所知，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2007 年，是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这年 4 月，徐忠良先生来到北京，约我主编一部反映 1980 年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争论情况的书。篇幅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相当，装帧风格也与之相似，书名定为《圆明园重建大争辩》。我 5 月交稿，10 月 17 日晚，徐忠良先生就将还带着油墨芳香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200 本，送到定于 10 月 18 日上午开幕的纪念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场了。

后来，徐忠良先生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我担心计划会因此搁浅。2009 年 9 月，我看到了由徐忠良先生拟定的《圆明园图书出版合作方案》，提出备选图书 14 种，准备将其中的 10 种翻译出版，以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2010 年 6 月，我因公到上海调研，见到了徐忠良先生并看到了刚刚制定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出版方案。列入方案的图书，英文 7 种，法文 9 种，其中两种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审阅备选书目后增加的。16 种原著，均由伯纳·布立赛先生提供。期待已久的这套历史亲历记忆译丛终于可以得见了。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在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之际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为伯纳·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恨战争这一苦难之源。”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中法两国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践行“记忆责任”的结晶。它不仅可以推动有关圆明园历史的研究，提高人们对圆明园的认识，而且可以推动中法文化交流甚至中西文化交流。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具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多。如果“记忆责任”也成为普世价值，世界和平还会远吗？

王道成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



序 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统称圆明园。占地 352 公顷(5280 亩)，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 公顷(2100 亩)，有园林风景 100 余处，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是清朝六代皇帝在 150 余年间倾心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汇集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胜景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有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值得一提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占地 100 多亩的西洋楼。那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意大利建筑师、宫廷画师郎世宁等人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最有名的“大水法”，主体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黄花阵等著名建筑。总之，圆明园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优秀造园艺术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景观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

到和谐完美。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也是一座收藏极为丰富的皇家博物馆。园内各殿堂内陈设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收藏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内珍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文献。文源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曾对 18 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的中国园林热潮，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凝结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世界名园却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最终沦为一片废墟！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惨痛劫难，更是人类文明史的空前浩劫。同时，又是中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一种激烈碰撞，给中华民族留下痛彻心肺的残酷记忆。圆明园犹如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史册，具有撼人心魄的价值，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的伤痛，也成为了中华志士仁人雪耻奋起的警世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为积极保护圆明园遗址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1976 年，中共海淀区委、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1980 年 8 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园林、文物、美术专家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并发起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983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式确定将圆明园遗址整修为遗址公园。1988 年 1 月，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 年 6 月，圆明园又成为全国 100 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0 年和 2001 年，《圆明园遗

址公园规划》分别获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长期不懈的努力，遗址的保护整修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绮春园、长春园、福海、九州四大景区，既有浩瀚的大型水面，又有亲切可人的湖泊，更有山水环绕的河溪，保持了水体的天然风韵，又按原有的植物配置，形成了以松、竹、荷、柳为主题的植物景观。近年来，又陆续完成了含经堂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工程、圆明园唯一残存古建筑——正觉寺修缮主体工程、西部九州景区的保护展示等工作。至此，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圆明园遗址向社会公众开放。

圆明园管理处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机构，既是遗址的保护者、整修者，也是圆明园的研究机构和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积极寻访者及圆明园历史文化的宣传者。圆明园管理处充分认识到圆明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多重意义：它不仅具有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历史文化价值，更寄托了全世界华人的一种特殊情感。长期以来，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关注圆明园的历史、建筑、园林、文物等基础研究工作，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开展各方面的研究、考察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并与专家学者和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网络媒体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套由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圆明园管理处新近支持和合作出版的重要研究史料，并以之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

中西书局的徐忠良先生，作为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术委员，自 2005 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间组织翻译出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来，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圆明园，先后组织出版了著名圆明园历史学家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和著名建筑学家郭黛姮教授撰著的《乾隆御品圆明园》、《圆明园样式雷研究》等重要图书。他调到上

海中西书局工作后，紧紧抓住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的历史时机，又与布立赛、王道成先生和圆明园管理处以及即将成立的圆明园研究院联手，精心编选英法联军将军、外交官、翻译官、一线指挥官、医官、牧师等关键人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出版的战争回忆录 16 种，予以公开出版，力求为圆明园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多年来，圆明园管理处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积极关注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寻访、回归和修复，致力于圆明园遗址的考古、整修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展览展示。如 2009 年圆明园管理处发起组织的赴美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工作，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发现 400 多张文物照片，寻访到一些圆明园文物，带回一批中西文的圆明园研究资料。2010 年 10 月，正值各界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原流散在北京地区，现已回归圆明园内的珍贵石刻文物首次集中向游人开放；持续修复了半年之久的 150 件圆明园文物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科技史上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样式雷图档，真实再现了圆明园的建造史；法中友好协会将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第一位痛斥英法联军恶行的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雕像；同时，我们将举办大型主题纪念晚会，通过“文明的对话：梦回圆明”、“世纪的交响：沧桑巨变”、“盛世的复兴：和谐起航”三个篇章来表现圆明园 300 年的沧桑巨变，展示和谐盛世给圆明园带来的勃勃生机；将邀请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和著名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圆明园遗址前对话圆明园；我们还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起举办了“勿忘国耻、励志腾飞——中国航天成就展”等活动。

诚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历史学家布立赛、王道成先生的

序言和中西书局的出版前言所言，我们几方面倾注巨大心力和财力，精心组织编选、翻译和出版的这套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在1860—1932年间或亲笔撰写、或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或根据口述记忆笔录的亲历回忆录，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细节，追寻历史真相，实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提出的“记忆责任”；是为了进一步反思历史，倡导和平，营造一个“勿忘历史、倡导和平、憧憬未来”的文化环境；是为了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消除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误解，弘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决避免圆明园悲剧的重演。

圆明园管理处 陈名杰

2010年10月3日



内 容 提 要

远征军离法赴华后数月，让·巴普蒂斯特·路易·葛罗被任命为皇帝在华专员，当时他年事已高（67岁）。1860年是他第二次远征中国，早在1858年6月，他曾受拿破仑三世之命，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一起前往中国签署天津条约。再次赴华实属迫不得已。

1860年10月25日，他签署了被称为北京条约的和平协议，重申了两年前天津签订的条约内容。协议的主要条款：两国重建和平；清政府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增设天津为通商口岸（已有15处通商口岸）；持有领事护照的英法两国公民在全中国范围内可自由通行、贸易、买卖田地。

葛罗男爵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沉着机智，与其英国同僚额尔金勋爵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生性好战。对于英国人火烧圆明园的行径，蒙托邦将军和葛罗男爵均不赞同且强烈谴责。

《黄皮书日记》收录了葛罗男爵的日记和他的一些外交公函，展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国外交家的形象。

目 录

出版前言 / 1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 7

序二 伯纳·布立赛 / 9

序三 王道成 / 13

序四 陈名杰 / 17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 1

黄皮书日记 / 1

附录 选自新河村所发现的档案 / 156



北京协议 1860 年

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在按惯例呈交议会的蓝皮书中，公布了一些关于额尔金勋爵在中国完成两次使命期间的重要文件，伦敦几家报社还全文或摘要发表了这位特使的一些函件。

1860 年，奉帝国政府之命散发给参议员和立法团成员的黄皮书中包含了法国驻中国公使的一些书信节选。但是，对于 1860 年法英两国特使执行第二次共同使命期间，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国度发生的事情来说，这些节选只能给我们一个不完整的大概印象。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我写给尊敬的英国同行、海陆两军司令官以及天朝当局的部分信函公之于世。这样做的好处不难理解，世人也能从中理解我们在这次非比寻常且圆满成功的远征中所起的作用。

当然，凡是不便公开的内容，我将悉数删除。同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并保持事件之间的连贯性，必要时我将对照事件发生的日期，插入我在第二次远征期间可以说是一小时一小时悉心记录下的日记。这本文集仅收录呈送尊敬的参议院和外交部同僚的信函，并没有收入我写给主管部门的公函，也没有登载我收到的信函或回信，其原因无须解释。不过，细心的读者从我的答复

中很容易推测到这些未公开信函的内容。虽说如此，我并不认为提供我所收到的、且已见诸报端的回函和信件抄本，公开与我谈判的中国政要的公函是一种背信行为。

在对我年轻时期的回忆中，有一件事我想在此提一下，至于促使我这样做的动机就不必说了。有一次，我在巴黎一家沙龙观看了一场格言剧，演员只有一个，他在一扇关着的门旁或站或坐，还不时走到门前，像是要让另一个被认为就在隔壁房间里的人听见他讲话。说了好一会，他把耳朵贴在门上，仿佛是为了听明白隔壁的回答，借助这个回答引出接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家都明白了隔壁隐身人说的话。观众对于隐身人的兴趣往往甚于那个直接朝着他们说话的人物。

在结束这个简短的序言之前，请允许我引用一些事实，以消除有些人对联军两位全权特使各自所获成果问题上可能存有的误解。因为据某些人所说，战果完全有利于英方。

这次远征中国的英国海军由 223 艘战舰和商船组成。除了船员和武器装备之外，随船还有约 18000 余兵士，2000 多匹马和 48 门野战炮、攻城炮。

法国海军约有 150 艘船，8000 人，少量马匹，30 门膛线炮，无骑兵。

我记录的正式文件中有一份英军情况一览表，每月开支高达 1000000 英镑。

由此可见，1860 年，英国在中国的行动手段远优于法国，但法英两国所得如下：

清政府被迫向法英两国各支付战争赔款白银 8000000 两和 60000000 两，一两白银值 7.5 法郎。

对于 9 月 18 日通州事件中的 26 名英国女王陛下的臣民，清政

府给予 300000 两白银的赔偿，约合每人 86000 法郎；而对于在同一事件中被俘且受到残酷折磨的 11 名法国人，我收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 200000 两白银的赔偿，也就是每人 136000 法郎。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政府完全让予英国的领土并不是香港对面、面积 30 平方海里陆地或 30 海里的海岸，而是根据海军司令部地图显示，大小只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平方海里的狭长半岛。这个半岛叫九龙，是香港必不可少的部分，英国根据一份无期限的条约规定，对其拥有独占的权利，并早已在那里修筑了地堡。对于法国，中国政府保证如数归还天朝首都和外省从基督徒那里没收的所有天主教堂及其墓地、土地等辅助建筑。

请读者比较两位全权特使可使用的行动手段，再来评价他们取得的成果。

我之所以不再保持沉默，还有一些别的原因。陆军和海军就 1860 年远征中国一事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报道，现在，皇帝特使团愿意、也应该让别人听到其声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得到外交大臣阁下批准出版我的黄皮书之后，应庄严地立法倡议，我必须介绍一下特使团在令人赞叹的 1860 年远征中起到的作用。对我来说，该要求就是一个命令，我欣然服从。

用一句别人对我讲过、我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话说：“向历史提供所能提供的证据总是有益的。”这句话是我整理内容时遵守的纲领。通过这些内容，读者将看到，在法英海陆两军谨慎而又坚强的支持下，谈判一天天进展，最终迫使远东向基督教信仰，向世界贸易敞开大门。

在此我并不想做什么评论，也不想做什么反省。我只求还原事实真相，绝不迁就个人得失的考虑。我只引用真实文体的节录，叙述事实——至少是事情发生时我认为亲眼所见或我所理解的事实。

总之，我只想为历史提供证据……

如有错误之处，我乐意承担责任，并尽可能纠正。

本书不得不用到一些汉语专有名词，我将按照中国官员和随行翻译员的发音，尽可能准确表达。

葛罗男爵

巴黎，1864年6月。



马赛，1860 年 4 月 27 日

本月 25 日，我与特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一起离开巴黎，明天即 28 日，我将乘坐英国邮船“瓦里塔”号前往亚历山大。额尔金勋爵和四名随行秘书和专员将于邮船出发前一两个小时抵达马赛港口。罗伯特船长奉命等候他们。

海上，4 月 28 日，“瓦里塔”号船

早上八点半，我们出发前往马耳他和亚历山大。船上有额尔金勋爵、贺布海军少将、尊敬的詹姆士·弗朗西斯·斯图亚特·沃特里，尊敬的托马斯·约翰·豪威尔·瑟罗，和罗亨利……

船上法英两国国旗等高悬挂于主桅之上。

4 月 30 日，晚上九点半

“瓦里塔”号驶抵马耳他。

5 月 1 日

邮船离开马耳他，前往亚历山大港，将于 5 月 4 日抵达。

总督大人安排一趟专列和一节贵宾包厢供两位特使支配，专列由铁路部门的一位主管驾驶。

我们当天抵达开罗，5日中午出发前往苏伊士港。

东方半岛公司高级职员以及两名穿着讲究的中国人在码头迎接我们，两位中国人合撑一把有丝绸流苏的白色阳伞，把我们一直送到酒店。

东方半岛公司拥有65艘客轮，其中数“西姆拉”号最大，负责将两位特使从苏伊士送往锡兰，再由“马拉巴尔”号将他们送到香港。

“西姆拉”号5月5日从苏伊士出发，11日抵达亚丁湾港添加了煤，21日停泊锡兰岛加勒角。

“马拉巴尔”号已泊加勒角，整装待发。启程前往香港的时间定于5月22日礼拜二下午2点。我和额尔金勋爵已在船上，突然狂风大作，与当时的季风相逆，将“马拉巴尔”号推向设有航标的海底礁石。此前由于船员冒失，将船停泊在礁岩边上，且只抛下一只锚，季风由礁岩吹来，势必使船体从岩石旁移开。狂风一来，船被推向花岗石堆，又被涌浪托起，船尾便碰上了海底礁石，令人胆战心惊；船长打算把船驶向外海，幸好压力不足，船无法开动。船未能按原定时间出发。天气非常糟糕，狂风骤雨，但这还不足以阻止小艇把原先上岸的男女乘客接回船上……然而，几分钟之后，“马拉巴尔”号铁壳船体被撞穿了，水不断地涌进来，眼看着慢慢下沉，旁边许多商船都见死不救，只有“保尔-奥古斯特”号放下了一条小艇。“保尔-奥古斯特”号来自敦刻尔克，船长叫曼斯·马歇尔。随后，英国“威勒”号的一条小艇也前来相助。人们往火上浇了几桶椰子油，加快蒸汽释放，然后松开系在锚上的缆绳，“马拉巴尔”号终于在海湾的沙滩上搁浅。等妇女们都下到第一批子船上后，两位特使才离船上了锡兰总督亨利爵士派出的救生艇，而额尔金勋爵这位联合王国邮电局局长，是最后一名下船的。我们赶往

总督府，一路上人群激情洋溢，他们是冒着瓢泼大雨争先恐后赶到沙滩上来的……

我们的行李全都沉到了海底。所有证件、国书、密码、衣物及制服，全都丢了！额尔金勋爵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巴士达秘书什么都没抢救出来，我好歹还从座舱抢出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装有日常用品的旅行袋。鲍拜先生是《泰晤士报》的记者，他也只保住了随身的东西。额尔金勋爵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女士们也是，只有一位太太在默默流泪……可我们经历了名副其实的危險。有人对我说，船长之所以想把船驶向外海，是希望一旦发动水泵便能堵塞漏洞，但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在机械师的再三请求下，他将船全速驶向港岸。船身受损严重，但我们得救了！一条救生艇都没有下水，甲板的天篷也没有取掉，因此如果像人们担心的那样，“马拉巴尔”号在深水里沉没，船上所有乘客就会被天篷罩住，如同小鸟一样落入网内。

我们做了种种设想，刚有个主意就放弃了，最终额尔金勋爵和我商定，就待在加勒角等待从苏伊士来的下一班船，这将使我们推迟两周抵达中国，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5月26日

“新加坡”号轮船抵达，船上装的是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行李箱。英国特使命人打开箱子，取出其弟弟寄给他的信函，他弟弟卜鲁斯是女王派驻中国的公使。

卜鲁斯已获知两位特使被派往中国一事。他与布尔布隆先生一致同意维持现状，等两位特使到后再说。在华联军司令官持相同意见。

“新加坡”号带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满意，天朝政府毫不妥协！上海前任道台薛焕公开说：主战的中国人还需要得到一次严厉的教

训；他还说，只要僧王没被打败，皇帝是不会有任伺妥协的。僧王，即僧格林沁，1859年于大沽大败英军。白河河口修建起了重大防御工事。卜鲁斯和布尔布隆的最后通牒被回绝了，中国政府认为前者傲慢，后者无礼，将法方原因和英方原因完全分开，并假装对法英两国国旗并现大沽一事毫不知情！在见到两位公使和两位联军司令官之前，额尔金和我无法做出决定，战争将无法避免。

加勒海角，1860年5月27日

锡兰北部采珠人奉总督之命来到这里，从沉没的“马拉巴尔”号船内打捞起了几箱鸦片！我们的行李箱在船的底舱，装有值12000000法郎的皮阿斯特和金条。行李将被取回，但在海底那么多天，肯定损坏了。

加勒海角，6月5日

法英两国特使团上了“北京”号，该船从苏伊士出发，途经马来西亚的檳城前往香港。“北京”号21日抵达香港，皇家海军“西贡”号在香港等候，将我送往上海。在上海，蒸汽护卫舰“杜舍拉”号将负责接待法国特使北上。额尔金勋爵乘坐的是从印度调遣过来的英国海军“弗鲁兹”号。

“杜舍拉”号由特里科海军少将指挥，后者在1859年灾难性的大沽事件中负伤，当时他冒着枪林弹雨，冲过低潮中开阔松软的海滩，率先冲到大沽要塞墙下。在这片海滩上，贺布海军上将的突击纵队或死或伤，或陷进淤泥，一半人丢掉了性命。

香港，6月23日

额尔金勋爵今天下午4点出发前往上海了，我要到明天上午8

点离开香港。

上海，6月28日

今抵上海，见到了蒙托邦将军、沙内少将、布尔布隆、卜鲁斯、美国公使华若翰、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起义军已兵临城下。市民惶恐万分，纷纷要求我们的保护。

就这样，我们陷入了相当奇怪的处境，在南方要保护中国皇帝，而在北方却要与皇帝打仗！在这个奇怪的国度，一切都不正常！

额尔金勋爵比我早7个小时离开香港，但此时还没有到上海。

上海，1860年7月2日

蒙托邦将军今天早上前往芝罘港，这是位于山东半岛北部北直隶湾的一个港口，与庙岛群岛毗邻，芝罘有法国驻军。英国军队占据了大连湾，大连湾位于北直隶湾的北部，与芝罘港隔海相望。我将前往芝罘与蒙托邦将军会面，额尔金勋爵将前往大连湾与格兰特将军会合。我们需要商量一下，制定应该遵循的行动计划。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是在两三个星期内，我们似乎不可能有大的行动。

上海，1860年7月5日

额尔金勋爵刚到不久，今天就出发前往大连湾了。躲藏许久的北直隶主教孟振生托人捎来便条，告诉我中国政府在北京占据天主教堂的情形。

起义军继续推进，直逼上海。地方官员再次恳请我们出手相救，想必也向俄国人和美国人求助了，因为城前停泊着他们的战舰。所有的外国武装力量会因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下，法英两国如果单独行动，就像是加入中国内战，而我们无权这样做。不管怎样，我们将保卫这座城市，但我们的军队不会出城护卫村庄，也不会向起义军进攻。

上海郊外重镇青浦落在起义军手里，这支起义军的首领是忠王李秀成。他公开斥责前来投靠他的盗匪，说他们玷污了其坚信的事业，但暗地里却保护他们，将他们收为辅助部队！起义军最高首领天王居住在南京。义军旌旗写着三个主张：禁拜神像，驱除鞑虏，光复中华。起义部队行军打着四面旗帜：红旗军负责放火，黑旗军负责割喉杀死老人妇幼，白旗军负责军需品供应，黄旗军负责招募或者抽抓青壮年入伍。

1860年7月8日，海上“杜舍拉”号

今日离沪北上，随行有公使团秘书韦努耶和翻译美理登先生。我让公使团一等秘书科雷克沃斯基先生留下陪同布尔布隆公使；如果我在执行第一次使命时的翻译芒盖先生不愿北上（我有理由担心这一点），我就会请德拉玛神甫相助，因为香港外国使节团曾向我推荐这位神甫，说他精通汉语。

我于7月11日抵达芝罘，见到蒙托邦将军、冉曼将军、柯利诺将军、沙内海军少将。我们的军队已安顿完毕，看到法国国旗在远离巴黎六千海里的山东飘扬，我心潮澎湃，何况这里还是孔夫子的故乡。

当地居民非常友好，市场物资供应充足，我方将士们激昂的士气令人满意，军营甚至开了一个戏院。

1860年7月12日，芝罘锚地

至此，北京政府一直保持绝对沉默。此前他们拒绝了布尔布隆

和卜鲁斯在上海发出的最后通牒。

一到中国，两位特使就发现军政事务已由联军司令官处理，对此，法英两国政府的训令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法国政府的训令指出：“虽然皇帝授予全权特使和高级专员以全部政治权利和专属谈判权，但陛下也希望海陆两军司令官能据其专长，对要采取的行动和手段独自做出判断。

两位特使到达中国之时，如果战争已经开始，法英两国政府则认为全权特使有责任终止会使海陆军队面临危险的任何行动。该权益如果得到保障，外交阶段便可开始，且由两位特使全权负责到底……”

额尔金和我一致认为，进驻天津之前，不必与中国政府交涉。联军司令官将为我们打开天津的城门。我们的分歧仅仅是：我的英国同仁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而我认为恰恰相反，联军占领舟山群岛，几天后又在离北京几天行程的地方登陆，虽说未开一枪一炮，但无疑都是战争行为。这两件事不就是在清政府回绝我们的最后通牒后付诸实施的吗？正是清政府的回绝致使联军司令官握拳拿事，手持武器立即侵入中国领土，以实现法英两国政府的旨意。

芝罘，1860年7月16日

额尔金勋爵抵达大连湾，他交给我一份关于当前形势的备忘录。我们对形势持相同看法。

芝罘，1860年7月17日

第二次沿海侦察刚刚完成，侦察范围包括白河入海口以南十五到二十公里的沿海地带，以及联军司令官计划让法国军队登陆的海滩。英国军队将在大沽以北的北塘附近登陆。侦察发现，白河以南

到处都是淤泥，无法登陆，连步兵都难以通过。蒙托邦将军也认为进攻计划必须更改，联军应该在北塘河口同时登陆，然后沿白河而上，从背面夺取守护白河入口的要塞。在类似问题上，蒙托邦将军无疑是最称职的评判员。

芝罘，1860年7月17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法国皇帝陛下派驻中国特使和高级专员葛罗男爵仔细阅读了尊敬的英国同事本月16日在芝罘呈交的备忘录，作为答复，他认为最好的做法是摘录几段本月11日致法国外交大臣阁下信函中的原文，内容如下：

一旦获悉联军司令官所采纳的作战方案，我将前往大连湾与额尔金勋爵会面，并就备战事宜统一意见。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迫使我们改变原定计划，我们将去白河口等待敌方炮台被拔除，河道恢复通航，让联军控制下的天津重新成为两国公使的居住地。我们将在天津等待北京朝廷提出建议，或自己向中国政府提出新的提议，之后如有必要，则采取更具有威胁性的措施迫使中国政府让步，而占领天津并不能达到此目的。

到目前为止，北京政府自回绝了法英两国在上海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对我们一直保持沉默。而我们也必须保持沉默，因为我们到达中国后发现，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联军占领舟山，并在离天朝政府首都都不远的地方登陆，法英两国公使也已将军政事务交由联军司令官处置。

清政府还在为1859年大沽事件而沾沾自喜，现在还不是额尔金和我出面的时候。而法英联军的第一次出击就向清政府证明，战争会危及其生存，任何抵抗都徒劳无用。为保全自身，清政府不得

不答应法英两国提出的要求。

我唯一担心的是皇帝出逃关外，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攻下天津就停下来，**威胁比攻打更有效**。当然，天津不难攻下，对此我毫不怀疑。

我完全赞同尊敬的同仁在他的备忘录中提出的行动计划，今天我将致函蒙托邦将军和沙内海军少将，敦促他们尽可能加快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以便两位特使进驻天津，相机行事。

芝罘，1860年7月17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尊敬的将军先生：

在我作为皇帝特使及皇帝在华高级专员离开巴黎前往中国之时，帝国政府向我颁发训令，让我根据在华具体情况相机行事。当时就预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中国政府接受帝国驻华公使提出的最后通牒，恢复法国和天朝之间的融洽关系；另一种情况是回绝我们提出的最后通牒，导致帝国对中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用武力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要求。

抵达中国时，额尔金勋爵和我发现，第二种情况已成为事实。如您所知，中国政府拒绝了最后通牒。帝国驻中国公使已将行动权交给了军队司令官，而后者在英国同仁的配合下，占领了舟山群岛，让两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在中国北方离首都只有几海里之遥的地方安营扎寨，并随时准备向北京进发。

我认为目前强制措施还在实施当中，训令要求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决不可阻碍军事行动，并随时准备接受清政府可能提出的建议，以便在不危及海陆两军安全的情况下予以答复。

因此，额尔金勋爵和我已就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

见，认为应该敦请各自的军队司令官加紧执行共同制定的军事计划，攻占白河口的防御工事；消除白河口至天津阻挡航行的障碍；攻占天津，使其成为我方通航的军事集结地。两位特使将再次在天津安顿下来，等待中方的建议，或者主动与中国政府进行必要的交涉，当然不排除以后根据出现的情况与联军司令官协调行动的可能。

额尔金和我都认为，既然中国政府照会布尔布隆和卜鲁斯，拒绝接受英法两国的要求，此后一直保持沉默，我们也应避免与其接触，直到业已开始的军事行动可以使两位特使得以进驻天津，并让清政府意识到，战争的念头会危及到它自身的存在，任何反抗都将无济于事，故为保全自己，北京政府必将向我们妥协。

额尔金和我深信，此时分心旁骛，只会导致事情进展缓慢，这是应该避免的。在中国政府淡忘大沽胜利之前，我们与其进行的任何交涉，都会被视为软弱和胆怯的表现，中国政府会更加傲慢，更加看不到其真正利益所在。

额尔金和我打算在两支远征军队接近大沽炮台时前往白河口，一旦得到关于道路通畅的消息便北上天津。将军先生，我相信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所以，我希望将军先生能按照我代表法国政府向您提的意旨行事，并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将您做的相关部署及取得的结果告知于我。

将军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同一天，我还给沙内海军少将寄去内容相同的信件。

芝罘，1860年7月18日

联军司令官派往大沽南岸进行侦察和探测的两艘小船返回锚

地，侦察组带回的情报非常不利：法军原定靠岸的地方由于淤泥齐膝难以登陆。我们不应与盟军分开行动，而应采纳最初的想法，与英军一起在北塘河口登陆。若该计划占上风，两支军队很可能同时在北塘村前海水退潮时露出的淤泥滩地上登陆。

整体形势没什么变化。中国政府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对在大沽和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得不到任何情报，得不到任何消息，而我不得不说，分散在内地的传教士对我们保持缄默或许过于谨慎，而我们的成功必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

1860年7月19日

芝罘锚地，“杜舍拉”号船上。

霍普·格兰特将军和贺布上将上船看望我。他们是今天早上八点抵达芝罘的。

芝罘锚地，7月20日

与法国将军和海军上将协商后，霍普·格兰特将军和贺布上将前往大连湾。按照最初计划，法国军队应从大沽南约7海里的海滩登陆，英国军队则在大沽北的北塘城下登陆，这个计划最终被放弃了。联军将在北塘河口同时登陆。

芝罘锚地，7月22日

一艘俄国炮艇驶进了锚地，船上俄国驻北京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他从日本长崎来此，中途把美国公使华若翰带到白河，俄国人 and 美国人会不会像1858年一样，随我们北上呢？

从香港来的“上海”号终于到了，德拉玛神甫将担任我的翻译，他就在这艘船上。

芝罘锚地，7月24日

法国远征军队登船完毕。我将于今晚7点出发前往北塘。法军将于明天启航。我打算在途经大连湾时看望额尔金和英国司令官。

大连湾锚地，7月25日

早上8点，所乘的“维多利亚湾”号停泊在大连湾，四周都是英国船只。所有的士兵都已上船。英国远征军共有223艘船只，我有所有这些船只的名单及船上物资的清单。我们只有150艘战船和商船，但是我不清楚每艘船装载了什么。我想法军人数应该不到8000人，而且无骑兵。

大连湾锚地，7月26日

早上7点，英国舰队率先起航。我也离开了锚地。海面上全是战舰，煞是壮观。我前往山东海岸与法国舰队会合。4点钟时我已在舰队之中，并与沙内少将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也就是27日，沙垒田岛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是法英两支舰队第一个集结点。岛上有个木塔，建在刚好露出水面的沙洲上，正是这些沙洲组成了沙垒田小岛群。11点，我们在北塘附近抛锚，但离陆地还很远。额尔金勋爵搭乘“弗鲁兹”号已经抵达。

北塘锚地，7月29日

额尔金勋爵和沙内海军少将都来看我，一切准备就绪，就差英国的小炮艇了。明天我们将前往北塘，4000士兵将在右岸炮台以南的淤泥浅滩登陆，登上一条高于地面大约两米的堤道，这条堤道由北塘一直通达白河，我清清楚楚看到两辆大车在堤道上相向而

行，故对我们的辎重车队来说这条道路足够宽敞了。登陆后，我们可以从这条堤道直达北塘，而炮艇将在涨潮时强行打开两岸炮台之间的通道，不过该通道上看不到有什么人防御或阻碍。北塘被攻占后将成为联军作战和军需补给的基地。我们将朝大沽推进，从后面攻占炮台，从而确保河口进出无阻，据说这就是将军们的计划。

我们朝着未知前进，因为连一个中国奸细都没有收买。士兵们积极准备，个个信心十足！谁会怀疑我们不是胜利在握呢？

北塘锚地，7月30日

早上7点，东边海平面布满缕缕黑烟，在我们身后，英国炮艇回归舰队。9点，海军上将示意做好启航的一切准备。天气阴沉，微风阵阵；11点，两支舰队起锚。我登上“杜舍拉”号，离开舰队前往大沽炮台察看，1858年我曾见证了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的情景……

大沽炮台得到大规模重修，在原有炮台基础上新添了一些棱堡。一艘小船出现在我们和炮台之间，它发射了一些烟火并很快被烟雾包围，很明显，它在向岸上的人发信号，小船全速向河岸划去。

与1859年一样，这些炮台以及河岸上的工事均由僧格林沁负责防卫。这是一位鞑靼名将，中国人叫他僧王：“王”字在中国意味着亲王或者国王。僧格林沁是蒙古科尔沁部落的首领，有权有势，精明能干，令人生畏。我想，他应该是大清皇帝的小舅子。僧格林沁这个名字由两个藏语词组成，僧格意味着狮子，而林沁是宝贵的意思：宝贵的狮子。他是清军中唯一稍有才干的将军。正是他在1859年大获全胜，击退了贺布上将对大沽炮台的进攻。也正是他，从那时候开始，在大沽炮台修筑了规模浩大的防御工事，据说

守护炮台的是他率领的部队，有 25000 到 30000 人之众。

时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的郑亲王端华是个满族亲王，是皇帝的叔叔，其兄弟肃顺是户部尚书，两人听任皇帝沉湎于声色中，对皇帝的影晌很不好。这两位重臣，加上怡亲王载垣组成了一个核心内阁，皇帝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这个内阁，换取其欲望得到满足。

在仔细侦查大沽的五个炮台后，我回到了两国舰队，而此时舰队已经停泊在距离北塘河口尽可能近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看到炮台上飘扬着的彩旗。

在英法联军舰队不远之处，还停泊着 4 艘俄国军舰和 2 艘美国军舰。桅樯上悬挂着国旗，表明舰上有俄美两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和华若翰。

上将们下令放出登陆舰，明天将运送一部分士兵上岸。士兵们干活从未如此欢快、如此利索过。

北塘阵前，7 月 31 日

天气很糟糕。东北风刮得厉害，大海波涛汹涌。海军上将下令暂停登陆准备工作，27 艘英国战船与贺布上将会合，伊格那替叶福将军跟我提到直隶总督给他的公告，用词与清政府拒绝法国最后通牒的公函如出一辙：总督保证不会和英法联军作战，并且强烈希望天津条约能在北京换文。他还提到，从北塘通往北京的道路为谈判代表敞开，包括英国人，此前英国军队曾想借道白河，但他们当时无权这样做；此外，当英军不顾公正原则及国际公法想摧毁白河的防御工事时它被击退了。总督先生认为法国人与此前 1859 年大沽事件毫无瓜葛，不明白法国人为什么要做英军的帮手。

虽然，不封锁北塘河和北塘河口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使然，但由

此却证明我们是侵略者！大家都深信，即使我们能抵达天津，谈判不会轻松。

北塘河还没有设置航标，据说涨潮时沙洲海水深不超过3米。如果夜里风浪稍有平息，明天早上我们就将尝试登陆。往南远眺大沽炮台，我们要攻克的北塘棱堡看起来很有气势，上面插有很多军旗，但围墙上却连一个士兵的影子也没有。

北塘锚地，8月1日

天下着雨，但是没有风。早上7点，上将派人告诉我，虽然天气不佳，登陆仍将开始，大家欣喜若狂。每艘战舰都放下登陆舰或小船，士兵排成长龙，沿舷梯而下，挤满登陆船只，马匹被从各处赶到横桁尽头，然后慢慢放到登陆舰上。锚地一片沸腾，呈现极为激动人心的情景。炮艇和那些立着枪炮的小艇连在一起，被烟雾围绕着。密集的船艇队乘着夜色带着我们的心愿和祝福朝北塘河口前进。“杜舍拉”号舰上，大家虽然服从命令，心里却一直诅咒着让我们远离大陆的使命。小舰队会在天亮之前抵达陆地。今夜无眠！

8月2日，凌晨4点

河口传来几声炮响。日光中，我们看到炮舰的桅杆已到了棱堡上游，棱堡上飘着联军的旗帜。河右岸是英国国旗，左岸是法国的三色旗，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9点

“切斯皮亚克”号船长李维斯从北塘赶来，上船把陆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我们登陆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炮台里既没有士兵也没有炮兵，炮台都是土堆成的，炮眼里只有五六门外加铁箍皮的木

炮。北塘城的居民并没有全部弃城而逃，但愿他们不会为此而后悔！锡克骑兵不会放过他们的。

10 点半

小艇空着回到舰队，装运另一批士兵登陆。等到涨潮时炮艇将越过沙洲，将另一支部队运抵北塘。

3 点

沙内海军少将把“流星”号汽船交给我使用，我就要动身前往北塘。海军上尉约雷斯是沙内少将的副官，他证实了攻占北塘时的情形：没有任何抵抗，没有任何意外。

我们的盟友还在犹豫要不要跳到淤泥中登陆；法国士兵则在蒙托邦将军的带领下，不露声色接连跳到泥水中，于是大家纷纷效仿。炮艇在半夜越过沙洲，清晨 4 点，朝着已被放弃的炮台围墙发射了几发炮弹后，便成功地通过了炮台。

8 月 3 日

我参观了北塘炮台。这是一项巨大的泥土工事，修筑得不错，但是无法抵抗任何进攻。工事顶上有两个炮台，每个炮台有三门外包铁皮的木炮，装在固定的炮架上。几个军械库里全是火箭，其头部是长约 10 厘米的铁质箭头。火绳枪，弓箭，滑膛枪，这些就是清军用来对抗联军带膛线大炮和卡宾枪的武器！这些武器都没什么威力，真正有威力的是三个爆炸装置，一个被安装在右岸炮台的入口处，从里面堵住那扇必经之门。另外两个被安装在两条通往两个内堡的坡道脚下。每条必经通道挖了一个长 5 米、宽 1.5 米、深度大约也是 1.5 米的大坑，坑上盖着一块活动木板，木板通过纵轴线与

坑的窄边中点链接，只要踩到任何一侧，木板都会翻转。板上铺着一层土，看起来和周围的地面没什么两样。每个坑里都有四个炸药包，直径大约 60 厘米，里面装满炸药。每个炸药包都被装在一个方木箱里，箱盖上装有两套火石点火枪，枪已上膛，扳机通过小链条与木板相连，木板一动，一侧由于受重而下沉，另一侧就会升高，升高时拉动与火石枪系在一起的小链条，启动扳机，点燃炸药包。

据说，工兵部队的一名中士率先进入炮台，恰巧踩在了陷阱的中央，木板没有翻转，但是板上的土层移动了，中士有所察觉，终于发现了炸药！他们用水浇湿了这些炸药，并找到了其他两处炸源坑！但是，这种说法也许并不真实，但我还是信了。英军阵营中有人告诉我，说有一名中国官员，和家人一起住在北塘，是他把炮台里设有陷阱的事告诉了英军。巴夏礼得到了这一密报后，派人用水浇湿了这些炸药。然而几天后，锡克骑兵闯入了这位可怜的中国人家中，把他的房子洗劫一空，还奸污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这个不幸的人在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割喉自尽了。

据报有一队鞑靼骑兵正往北塘而来，人数估计在三四千左右。1000 名法国士兵和 1200 名英国士兵组成的侦察队带着几门大炮从北塘撤回。

鞑靼部队相当沉着，但他们还是退到一处有防御工事的营地，这个营地位于通往大沽的路上。他们的火铳枪（一种大口径的火绳枪，发射时让一个同伴用肩头顶着枪筒后端）打伤了联军数人。晚上我们退回了城里。

北塘缺饮用水，必须要到河上游 10 到 12 里的地方取水。卜罗德上校搭乘一艘炮艇前去查看。岸上，一队大约 150 人的鞑靼骑兵紧跟其后，但是双方都没有做出敌对举动！这场战争中，一切都不正常！

8月5日

我搭乘“阿朗帕”号回到了“杜舍拉”号上。下午2点，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前来看我，我给他讲述了我北塘目睹的一切，并把炮台发现的爆炸装置的草图给了他。

8月6日

美国公使华若翰先生上船向我辞行，转交了北直隶总督的函件。他只给我读了一遍，也没有留下抄本。我记得有这样的内容：中国政府“用自己的方式”对1858年天津议和进行了陈述，和谈期间，皇帝宽容大度，愿意给外国人一些利益。直隶总督恒福接着提到了1859年大沽胜利，最后谈到最近的事件。他说，皇帝惊闻英法联军水陆并进，于8月1日攻占了北塘，驱赶手无寸铁的当地居民，攻占没有驻军的炮台。但是皇帝宽宏大量，仍然愿意忘记这些不快，如果三天内英法两国特使愿意与即将上任负责同他们和谈的中国官员会面，双方都可以避免损伤；联军应退回船上，两位特使前往北京处理《天津条约》换文事宜，而驻守北塘平原的中国军队也将按兵不动，中国和英法两国之间的和平将得以恢复并永久保持下去。

信中还说华若翰先生将让英法特使明白，英法联军在海上虽占优势，但陆地上是无法与人数众多的帝国军队抗衡的。如果执意要打仗，英法联军将比上次败得更惨……总督先生还补充说，如果两位特使想活着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尽快接受中国皇帝通过其中间人转达的美意。

总之，如果三天后总督大人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清军将奉命行事。

华若翰先生明天将前往芝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直隶总督的信函是本月4日的。

1860年8月8日 北塘锚地

伊格那替叶福将军来到船上，他和我谈了直隶总督恒福托华若翰转交的信函，并证明信中所述全部属实。这位总督被任命为皇帝专员，奉皇帝之命向我们提出：如果我们同意退回船上并赴北京换文，便可协商有关事宜，他的确给了我们三天期限，要我们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英法特使如果不接受这些仁慈的建议，恐怕难以回国复命！

1860年8月9日

贺布上将率队去北塘上游侦察情况。为避免和清军发生摩擦，他在船头竖起了一面巨大的白旗，上面用汉语写着“免战”二字。直隶总督利用这个机会给额尔金勋爵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通情达理的他并不想打仗，双方可以友好商谈。额尔金勋爵答复说，鉴于清政府回绝了联军提出的要求，事务处置权已经交到了联军军事将领手中，因此联军司令官必须先完成担负的使命，然后再开始新一轮谈判。

8月10日

天气又闷又潮，向大沽进发的日期延后了，着实令人恼火。此时延期也许无法避免，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酷暑来临，天热难熬！

8月12日 北塘

9点，一艘炮艇从北塘回来了，告诉我们联军向鞑靼营地发起

进攻了；我们也看到北塘和大沽之间升起浓浓白烟。可以说我们隐约看见了被联军包围的炮台棱堡，还看到了飘扬着的旗帜，只是看不清颜色。枪声停了，看来联军正冲向大沽炮台。下午2点，我们没收到任何消息，既看不到军队也看不到白烟。2点半的时候，沙内少将的随军参谋杜吉里奥捎来将军的口信，联军先遣队已经攻占了鞑靼营地，我们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滚滚白烟直冲云霄，大概是鞑靼军队的火药库爆炸了。

8月13日

我上了沙内少将所在的船。鞑靼营地已被攻占，先遣部队随后向大沽北侧炮台进发时发现这里防守严密，据说要靠近炮台，必须走一条狭窄的堤道，而这条堤道又处在中国炮兵火力范围内。先遣队不得不停止前进，迂回到敌人背后。4点，额尔金给我寄来一份克雷洛克上校的报告文件副本，这位上校是勋爵的军事秘书，随司令部行动。联军已经占领了新河村，并查获关于当天事件的中方文件，我将得到一份抄本，据说这些文件颇有价值。

8月14日，北塘城下

早上9点，北塘和白河两地炮台间的平原上响起猛烈的炮声，许多炮弹在空中爆炸。下午4点，还不知道进攻的结果，可我清楚地看到白河北岸一个炮台上升起了法国三色旗。半小时后，另一面方形旗帜也在炮台上飘扬。中国人只升旗旗，想必炮台已经落入联军之手。

8月15日

我拿到一份有关昨天战况的公报。北面第一个炮台已被我方海

军和轻步兵攻占。蒙托邦将军想乘胜追击，拿下第二座炮台，但根据格兰特将军的观察结果，进攻被推迟了。当军队在陆上向白河口的炮台进攻时，炮艇才前来掩护。

8月15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十分感谢您向我提供的关于昨天作战情况的报告。我十分同情那些被鞑靼劫持的苦力，他们一定被斩首了。我们看到了浓烟，以及白河上燃烧的帆船，也听到了炮声。以下是我今天收到的战报：

“昨天早晨6点，联军朝白河左岸炮台前进，向1200米外的炮台猛烈开火。冲在特遣队最前面的是居伯利司令指挥下的水兵连队，他们与轻步兵第二营一起攀登炮台，几乎与由工程兵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左翼特遣队同时登上城墙。‘涅莫西斯’号上的1名士官战死，2名士兵需要截肢，另有9名伤员……这个炮台通过一条美丽的河堤与左岸其他两座炮台相连，守卫第一座炮台的五六千人与鞑靼骑兵一起退往另两个炮台。攻占这座炮台后，蒙托邦将军想乘胜追击，攻下第二个炮台。但在格兰特将军的要求下，决定推迟几天攻打第二座炮台。我们还缴获了数艘帆船。本该今天早上就向河口进发的舰队将在陆战开始后行动……”

阁下，以上就是我刚刚收到的战报，特此奉上。

请接收我诚挚的祝福。

8月15日，北塘城前

我收到了本次抵华后的第一封中方函件，内容如下：

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恒福致

法国全权代表特使阁下：

众所周知，凡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的海上王国，均自称是中国友邦，并保证与中国和平相处。我不知道阁下已到中国，昨天收到英国一封回函，才知阁下已在北塘河口。我立即禀报朝廷，今日刚收到皇上谕旨。皇上已任命了高级专员等候阁下进京议和。

奉皇上圣谕，特知会阁下，请阁下给予肯定的答复。

1860年8月14日呈送法国全权特使阁下之重要信函。

8月15日，北塘

恒福总督断言他不知道我已到北塘海湾，他的记忆还没有好到掩盖真相的程度，中国人忘记了，几天前还托美俄两国公使正式通知我。

舰队彩旗招展，正在庆祝法国皇帝节。中午的时候照例鸣放了礼炮，俄美船只向我们表示祝贺，船上也挂起了彩旗。

1860年8月15日

直隶总督致葛罗男爵函。

很荣幸再次告知阁下，我刚收到皇上诏书，任命高级专员在北京等候阁下一起商讨和解决所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方信使回来复命，说法军营地白旗飘扬，以示休战。由此我认为，阁下亦不想中断双方之间的和平关系，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虽然我本人没有受命与阁下交换两年前签订的条约，但是得知圣上已经任命高级专员在北京等候阁下，而且两国都希望永葆和平，故我认为两国应永远休战。

一旦收到阁下对本函的回复，我将派人询问阁下，为我们的会晤和友好商谈确定日期。

重要信函，呈送葛罗男爵阁下。

8月16日

钦差大臣文祥和恒祺致葛罗男爵函。

我们荣幸地通知阁下，皇帝已令直隶总督恒福在阁下抵达天津时正式函请阁下赴京换约，以确保两国世代和平。但就在这时，我们获知联军已经登陆采取军事行动。皇帝希望你们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陛下担心直隶总督未能尽力维持两国和平，故命我们专程前来天津与阁下会面，并陪同阁下进京换约，确保两国和平相处。

因此，希望阁下尽快给予答复。

重要信函，呈送葛罗男爵阁下。

8月16日

葛罗男爵致直隶总督函。

署名人葛罗男爵很荣幸收到总督阁下的信函，得知阁下在获悉我到达北塘后，立刻将此事禀报贵国政府，并奉皇帝之命，向我传达了皇帝钦定高官等我赴京议和一事。

署名人感到惊讶和难过的是，中国政府毫不考虑所发生的严重事件，而正是这些严重事件促使署名人带着海陆军队再度来到这块海域；必须提醒中国政府看清今天法中两国各自面临的严峻形势，尽管中国当局假装忘记或者故意不承认这一事实。对此，署名人向总督阁下做一简单陈述，并以此作答。

1859年6月白河事件发生后，英法两国政府认为它们的国旗受到了莫大侮辱，并提出必须满足其条件，才能重修旧好。就法国而言，法国驻上海公使已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赔偿条件，中国当局是今年3月收到这些要求的，而且被明确告知，如果30天内没

有给出肯定的答复，处置权将交到海陆军事将领的手里，而此时，军队正在赴华途中；军队将领将采取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总督阁下知道，中方已可笑地拒绝了法国公使的要求；因此，和谈的时机已经过去，从欧洲赶来的军队不得不使用武力，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

欧洲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守卫白河口的部分炮台，河道很快就会畅通无阻。

事情发展到必须动用武力的地步，署名人对此深感遗憾，而总督阁下的信函中，看不到任何按条约规定解决问题的承诺，而这一承诺本可以促使署名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中止军事行动。

中国政府若能采取比现在更明智的方法，放弃无谓的算计，同意今年3月法英两国提出的要求，并为其诚信提供充分的保证，那么，法国特使将随时聆听中方经授权参与商议的高官的意见，并乐于为重建和平做出贡献。

署名人将认真考虑全权钦差大臣寄达的正式函件；但他必须向总督阁下明言，他本人绝无权力放弃上述最后通牒中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1860年8月17日，北塘城前，“杜舍拉”号船上

葛罗男爵致北直隶总督函。

署名人葛罗男爵有幸于昨天晚上收到北直隶总督阁下于本月15、16日写的两封信函；对于总督阁下14日所写信函我已经回复。法方的回答之所以不能及时收到，是因为通信不便，而且法国特使所在船只“杜舍拉”号体积过于庞大，不便靠岸停泊。

署名人十分痛心地看着，中国政府在最近的信函中丝毫没有满足法国提出的要求；因此，现在的形势如同署名人给阁下的第

一封回信中所说，即：海陆军队不能终止业已开始的军事行动，只要清帝国政府不满足法国提出的要求，法兰西帝国的军队将继续与中国作战。中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最好立即满足法国的要求。

因此，我只能重申写给北直隶总督阁下的第一封信函的内容。

葛罗男爵(签名)

8月17日，北塘城前

额尔金勋爵上船来拜访我，目前军事行动进展缓慢，他深表遗憾，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抗力，只好听天由命。不过，如果不等我们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中国政府就全盘接受我们的要求，那会多么令人扫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进入天津之前，我们决定只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1860年8月17日

直隶总督恒福致葛罗男爵函。

我已经给阁下寄了多封信函，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今天这封信是要告诉阁下，皇上体谅阁下远道而来，特令文祥和恒祺两位大臣前往北塘，陪伴阁下进京换约，以保永久和平。

谨请告诉我阁下现在所处的地方以及打算启程的日期，以便于我通知两位钦差大臣文祥和恒祺在约定的日子前来与阁下会合。

紧急信函，呈送葛罗男爵阁下。

1860年8月18日，北塘城下

致额尔金勋爵函。

勋爵阁下，我很荣幸随函附上直隶总督三封来函的法译本副

本，以及我的回信副本。

阁下可以从这些文本中看到，我认为有必要向中国政府说清楚法国和天朝国之间目前的处境，而中国政府对此似乎不了解或佯装不知。

请接受我……

葛罗男爵(签字)

8月19日，北塘锚地

葛罗男爵致北直隶总督函。

署名人昨天收到总督来信，得知皇帝已任命了两位钦差大臣文祥和恒祺到北塘会晤署名人，并护送其前往北京互换 1858 年条约的批准书。

署名人很遗憾不得不再次提醒阁下，中国政府拒绝了法国驻上海公使今年 3 月提出的最后通牒中的赔偿要求后，事务处置权已经交到了海陆将领的手中，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将以攻占大沽炮台、开放河道和特使进驻天津而告结束。到那时，如果两位钦差大臣有权接受最后通牒中的全部条款并为将来作出担保的话，署名人将在天津与他们会晤。

在这一局面出现之前，署名人无法要求法国将领停止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

署名人借此机会……

1860 年 8 月 20 日，北塘锚地

葛罗男爵致沙内海军少将函。

海军少将先生：

我刚刚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您的炮艇即将部署在白河炮台附

近，我将尽可能靠近战场，以便及时收到中国当局的信函。

大约一个小时前我收到两位新上任的钦差大臣的来信，他们将负责护送英法两国特使前往北京。我在回函中重复了给北直隶总督的答复，事务的处置权已经交到了联军将领手中，在攻占大沽炮台、开放河道、特使进驻天津之前，军事行动不会如钦差大臣要求的那样中止。

请接受……

1860年8月20日

3点钟，炮艇驶近白河口，4点钟，我请求特里科船长让“杜舍拉”号停泊在离白河河口尽可能近的地方。

1860年8月21日，“杜舍拉”号上，白河

葛罗男爵致钦差大臣文祥和恒祺函。

署名人收到钦差大臣文祥和恒祺阁下本月16日来函，获知他们受皇上委托，负责陪同两位特使进京换约。

两位钦差大臣的来函措辞失当，署名人不予计较，但必须告诉阁下，这封信改变不了中国政府的作为在法中两国之间造成的严峻局面，而且不得不重申已多次向北直隶总督陈述的法方立场，即中国回绝了3月份呈交上海当局的最后通牒后，事务处置权已交到联军将领手中，而且军事行动业已开始，目标是攻占大沽炮台、河流自由通航、特使进驻天津，在此目标达到之前，军事行动不会中止。

如果钦差大臣拥有就最后通牒提出的全部赔偿要求进行谈判并同意这些要求所必需的全部权力，法国特使将在天津会见他们，署名人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法中两国恢复持久和平，并在北京互换

批文。

署名人借此机会……

1860年8月21日，“杜舍拉”号上，白河

早上6点，北侧炮台即白河左岸炮台受到联军猛烈攻击，激烈的炮声开始了，一直持续到9点。炮台回击的火力也十分密集。联军的铁甲小炮艇停靠在淤泥里，离炮台很近，向炮台发射空心炮弹，弹无虚发。其中两座炮台被炸飞，各种碎片随着滚滚浓烟飞上天空，场面惊心动魄。9点一刻，最远的炮台上挤满了人，法国国旗最先在炮台上飘扬！10点，两岸炮台上无数的军旗降下了；12点，左岸炮台升起了白旗，最威风的南侧炮台似乎已被放弃，上面看不到一面旗帜……

1860年8月22日，白河

沙内海军少将告诉我，敌军已放弃南侧的炮台，白河的全部防御工事都在我们控制之下，联军的旗帜在炮台上飘扬！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拆除了阻塞航道的六处障碍物。如果贸然采取海路进攻很可能失败，因为中国工程师设计的防御工事种类繁多，布局巧妙。晚上6点，炮艇逆河而上，航道畅通无阻！

1860年8月23日，白河锚地

中午，我收到了直隶总督的急件，内容如下：

本月21日，贵国海陆两军攻占了我方的防御炮台，显示了非凡的作战才能，我军已不得不承认失败。此信旨在提醒阁下，将战争继续下去是无益的。关于两年前缔结的条约以及最后通牒中的条款，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的全权代表已离开北京，将于今天抵达

天津。

我希望阁下经由大沽前往天津。

此信送呈葛罗男爵阁下，1860年8月21日。

随信附上直隶总督致联军将领的信函。

1860年8月21日

署名人直隶总督恒福致英法海陆联军指挥官：

本月初五(即公历8月21日)，联军水陆并进，攻打我方炮台，并攻占了北岸的炮台。这一成功显示了联军的作战才能，中国军队战败认输，从南岸炮台撤出，并交出所有这些炮台及其全部军需品、所有的设防兵营以及其他防御工事。署名人保证派军官给联军指定人员指出炮台内所有炮眼的位置，以及所有隐藏在河流中的防御设施，以免给联军带来任何意外。炮台尽早交出后，该地随之实现停火，居民不应受到任何伤害，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应得到有效保护。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公历1860年8月21日)。

1860年8月22日，“杜舍拉”号上，白河

葛罗男爵致直隶总督函。

署名人于昨天收到了直隶总督阁下的来信，总督阁下认为鉴于白河沿岸刚发生的事件，战争已无必要继续下去。全权钦差大臣即将抵达，与署名人就1858年条约和今年提出的最后通牒进行磋商。

署名人很高兴收到这样的信函。此信使其相信新的不幸可望避免，因为中国军队不会再向海陆军队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海陆军队的使命是抵达天津，只要钦差大臣受命同意法国提出的要求，署名人就将赴天津与其会晤；当初正是这些要求被拒，才不幸迫使法国

政府采取了目前的强制措施。

署名人借此机会……

葛罗男爵(签名)

1860年8月23日

直隶总督恒福致葛罗男爵函。

很荣幸告知阁下，我已由大沽直接抵达天津，一到天津，我就让军队和民防兵撤离，并下令解除炮台的武装，撤走大炮，以便两国专注于和平大业。希望阁下只派少量战舰护送前来天津，以免引起群众恐慌。

重要信函，呈送法国全权特使葛罗男爵。

1860年8月24日“杜舍拉”号上，白河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尊敬的将军先生：

我很荣幸于昨晚收到您本月22日来信，从中获悉白河两岸的炮台已被攻占，并得知有关建立这一赫赫军功的一些详细情况以及取得的喜人战果。我已把您来信的一些摘录寄给了法国外交大臣阁下，并对他说起您18日做出的决定，即让军队过河并在右岸安营，而我们的盟军却想在白河架一座桥，认为在得到十天军粮之前，无法再次发起进攻。毫无疑问，您的大胆举措有力地促成了我们所取得的结果。

我想在我给您写信之时，您即将挺进天津，这是我们按指令制定的行动计划的第三步，我已经知会中国政府，我们将攻占大沽炮台，实现河流自由通航并进驻天津。只有抵达天津后，中国政府不存私心，满足联军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们才会中止战事。

沙内海军少将给我派来一艘炮艇，可以沿白河而上，一旦得知

白河通航无阻，我就离开锚地。抵达天津后，我有可能住在衙门，1858 年联军的旗帜曾在那里飘扬。

谨致……

葛罗男爵(签名)

1860 年 8 月 25 日

我恳请沙内海军少将派一艘铁质小型炮艇供我使用，这样我可以逆白河而上。中午，我与特里科舰长、护卫舰外科军医一起离开了“杜舍拉”号，他们将陪我前往天津，必要时前往更远的地方。下午 1 点，我经过炮台，穿过巨大的带刺铁丝网、由缆绳捆绑在一起的桁构梁和呈格子图形布置的木桩。河中还漂浮着许多尸体，我们的水手不断将它们推离炮艇，以免它们被卷进螺旋桨。陡峭的河岸上也是尸体成堆，被太阳晒得发黑发胀，实在惨不忍睹。

这些可怜的汉人，就这样为鞑靼人丢掉性命，却还受到这个鞑靼民族对他们的侮辱！1858 年，当联军将要攻打大沽炮台时，俄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上将曾对北直隶总督说：“不要抵抗欧洲军队，任何抵抗都意味着死亡，你们是让那些与事端不相干的无辜群众白白送死……”总督大人耸耸肩，笑着答道：“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只是汉人！”我还有必要说，这位总督大人是满族人吗？

10 点，我们遇到了蒙托邦将军，他是带着两艘大型炮艇和 500 名士兵沿河而上的。从他面前经过时，我们热烈鼓掌。7 点，我遇到了额尔金勋爵搭乘的“格拉纳达”号，和将军的炮艇一样，这艘船搁浅了。我的船也搁浅了，就在水上过夜。

8 月 26 日，9 点

我抵达天津。沙内少将和贺布将军比我早到，停泊在京杭大运

河入口处。和 1858 年一样，当地居民十分好奇，但是并无恶意。当天，我收到了如下急件：

北直隶总督恒福致葛罗男爵函。

我很荣幸告诉阁下，本月 25 日我收到了皇帝前天下达的谕旨，内容如下：

“任命桂良和恒福为钦差大臣，桂良速赴天津，会同恒福解决悬而未决之事。钦此！”

我正在天津等待大学士、钦差大臣桂良的到来，目前他在北京接受钦差大臣关防。他将于本月 31 日抵达天津，届时我们将共同与阁下商谈。此外，我还得告诉阁下，钦差大臣桂良大学士委托我将所附信函转交阁下，恳请阁下收阅。

请接受……

重要信函，呈送法国驻中国全权特使葛罗男爵阁下。

1860 年 8 月 25 日

钦差大臣桂良致葛罗男爵函。

我刚接到谕旨，命我前往天津与北直隶总督恒福一起解决有关交换批文之事。很荣幸通知阁下，我身携钦差关防，定于 8 月 31 日抵达天津。至于贵国 3 月份提出的最后通牒，没有一条不能达成一致。因此，恳请阁下等我到达天津后与您见面议和。

重要信函，呈交法国驻中国全权代表葛罗男爵阁下。

天津，1860 年 8 月 28 日

葛罗男爵致北直隶总督函。

署名人同时收到了北直隶总督阁下本月 23 日和 25 日来函。由于通信困难没有及时回复阁下。

署名人感谢阁下向其转交钦差大臣桂良的信函。

署名人希望尊敬的总督阁下能将内附信函转交桂良，并向各位大臣转交其写给他们的通报。

署名人预先向阁下表示感谢，并请接受……

天津，1860年8月28日

葛罗男爵致钦差大臣桂良函。

署名人于昨天收到钦差大臣桂良阁下的来信，得知皇帝陛下已将玉玺委托于阁下，阁下将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大人，和署名人共商换文事宜，并对今年3月法国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的条款逐一予以确认，而阁下说过，所有这些条款均能协商接受。

署名人收到这封重要信件之时，首先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第二次出使中国，不料杰出的中国同行正是1858年与其谈判并签署天津条约的中方代表；其次是高兴得到了对最后通牒的所有条款将不难被接受的承诺。不幸的是，署名人有过痛苦的经验，知道中国政府的诺言和保证并不总是得到认真履行，所以，从长远考虑，现在必须用既成事实或充分而具体的保证来保护需要保护的利益。

因此，署名人首先必须把悬而未决的问题说清楚，而且要做到尽可能简单明了。

继去年6月天津河口发生的事件后，法英两国政府认为其国旗遭中国政府严重侮辱，要求赔偿，而这是重修旧好的唯一途径。法国方面，法国驻上海公使提出了明确的赔偿要求，同时中国政府被明确告知，倘若在30天内不愿接受法方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将交到军队将领手上，后者将用武力获得中国政府不愿给予的东西。

阁下完全清楚，中国政府的答复不过是嘲弄人的拒绝。从此，和平谈判的时间已经过去，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军队奉命用武力迫使

中国政府屈服。

在北塘登陆的欧洲军队已经攻占了白河左岸的炮台，右岸的炮台不得不在同一天投降。通往天津的河流上阻塞航道的障碍物已被清除，军队指挥官经由水路和陆路抵达天津城门，已攻占天津，并对周围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但军队无意入城，以免广大群众受到惊吓。

天津协议的签署人、法英两国特使已进驻天津。

署名人对不得不使用武力深感遗憾，但他必须指出，此时他不可能要求军队将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这并不会妨碍阁下及其同僚与署名人共同商讨重建和平之事，前提是两位大人满足3月份最后通牒提出的要求。为更加明确起见，署名人愿意在此重提一下这些要求。

法国要求：

第一，为去年6月发生在天津河口的不快事件向法国道歉；

第二，在北京举行1858年条约换文仪式，法国外交官员将乘本国船只顺天津河而上；

第三，立刻执行《天津条约》；

第四，中国政府向法国赔偿，支付法国因为装备舰队和派遣军队来华所耗的巨资。

法国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容易被接受，中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对中国当局处理1859年大沽事件的方式表示遗憾。

第二条和第三条将在事实上和法律上予以接受。

至于第四条赔款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帝国政府本想让中国政府赔付其花费的巨大军备开支，但考虑到中国国内发生叛乱，耗去大部分财源，财政状况不佳，决定将赔款减少至80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天津条约规定的200万两，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总共只需支付

800 万两白银，还要减去广东海关已经支付的、1858 年天津条约规定赔款的预付部分。

如果在天津可以就最后通牒的条款签署一份协议，署名人将前往北京交换 1858 年条约批文，在由钦差大臣和署名人签字的换文记录中，应公开表明，自条约换文之日起，天津协议必须为两国所遵守；若协议一字不差列入条约，则具有与条约同等的效力。

问题已如此明确，故有关协议的准备无需多长时间。该文件签署后，署名人将乐于要求军队指挥官停止执行已制订的针对北京政府的计划。

至于赔款支付问题，法国政府会给予中国政府一定的时间，让其连续支付规定款项的大部分；但法国政府必须得到帝国海关提供的担保，并要求中国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而天津开放通商之时，目前占领该域的法国军队可能撤离，驻扎到山东北部沿岸，驻扎条件与舟山、广东相同，也就是说，当中国政府履行条约规定的全部承诺时，法国军队才会撤出驻地。

署名人希望尽快收到对此重要信函的肯定答复；最后他认为必须声明：只有令人满意的既成事实才能促使尚握有事务处置权的军事指挥官中止行动。

天津，1860 年 8 月 28 日

中国官员不会把局势如实告诉皇帝或者其他大臣，他们不敢说出对他们不利的事实真相。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我刚写给桂良的信件抄寄帝国的军机处，同一件事情要重复一百遍，实在令人不快！不过，我不会感到厌烦，与这些可怜的清朝官员相比，我更有耐心，更有恒心。

天津，1860 年 8 月 29 日

葛罗男爵致北京军机大臣函。

署名人很荣幸致函各位军机大臣，此函是其刚刚写给钦差大臣桂良重要信件的抄本。此举旨在让各位大臣了解法国特使写给桂良阁下的信函，并能确切知道法国特使考虑当前严重问题的方式。法国特使将高兴看到问题能尽快解决，这符合他所代表的国家之利益，也符合今天统治天朝的尊贵家族之利益。

署名人借此机会向各位大臣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天津，1860 年 8 月 29 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我很荣幸将钦差大臣桂良本月 25 日函件以及我的回信抄本寄给阁下，回信的内容我已告诉阁下。

同时，我也将该回信的副本寄给了帝国军机大臣，这样，北京最高权力机关就不能再说不了解法国特使考虑问题的方式了。

我是通过北直隶总督把我给新的钦差大臣桂良的回信转交给军机处的。

我很荣幸……

天津，1860 年 8 月 30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于几天前收到内阁大学士、钦差大臣、1858 年天津条约签字人桂良的信函，他说已被皇上委以玉玺，并作为全权代表，即将

前来天津，与北直隶总督一起和我共同协商 1858 年天津条约批文交换事宜。他还说，3 月份的最后通牒的任何条款都有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在此，我很荣幸随函附上我给桂良回信的抄本，您可以从中了解联军取得光辉战果后的目前形势，还可以从中看到，我已告诉中国政府，只要已完成的事情不能使帝国政府完全满意，海陆联军指挥官就不会停止他们的军事行动。

桂良的来信仿佛表明，中国政府已决定对我们的要求做出让步，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本次使命的成功，不过，倘若中国政府仍然拒绝让步或坚持沉默，我们将采取强制行动，绝不迟疑。我们不要过急动用强制措施。

有一点我比较担心，在中国政府打算屈服的时候过分显示力量，威胁京城，会使皇帝产生恐惧，可能做出不幸的决定，逃往鞑靼，而帝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无意推翻目前的清朝政府，根据给我的训令，我必须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军队抵达天津并安顿下来还需要几天时间，在这短短的几天内，钦差大臣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答复，该答复或使我们中止军事行动，或迫使两国全权特使要求联军指挥官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向北京朝廷施加有效压力，军队指挥官有时间作此准备。

请接受我……

同一天，我给沙内海军少将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件。

1860 年 8 月 31 日，天津

根据训令，我以上海最后通牒为基础，提前拟定了议和书。不过我要求赔款 800 万两白银，而不是 200 万两。

桂良今天抵达天津。他就要来拜访我，尽管为难，我还是不见

他，除非他答应我提出的要求。

法英两国国旗在特使居住地飘扬。

蒙托邦将军也到了。

应额尔金勋爵的要求，我已将议和书的草案转交给他。

按市价，1 两白银价值 7.5 法郎。

天津，1860 年 9 月 3 日

两位钦差大臣致葛罗男爵函。

桂良和恒祺收到阁下 8 月 31 日来信，读后确信阁下希望两国重建和平，而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因此，奉皇帝之命我们来到天津，并首先声明，双方应该重新商谈 1858 年条约的执行问题，而且，贵国今年 3 月份提出并在 8 月 30 日信件中予以重申的最后通牒的条款将被无条件接受。

因此我们恳请阁下休战，以确保恢复和平。至于赔款，只剩下在通商口岸提取赔款的方式需要我们商讨了。

我们给阁下寄去此信，期待双方尽早会晤，共商北京之行和条约批文交换事宜。

重要信函呈送葛罗男爵阁下。

1860 年 9 月 3 日，天津

葛罗男爵致两位钦差大臣函。

署名人刚刚收到两位钦差大臣的信件，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两位大人在信中保证，北京换文后，天津条约的全部条款将付诸实施；还说今年 3 月最后通牒中、署名人在 8 月 30 日给钦差大臣的信中也提到的所有条款将无条件接受。

署名人现在就等两位大人向他转告双方秘书和译员可以会面的

日期和时间，以准备议和书来解决相关问题；此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署名人就能要求海陆军队指挥官停止目前的敌对行动。

之后，署名人将在于其身份相称的护送队陪同下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文，并向高贵的中国皇帝递交法国皇帝陛下的国书。

为了推进谈判进程，署名人事先准备了一份协议，请两位大人仔细审阅；一经双方认可，该协议可成为阁下与法国全权特使将要签署的文件的基础。

1860年9月3日，天津

桂良、恒福、恒祺致葛罗男爵函。

桂良、恒福以及帮办钦差恒祺通告如下，阁下8月30日来函收悉，我们确信阁下唯以和平为念，并不愿诉诸武力。

奉皇上之命，我们来此处理一些事务，并向阁下保证，1858年签订的条约应及时实行；今年3月最后通牒提出的、阁下8月30日信件予以重申的所有条款将被接受。我们写给阁下的信函可作担保，并请阁下下令终止目前的军事行动。

英国人要求的赔款仅仅是1858年索赔额400万两白银的两倍，而法国人今天要求的是当时已给予的200万两白银的四倍。因此，仅在这一条款上，我们必须做出公平的安排。

至于付款方式，只需要采取和英国同样的方式就可以了。

我们先将此封重要信函寄给阁下，至于哪天双方可以会晤并商讨阁下进京需要采取的措施，我们将另外写信商定；阁下应去北京换约，以确保永久和平。

天津，1860年9月4日

我并不想正式回复桂良大人，他要求我不要向中方索取四倍于

1858 年给予法国赔款额的赔款，而英国只要求当时所得之两倍。但是我派巴士达先生转告两位钦差大臣，这一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必须不折不扣接受我提出的条件。我们提出了与英国一样的要求，对此中国官员进行了颇为激烈的抵抗和充满苦涩的抱怨，但最终还是屈从了。与盟友英国人相比，我们的损失微不足道，他们的武器装备是我们的两倍，但和英国一样，我们将从中国海关的收入中获得 6000 万法郎的进账。

天津，1860 年 9 月 5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收到您的来信，我赶紧给您回复。我的想法和您一样，应该做好应付任何不测的准备。据说今天早上当有人说每位赴京特使的护送队有 1000 人之多，两位钦差大人听了没有任何不安，但他们恳求特使进京不要有大炮随行。

我想先派美理登先生前往北京，我认为，最好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和沙内海军少将的一名副官一起前往北京打点住处。

至于让两国特使和护送队一起出发，我怀疑是否会造成道路及宿营地的拥挤。额尔金勋爵也对我说过，两国特使不宜同时进京，不用说，他提议该他让步，让我先出发。

天津，1860 年 9 月 6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很荣幸早上收到您的来信，我迫不及待给您答复如下：

昨晚我已托巴士达转告阁下，巴夏礼将于几天后前往北京为

特使以及英国主要官员准备住处，我希望美理登能和您的一名参谋军官以及沙内海军少将的一名副官一起赴京。我们目前在准备天津条约签署事宜，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天，我们将一同前往北京。还要向将军说明的是，由于担心路上拥堵，我和额尔金勋爵打算不一起出发，但是我们说好在北京城外等候然后一起进城。

和您一样，我也认为 200 人的护送队足矣，但鉴于格兰特将军给额尔金勋爵派了一支 1000 人的护送队，不带炮兵，我认为您应该派同样人数比较合适。

我想在巴夏礼、美理登他们出发后三四天就动身前往北京。一旦确定了具体时间，我会写信告诉您，并希望您能派出您认为合适的护送队陪我上京。毫无疑问，我很乐意与您提前讨论接下来要采取的措施。

请接受……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额尔金勋爵再三坚持要从广州撤退，我一直不同意，因为我相信，欧洲人一旦撤出广州，不用多久，起义军必然将它攻占。

将军先生，至少 2 个月内，天津将掌握在我们手中，在赔款没有完全付清之前，我们将继续占领大沽、山东半岛北部以及广州，除非巴黎方面有新的命令。至于上海，考虑到当地的卫生状况，我和格兰特将军都同意让部分联军军队驻扎在此。在这点上，中国当局和我们意见一致。

在所有的信件和谈话中，我们一致赞同法英联军的所有行动，即攻占大沽炮台、直上天津、威胁北京。在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后，或作为其诺言的抵押，或是要迫使它兑现承诺，我们应占领几处地

方，威胁皇帝的最高统治。我认为天津、山东、广东最符合条件，部队可以在芝罘过冬，炮艇停靠白河，可直抵北京大门，这难道不是预防一切可能性的措施吗？

请接受……

联军从舟山撤退一直招致很多批评，但这是无法避免的，舟山群岛的主岛自 1848 年后被英军占领了多年，直到用它抵押的战争赔款全部付清，才正式归还中国。英国没有像当年占领珠江畔的香港一样占领扬子江畔^①的舟山群岛，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对于再次占领这座岛屿，法英两国政府必须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一方都不得对它实施单独占领。战争一开始，双方就认为舟山是一个很好的军事后方，可以成为我们的筹码，不管法英双方军队人数上的差异，两国应该对它实施共同占领。双方不得采取任何军事或行政手段破坏两国政府缔结的共同协议，而应平等相待，任何一方都没有优先权。继上海、芝罘、大连湾被占后，舟山群岛也被法英共同占领，中国政府感到不快，却又无可奈何。我们不得不担心，舟山群岛将成为以后联军纷争的根源。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可能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撤离该岛，留下另一方，如同当初我们同时占领它一样。

天津，1860 年 9 月 7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昨天我刚给您去信，就有人来禀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桂良并没有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拥有皇上授予的全权。

^① 此处应为扬子江出海口。——译者注

在我给您写信的这会儿，巴士达已经代表我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立场就不同于昨天了，我希望您能立刻动用您所拥有的全部兵力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而不是与护送队一起和平进京。

请接收……

又及：巴士达刚从钦差大臣处回来，他们已经承认无权签字，是在故意哄骗我们。因此，我们必须马上和他们断绝接触，并且拒绝进京。巴士达把此次调查报告给我后，我会马上给您呈上一份抄本。

请接受……

天津，1860年9月7日

巴士达伯爵致葛罗男爵函。

根据阁下的旨意，今天早上我与德拉玛神甫、特使翻译美理登先生一起拜访了帮办钦差恒祺。他是陪同桂良、恒福两位大臣前来天津的。

我叫人问他桂良是否真的像昨晚的传闻所说，未被授予全权；我还对他说，在掌握更多情况之前，您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在一番含糊其辞后，恒祺终于承认，桂良只是拿到了国玺，但今天他已给北京去函，要求授予他全权。我提请恒祺注意，盖了国玺的文件并不因此而具有强制性质，之后我坦诚相告，刚才在他说出事实真相后，可以肯定，桂良在本月3日信函中向您做出的保证，即作为钦差大臣被授全权与法英两国特使谈判，显然歪曲了事实真相。我结束和恒祺的谈话时，向他转告了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打算：明确要求海陆军队指挥官分秒必争，加快军事行动。

我随即同恒祺一起去了桂良住的衙门，看得出来，恒祺还在为

我与他的会晤而激动。我确实费了好大的劲才见到桂良。他的身体相当虚弱，我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怎么样，只能用“演戏”一词来形容他自我介绍的方式。我把问恒祺的问题拿来问桂良，他的回答和恒祺一样，只是措辞不同，他并不拥有全权，但是他答应给北京写信“提出授予全权的请求”。我没有忘记告诉他，您打算马上向军事指挥官发出请求，那时，专门由他们处置的事务虽然出于对中国政府“宽厚”而在事实上暂缓执行，但即将以一种更加有力的方式重新展开。

男爵先生，这就是我与桂良和恒祺之间会晤的情况，虽然描述简洁，但正确无误。

男爵先生，请……

莱昂·德·巴士达(签名)

1860年9月7日，天津

葛罗男爵致钦差大臣函。

署名人刚得到消息，非常吃惊，也非常伤心，两位钦差大臣曾向他正式宣布，桂良被皇帝授予全权，来协商解决中国与法英两国之间存在的纷争，但是事实完全相反，因此，已经开始并几近圆满结束的友好谈判毫无严肃性可言。

在这种情况下，署名人决定现在就收回他之前提出的、两位钦差大臣也已宣布接受的建议。署名人将随部队前往通州，如果能在通州与全权钦差大臣重开谈判，他有权提出在中国政府看来更为苛刻的要求。

在到达离北京城不远的通州之前，署名人将不再接收中国当局关于目前谈判的任何信件。

借此机会……

1860年9月7日，天津

钦差大臣致葛罗男爵函。

钦差大臣桂良特写以下信函：

我们刚刚收到阁下来信，情况已知。我们已将目前形势禀报皇上，估计一两天就能收到圣谕。既然我们两国已经签署协议草案，遇事就不必操之过急。请阁下在天津等待三四天，以便我们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巩固和平成果。

重要信函，寄送葛罗男爵阁下。

9月7日，天津

葛罗致钦差大臣函。

署名人刚收到两位钦差大臣阁下来信，要求他在天津继续等待几天。

署名人绝无可能改变联军决定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在早上写给两位大臣的信中已经说明。

借此机会……

1860年9月7日，天津

钦差大臣致葛罗男爵函。

桂良、恒福、恒祺……我们得知阁下将在军队的护送下北上；沿途居民陷入恐慌。当然，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贵国军队不会伤害当地居民。居民无知，只会担惊受怕，我们的责任是爱护百姓，因此我们打算今天亲自前往阁下住处，请阁下推迟出发。同时请阁下告知我们可以上门向其致意的时间。

恭祝阁下身体健康，事事成功。

天津，1860年9月7日

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刚得到确切消息，此前钦差大臣正式写信给额尔金勋爵和我，宣称桂良被中国皇帝授以全权，按照法英两国的要求解决与中国的分歧，但这一情况与事实大相径庭，已经开始了的、看来能产生一个圆满解决办法的友好谈判很可能只是一场闹剧，目的在于争取时间，让北京城至少在几天时间内免遭战争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收回之前交给钦差大臣的协议草案，并派人告诉他们，军事行动即将重启，而且更加猛烈，虽然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大度会推迟几天。

法国政府给我们的训令中预见的一种可能情况已经发生，在训令中有如下指示：

“……如果不得不越过天津，或是在天津扎营过冬，您就根据军事指挥官的意见或者想法来解决问题；但是有一种假设因其政治性质而需要您和您的同事预先加以考虑：也许我们军事行动的发展和成功会使中国皇帝对其自身的安全感到担心，并促使他决定放弃京城，退居到帝国最边远的地方去。这正是您应该加倍小心来避免的一个危险。事实上我们的意图也决不在于推翻当今中国之君主，等等。”

因此，将军先生，请您与英国军事指挥官取得一致看法；此外，若能证明联军向通州出发，或者接下来挺进北京，不会危及其作战基地并有成功之把握，那我就要求您尽快命令您的部队向前推进。

现在，协议草案已经不可能在天津签订了，而只能是在通州，

如果在通州我们的希望仍然落空，我们有可能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同时要尽可能避免出现帝国政府担心的可能情况，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这样的情况有朝一日可能会变为事实。

英国特使阁下也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件给英军指挥官，因此，我希望将军先生在和尊敬的英国同僚商量后，把你们要采取的措施告诉我。

请接受……

又及：我在同一天给沙内海军少将寄去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函。

1860年9月7日，天津

葛罗男爵致钦差大臣桂良、恒福、恒祺函。

署名人刚收到各位大人希望与他会面和要求他推迟动身的信函。署名人很遗憾不能同意诸位大人的要求。但是他想告知他们，普通百姓无须害怕联军，后者将尊重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关于这一点，民众将预先从指挥官发布的仁慈声明中得知。

一切本该在天津协商解决，署名人甚至以为只需办一个简单的手续就可以重建和平，然而现在，中国政府又把一切搞砸了。不过，如果真正拥有全权的钦差大臣能前来通州，我们还有可能在那里达成协议。

这仍是署名人最诚挚的心愿，因为对于帝国的幸福和繁荣，他不会无动于衷。

借此机会……

天津，1860年9月7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赶紧前来向您通报我此刻刚到的消息。北京城很平静，但到处是蒙古士兵。据说皇帝病得很重，不能出城。主战派获胜了。僧格林沁并没有复职，只是多了两名副将。北京的所有军队全部集中到了通州，以加强防卫。在大沽被击溃的蒙古士兵，现驻扎在通州郊外，人数达到 15000—20000 人。到处都是民防兵，如果我们前进，他们都将进行抵抗。这是今天早上从北京来的人告诉我的详细情况，此人怕得发抖，也有可能夸大了事实。德拉玛神甫下午 4 点去看他，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我立刻转告您。

这些消息也许反映了天津这里的人对我们的态度，不管是真是假，还是夸大其词，我总认为有必要向您传达。

请接受……

天津，1860 年 9 月 8 日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即将进军通州，若有必要，再由通州开往北京。联军将军们相信此次远征定能成功。额尔金勋爵及其准妹夫、英军总指挥霍普·格兰特爵士将带着 1000 人的先遣部队于明天早上出发。蒙托邦将军和法国特使将于后天早晨带着大约 3000 人从天津出发，联军剩下人员将分队跟随。我们将在通州停下，因为到了那里，如果两国达成和平，我们就撤退，否则我们就进军北京。我深信中国政府会妥协。

必须考虑到，此次远征非常困难，要组织一支驮畜队，雇一些大车、马匹以及一些苦力来搬运帐篷、行李、轿子以及特使团的粮食。特使团将陪同部队深入敌国并和部队一同野营。此次特殊且史无前例的外交行动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而言是多么艰难，但我认为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后天我将随部队出发，随行人员有特使秘书巴士达和韦努耶、美理登、德拉玛神甫、“杜舍拉”号舰长特里科海

军中尉、沙内将军副官约雷斯上尉、步兵年轻军官布尔布隆，此外，蒙托邦将军给我配备的还有3名中国文人、8名“杜舍拉”号上的水手，这支特使队伍只能随部队前行，和部队一起露营，也许只能靠军需处提供的口粮过活。一个步兵连及一些骑兵充当这支外交队列的护卫，以免他们因意外事件而脱离部队时孤立无援，遭受危害。

以下是我们的行军路线：从天津到北仓，10公里；从北仓到杨村，19公里；从杨村到蔡村，20公里；从蔡村到河西务村，25公里；从河西务村到马头村，18公里；最后从马头村到通州，25公里；从天津出发的帆船可走白河直达通州，通州离北京仅18公里，由一条运河和一条花岗岩石板路与之相连，这些石板是从满洲运抵直隶省，花岗岩石板路是冲击土质，找不到一块石头。

北仓，1860年9月11日

特使今天早上离开天津前往司令部；司令部夜里竟然失火了；好几匹马被烧死了。远征军是按照以下顺序出发的：开路的是两个北非骑兵，手持卡宾手枪；其后是我的轿子，由苦力抬着；后面不远处是总司令、参谋部以及旗手，紧跟其后的是兴高采烈的大部队士兵。可以看到，队伍行进期间，在两个北非骑兵前面相当远的地方，法军参谋的一些军官时不时停下来测定方位，把我们脚下那条蜿蜒曲折的田间道路画在纸上，这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做吧！到达北仓后，我不得不在总司令住的一座佛寺里过夜，四周是一些面目可憎的雕像。

第二天，也就是12日，一场瓢泼大雨让将军决定继续待在原地；只能等到13日雨停了再走。我们将在冲积平原上踩着淤积的泥沙行进。如果糟糕的天气再持续几天的话，马车和炮队将陷在淤

泥里动弹不得。

下午2点，一位清朝白顶官员交给我一封中方信件，内容如下：

辅政大臣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穆荫作为钦差大臣，很荣幸告诉阁下，从桂良及其同僚本月8日来信中得知，阁下意欲前往通州缔结和平协议，不愿与桂良及其同僚再有任何正式接触，而桂良他们想告诉阁下，皇帝下旨，贵国提出的所有条件都能通过协商得到满足。事实上，他们确已接到命令，要与阁下进行认真谈判并接受全部要求，以便协议签订后，得到严格执行。但是他们没有严格按照皇上谕旨行事，触犯众怒，以致阁下想要到通州谈判。而中法两国都希望缔结和平，如果阁下真的抵达通州，来回路上辛苦不说，军民还会因此而生猜疑和不安。既然帝国提出的所有条款都已被接受，那就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我们举行一次私人会晤确认该事实。我们刚收到皇上圣旨，命令我们前往天津与阁下商谈。今天我们就启程，在与阁下会面后，为巩固和平，所有的条款和协议都将敲定；这就是1860年9月10日急件我们想要告知阁下的事情。

杨村，1860年9月13日

我们今早从北仓出发，当天抵达杨村。一路很顺利，鞑靼官兵没有出现，居民惊慌失措，都逃到了乡下，村子几乎是空的。

以下是我给两位新任钦差大人的回信。

安平营地，1860年9月11日

葛罗男爵致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与穆荫函。

署名人已收到两位大人来信，得知皇帝已经命他们前往天津商

谈；两位大人还劝署名人避免进军通州所带来的不便及劳累，同时表达了对军民受扰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

两位大人完全清楚，署名人在天津就已毋庸置疑地证明，他是多么希望看到和平能尽早恢复，他甚至就一项协议与桂良及其同僚进行了非正式谈判，而这项协议在经过数次个别讨论后，已被桂良他们所接受；不料就在这项协议需要签署之时，桂良竟提出画押之事必须请示北京。

由于担心会再次出现延误和再次感到失望，署名人决定前往通州；如果没有新的障碍迫使署名人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新的谈判可在通州举行。

两位大人完全明白，法军总司令已经采取了他所能采取的所有措施，防止造成群众恐慌；如果两位大人担心发生的事是署名人决心所致，那么中国政府应是唯一责任人。

借此机会……

1860年9月13日

钦差大臣的第二封来信是通过英国特使专员瑟罗先生在路上转交给我的。我们此时正在穿越一大片高粱地。所有村庄里的房子都是夯土建成的；有几座砖塔，以前应该很漂亮，但是现在又脏又破了。额尔金勋爵派人告诉我，中国官员希望我们在河西务村安营，前往马头村和他们谈判；而后可去通州签订合约，进而在每国1000人的护送下进京交换1858年条约批文。如果这样的安排出于真心，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把中国政府逼入绝境，我们什么好处都拿不到。

我们将于明天出发前往河西务村。杜吕克神甫走在北非骑兵和我的轿子之间；他现在作用不小，讨中国人喜欢，常常引得他们哈

哈大笑。

以下是我刚才提到的信函内容：

辅政大臣、怡亲王载垣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很荣幸致函葛罗男爵。

我们接到皇帝命令，任命我们为全权代表，前往天津与阁下谈判。

您提出的所有条件已于9月10日被接受，对此我们已经写信告诉您了，想必您已明白。但是我们得到消息，阁下已经带着部队从天津北上，此举实在令人不安。既然贵国和中国政府都希望缔结永久和平并就合约条款取得一致意见，这样的进军有什么好处呢？如果阁下命令部队继续前进，那么，阁下想要的已经不是和平，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宜继续天津之行。因此，我们恳请阁下让部队退回天津，以表明我们之间并无敌意，我们也可以前往天津，与阁下谈判并且签订一项永久的和平协议。如果阁下愿意在原来商定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而不提出新的条件，那么，与桂良不同，我们将信守诺言。

但是，如果阁下非要带着部队继续前进而不愿意后退，那就证明阁下并非意在和平；如果联军与河西务村的驻军发生什么冲突的话，就会给协商带来巨大阻碍，而这种冲突我们无法保证不会发生。我们希望阁下能慎重考虑。

我们已经抵达马头村，等候阁下的回复。我们很希望阁下能告诉我们法军将退回天津的决定，这样我们也能立刻赶往天津。

此信寄送葛罗男爵阁下。

1860年9月11日

杨村，1860年9月12日

葛罗男爵致钦差大臣函。

署名人在杨村收到两位钦差大臣本月 11 日信函，信的内容有必要再提一下。署名人深思熟虑，中国政府似乎至今都不愿意看到它如何因缺乏诚信而处在了危险的境地。对此，署名人自来到北直隶省海湾以来写给中国当局的全部信函可以证明。

当时开始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唯一的原因是中国尚未答应法国的赔偿要求；不过，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善意，军事行动即使在法律上没有停止，至少在事实上是放慢了，因为在天津时，署名人曾以为看到了希望，和平真的就要恢复了。

希望落空后，署名人不得不要求法国军事指挥官加速军事行动；眼下他打算前去通州，在他抵达通州时，如果钦差大臣真心实意接受法国提出的要求，那么和平将恢复，军事行动将停止。法国特使也将带着与其身份相称的护送队友好地进京换约。反之，如果中国政府仍然无视自己的切身利益，让人阻止我方军队前往通州，军事行动将继续下去，并超出这座城市，军队将立即挺进北京。

阁下有两种选择：要么在通州缔结和平，要么开战。中国政府应该清楚，后者只会给它带来不利的结果。

借此机会……

河西务村，1860 年 9 月 14 日

特使和军队今天抵达河西务村，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居民几乎全部逃离。额尔金勋爵昨天抵达此地，住进了一座很漂亮且非常整洁的寺院。将军把司令部设在村外路边的一座塔内，这条路一直通往北京。我在一位富有的小学校长家里住下了，尽管我再三恳请，我的入住又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位校长先生还是弃家而去。

被额尔金勋爵派往马头村打前站的巴夏礼先生来信说，钦差大臣已经逃往通州，他将手持白旗前去会晤。

额尔金勋爵的第二翻译官威妥玛先生将陪同前往。

白天，一位做过广东道台名叫蓝蔚雯先生的高官前来拜访。他说额尔金勋爵身边没有翻译，所以没能接见他。一会儿，三名级别稍低的中国官员给我带来了两位新任钦差大臣的信函，其中一位就是皇帝的近亲怡亲王。我派人给额尔金勋爵送去了抄本。以下是信的内容：

1860年9月13日

怡亲王载垣和军机大臣穆荫致葛罗男爵函。

辅政大臣、怡亲王载垣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特此照会：

我们于9月13日收到阁下本月11日来信，得知阁下不想再有任何延误，有意前往通州；我们则奉皇上之命，已离开京城前来与阁下商谈；我们真诚希望中法两国之间恢复和平，希望能与阁下展开商谈，以建立和平并使之持久。

我们不得不提醒阁下，在河西务村的驻军只服从于他们的军事将领，我们对其毫无管束力。我们刚刚得知，陪同阁下的军队已经抵达河西务村，如果与我方军队相遇，我们担心冲突将不可避免，这恐怕会将我们重建和平的愿望付诸东流，岂不令人惋惜？

在阁下11日信函中，我们注意到阁下的愿望是推进到通州。我们无意阻止阁下实施其计划，相反，我们也希望与阁下一致意见。如果阁下同意让其军队在杨村、蔡村、河西务村扎营，而不是继续北进，那么阁下就能按照在天津谈妥的进京约定，带着少数非武装随行人员赴京，并能来通州与我们商谈为我方全部接受的协议条款，拟定协议文本、画押并盖章，然后阁下便可进京交换条约批文；为避免耽误事情，中国政府将负责为阁下提供车辆及其旅途方便所需的一切。故此，我们急需知道随行人员数量，以便提前做好一切准备；我们将为阁下提供一支护送队，可以沿途通知中国驻

军不要给阁下的行程设置任何障碍。为了让阁下尽快出发，我们将命令当地官员将阁下军队需要的物资集中起来，送到阁下营地。我们非常希望在充分表明我们的诚意之后，缔结和约的愿望不会落空，我们也愿意相信阁下的心情和我们一样。如蒙阁下及时回复，我们将十分高兴。

重要信函，寄送葛罗男爵阁下。

河西务村，1860年9月14日

我等着巴夏礼和威妥玛回来，以便给钦差大臣回信。我认为中国政府最终决定让步了，但是朝廷大臣的信件让人不快；他们关于鞑靼士兵的思考，说什么对军队做不了主，还有要求我们的护送队不带武器的昏话，这两点倒是要我们多加思考了。

河西务村，1860年9月14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赶紧把刚收到的消息告诉您。三位中国官员刚给我送来了两位钦差大臣的信件，但巴夏礼在马头村并没有见到两位大人，据说他们逃走了。中国政府要求议和，既然我们要求在通州签署和约，两位钦差大臣就在通州等我们，他们谈到鞑靼军队时说什么做不了主，要求我们不要越过现已被我们占领的杨村和河西务村。如果我方军队在此扎营，中国政府将为其补充给养。若是需要马车和马匹和平前往通州和北京，他们可以提供，并派人护送，中方还可以负责安排特使的住处。不过，中国人要求特使的护送人员不能太多，且不带武器。这差不多就是德拉玛神甫匆忙翻译给我听的内容；我一拿到信的译文，就会给您一份抄本。额尔金勋爵和我都认为，军

事行动应该停止，我们的军队不需要越过马头村，按照巴夏礼先生昨晚从该村写来的信，这个村子糟糕透顶，又没房子又没庇护之处；但是，如果在这方面唯一有能力作出判断的联军司令官想要待在这里或附近，事情也比较好办，所需物资可由白河运送；如果觉得合适的话，不妨在此一直待到我们北京之行结束，再撤回天津。

额尔金勋爵和我很可能还要在这里待上两三天，一旦作出决定，我就会把最新情况通知联军司令官。

河西务村，1860年9月15日

上面提到的满清官员蓝蔚雯的一个信差偷偷离开联军军营前往通州，正巧被巡逻的锡克骑兵发现，从他身上截获了一封写给通州道台的信件。下面是几段摘录，颇有价值。

“昨天早上，一到河西务村，我就忙着办正事，尽一切可能阻止联军继续北进，并弄清楚英国人为何拒收我方信函。紧接着给您派了一个信差，也请您将信转交载垣亲王及其同僚。巴夏礼还没有回来，我便找了一个办法，把那封信转给了英国人，我敢向您保证，信已到了英国人手里。我知道他（额尔金勋爵）完全明白信里的意思，但他要等巴夏礼回来才会复信。这样我就留了下来。大概是中午12点，或是下午2点的时候，法国特使葛罗男爵来了，通过他的译员，我知道他已收到最近的一封信。今天早上我去他那里要个答复，他说必须等到巴夏礼和其他翻译回来，而且法英两国将同时给出答复。我认为法国人容易通融。我提出，既然打算议和并缔结和约，联军就必须停止前进，在河西务村扎营。我认为这些建议将被采纳。有人告诉我，通州之行的随行人员是2000人，带武器，因为他们认为，一支不带武器的护送队就像是一些不戴帽子行走的中国人！有人还说，随队不带大炮，第一站是马头村，第二站是通

州。还说沿途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希望我方负责物资集中。

一到这里，我就发现田野里到处是军队。我还去看了，他们很有军人气派，营地可自由出入。他们吹嘘说是保护这个地方，实际上到处抢掠。居民苦不堪言，如果能就此达成和平协议，无人不跪谢皇恩。

我料想前往通州的路上肯定都是军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该怎么办。我恳请阁下敦促亲王和他的同僚细加考虑，避免沿途再出现任何纠纷。昨天我来的时候，遇上一些骑兵，他们一直送我到安平等地，离河西务村太近。

请接受……”

巴夏礼和威妥玛从通州回来了，他们见到了钦差大臣。但很快又要回通州，我这边将派巴士达先生带着准备好的协议与他们一同前往。蒙托邦将军要我派美理登和杜吕克神甫协助巴士达。德拉玛神甫留在这里，我身边总得有位能帮助我与中国人交流的人吧。

河西务村，1860年9月16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巴夏礼先生从通州返回，他与载垣和穆荫协商了8个小时。他发现对方缺乏诚意。我在等他们的一封信，内容我已经提前知道了。对协议草案的唯一修改就是我们的部队可越过马头村6里，可是马头村资源匮乏，而在我提议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我没记住，有所需的一切，给养也不成问题。额尔金勋爵和我商量后，今天将给他们答复，到时候也给您寄上一份抄本。

我现在所在的村子荒无人烟，买不到任何东西，全都被中国的

盗匪抢走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我的处境将十分窘迫。我写信给将军是希望将军把我这里的苦力、车马以及使团成员看成部队的一部分，为我配给必需的军饷。再说，这样的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也许我们还应该向前推进，以免中国人对我们在此休息产生误解。我希望今天能找个时间和您面谈这些事情。

我的 40 名苦力以及他们的头都已逃走，但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被锡克骑兵赶走的。

昨天傍晚我在额尔金勋爵那里见到了威妥玛先生，他给我讲了他在通州与两位钦差大臣会晤的情况。载垣又虚伪又凶恶，看起来年轻有礼；穆荫很沉着，狡猾，看起来很随和。尽管断言对此前天津和约的草案一无所知，他们还是全都接受了，还再三强调，怡亲王这个头衔能顶世上所有的“全权”，并一再要求联军不要越过离通州还有 5 里的一个镇子。特使护送队人数不超过 1000，且不能带大炮。

明天早上，我将派巴士达先生、美理登先生和杜吕克神甫带着我的信函前往通州。

请接受……

河西务村，1860 年 9 月 15 日

致巴士达伯爵的训令。

我请巴士达先生与美理登先生一起前往通州，给钦差大臣带去我的信函，并与他们会晤。

除了我的信函之外，我还交给巴士达先生在天津准备的法文和中文版协议草案。

会晤必须问清楚钦差大臣应该拥有的全权证书。1842 年耆英和 1858 年桂良所拥有的全权证书是有效的，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出

示同样的证书。

和平协议将在通州签订，内容与在天津时准备的相同。

法国军队不会进入通州城，而将在离城至少还有 5 里的地方扎营。

如果谈判进展顺利，军队将不再前进。

在北京进行条约换文后，军队将撤回天津。

特使将在不带火炮的 1000 人护送队陪同下进入北京和通州。

如果联军司令官愿意，他们和随从将随特使进京。

在特使和联军司令官将要过夜的城市里，中国政府得为他们准备合适的住处。

特使将为其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支付费用。

特使如果需要马车、苦力或者马匹，中方将予以提供；特使将支付相关费用或租金。

营地将尽早设立集市。通过议价和现金交易。

巴士达先生愿意就特使随行人员和物资向怡亲王载垣提供一切可能的细节。

要说清楚，我们真诚渴望和平，但和平的条件是必须满足法国的全部要求。

要对中国钦差大臣十分友善，对怡亲王要十分尊敬，但同时要非常坚定。特别要提到法英两国特使关系融洽，一切行动步骤都经过事先协商。

巴士达先生一得到钦差大臣的回信就立刻向我禀报。巴夏礼将于今晚前往钦差大臣处。

通州附近那个我军不能逾越的地方应该是张家湾。

蒙托邦将军的翻译杜吕克神甫将陪同美理登先生前往。

我无须向巴士达先生强调，如果钦差大臣提出新的建议，他不

得接受，而必须向我禀报。

1860年9月15日。

葛罗男爵(签名)

河西务村，1860年9月16日

葛罗男爵致钦差大臣函。

委托巴士达先生转交。

署名人收到两位大人本月13日信函，获悉通州方面将做好一切准备接待他，以便经过共同协商，法中双方全权代表就天津非正式商定的和平协议条款达成一致看法，并进行协议拟定、签字和盖印事宜，阁下宣布接受协议全部条款之后，署名人便可前往北京；北京也会做好准备，迎接特使及其随行人员和护送队。但是，阁下希望法国军队不要继续北上（有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河西务村），让部队在河西务村附近扎营，中国当局将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阁下还指出，北方的军队只服从于他们的军事将领，钦差大臣对他们都做不了主，如果双方发生冲突，将会损害中国政府缔结合约的愿望。最后，两位大人还要求在署名人前往通州和北京时，只能带人数很少的护送队，且不得随带武器。阁下将为署名人提供马车和其他必要的交通工具，还将派人护送。在信函最后，两位大人还表达了希望重建和平的强烈愿望，并坚信署名人怀有同样的心情。

两位大人并不怀疑署名人怀有看到两国之间迅速恢复和平的强烈愿望，这是对署名人公正的评价；不过，他想要的和平应以满足法国全部要求为前提，还需要条约作担保，因为经验证明，中国政府太不信守诺言了。

本着和解的精神，也应两位阁下的恳求，署名人答应请求法军司令下令让已经抵达河西务村的先头部队不要进入通州城，而是在

离城还有五六里的地方扎营。署名人将带着与其身份相符的护送队前往通州，指挥官们将率领 1000 人的精锐部队陪同署名人前往北京。

此信将由巴士达伯爵转交两位大人，巴士达伯爵是法国使团的一等秘书，由两名翻译陪同，他将向阁下提供必要的解释，以便作出有助于署名人通州和北京之行的安排。

署名人希望能尽快重建和平，中国政府此时也不要节外生枝，做出任何与此希望背道而驰的事情。

谨致……

河西务村，1860 年 9 月 17 日

我离开了村子里我所居住的唯一没有遭洗劫的房子；留下半个警卫队，自己搬到蒙托邦将军住过的寺院里，将军已于今天早上出发前往张家湾附近谈妥的驻地扎营。我把在住处发现的铜钱上缴给部队财务处，在我们离开后，这间房子肯定会被翻个底朝天。我问财务部门要了收据，一有可能这笔钱将还给其主人，一共 160000 枚铜板。

巴士达先生、美理登先生和杜吕克神甫作为谈判代表，今早 5 点就带着护卫队前往通州了。

额尔金勋爵的所有苦力和马车晚上全部逃走了。他和我一样都在等待军队和中国政府的帮助。

河西务村，村外寺院，1860 年 9 月 18 日

柯利诺将军的营地。将军带着千余名士兵于前一天晚上刚刚抵达。

我们听到村子里响起几声枪响；我派布尔布隆先生前去了解情

况，他回来禀报说，1200 到 1500 名中国强盗袭击了河西务村，打伤了当铺的英国警卫。锡克骑兵向强盗发起攻击，打死 15 人，打伤 20 多人，还抓了 50 多人，其中有几个是我们在天津雇佣的苦力。

有人告诉我，从张家湾方向传来隆隆炮声，那里正是联军将领们前往扎营的地方。一名锡克骑兵急速驶过营地前往河西务村，他一边飞马奔走，一边向我示意，北面已经打起来了。等巴士达先生从通州回来时，我们已有一个小时没有听到炮响。他告诉我，遵照我的明确指示，尽管同行的人一定要等到天明才离开通州，他一接到载垣亲王的回信，于凌晨 2 点离开了通州。前往通州时，一路畅通无阻，而回来时发现沿途都是僧格林沁的部队。巴士达先生从人群中穿过，竟没有招来一句难听的话。回到蒙托邦将军处，发现他正在做准备随时应对不测事件，看来要出事，因为联军即将与鞑靼军队对峙。他在将军那里待了一个小时，然后赶到我此时所在的露营地。当巴士达先生听到三声炮响，平原上随之枪声四起之时，他已越过法军阵地，看不见法国军队了。有人肯定地告诉我，鞑靼人包围并杀死了陪同沃克上校从通州回来的一位军队会计和他的护卫骑兵，上校受了伤，但逃脱了，鞑靼士兵冲他开了三炮，战斗随即打响。敌人卸下了 70 门大炮的伪装，支持炮队的是一支人数众多的骑兵队；但是，一个多小时后，敌军全线溃败，大炮几乎全部落入蒙托邦将军之手。一位年轻军官，还是复辟王朝时期外交大臣达马斯男爵的儿子，不是在这次战斗中，就是在战斗后死亡！这至少是我听到的说法。

我认为钦差大臣对僧格林沁的背信弃义毫不知情，后者大概还想再碰碰运气。从之前引用过的中方来信中我们可以得知，文职官员对军队是做不了主的，而且他们担心这样的冲突会危及法中之间

达成的谅解。

中国官员没有再写信来，我对巴夏礼先生、杜吕克神甫、《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格朗尚中校、洛图尔先生、杜比军需助理、罗亨利先生以及护送他们的联军骑兵等人的命运十分担心。如果回营途中他们遇上了逃散并被失败所激怒的小股鞑靼士兵，一切令人担忧。

以下是巴士达先生给我带回的信函。

河西务村，1860年9月17日

怡亲王载垣和穆荫致葛罗男爵函。

阁下的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在两位翻译的陪同下已于今天抵达通州。他向我们呈交了阁下的信函，我们完全理解阁下的意思。

至于最近在天津商定的八项条款，没有一条我们不能同意。我们被授予的权力之范围，是以往其他谈判代表的权力所无法比拟的。

奉皇上之命处理事务，应以恢复两国和平为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同意阁下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们言而有信！

阁下前往通州时，希望护送队的人数和英国代表的一样。其余部队不得行进至张家湾，而应驻扎在该城往南5里（2公里）处。一旦协议签字盖章，贵军不得再前进一步，而后将奉命撤退。

重要信函，寄送葛罗男爵阁下。

河西务村，1860年9月18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巴士达先生从

通州回来，肯定地告诉我，我们听到的这次交火发生在我们承诺不越过的防线这边。因此，袭击显然是僧格林沁的鞑靼士兵发起的，恐怕这是僧格林沁想下的最后赌注了。额尔金勋爵和我一样，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但是，今天早上他派人告诉我，他认为英国骑兵无意中越过不该逾越的防线，引起了这场冲突。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此次冲突的结果，以及对钦差大臣的影响。他们写给我的信函还是友善的，不过这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写的。

我将派美理登先生前往通州找几个抬轿夫，没有苦力我寸步难行。我希望中国当局给我派上 40 名苦力和几辆马车，这是他们原先答应的，但愿能早日兑现。额尔金勋爵也在等交通工具。来的苦力应该由一名管得住他们的下级官员率领。

我们也开枪了。120 到 150 个中国盗匪进入了河西务村，他们袭击了当铺的英国警卫，并把他打伤了，但是哨兵最后得以逃脱，还打死了一个中国人；闻讯赶来的巡逻队向强盗发起进攻，打死十几人，打伤三十几人，活捉 50 人。我住过的房子由半个连的人看护着，这是村子里唯一没有遭到抢掠的地方；不过，等我们走后，这幢房子将被洗劫一空，对此我毫不怀疑。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今天的事件会将我们置于何种境地？也许明天我会得到答案。

请接受……

河西务村，1860 年 9 月 18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刚收到您的来信，从而弄清了昨天发生的交火事件，同时获悉在河西务村的全部驻军将前往与您会合；但我完全不知道是如何

安排我与整个兵营一起出发的，我的所有苦力都逃走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得问柯利诺将军借用一些了。额尔金勋爵刚带着 50 名锡克骑兵离开。

我和我的同僚都认为，联军现在应该向通州进发，必须保住这个城市，我们将在那里签署在天津就已准备好的协议。如果中国政府再次背信弃义，我们将武装挺进北京，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由于担心被押通州的巴夏礼先生的命运，额尔金勋爵骑着马带着锡克骑兵先出发了，在此信到达之前，他会见到您的。我们已就目前形势下该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共识。他把所有行李都留在了河西务村，派了许多护卫看管。

读您的信让我有不祥的预感，难免伤心。我非常担心可怜的杜吕克神甫和其他欧洲人落到了溃逃中的鞑靼士兵手里，会被他们用作祭坛上的供品。中国人刚刚接受的教训十分严厉，但我们的代价极其昂贵。

帮办大臣恒祺本该今天给我派来苦力和马车，但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势必把一切都搅乱了，故我不认为今早从通州启程的美理登会给我带回什么交通工具。我也只好听凭柯利诺将军安排了。

请接受……

大清庄务村露营地，1860 年 9 月 19 日

柯利诺将军于 19 日带着一小队人马离开了河西务村，前去与总司令会合。沙内少将刚从水路抵达，乐意将他不再需要的轿夫给了我，这样我可以和部队一起出发了。美理登先生和“杜舍拉”号上的外科医生于早上 6 点出发返回通州，催促中国官员给我派马车和苦力。

晚上 9 点我们才抵达大清庄务村。我住在一间离司令部很远的

大房子里，所有的房间都堆满家具、衣物、玉米、高粱和碎瓷器。鞑靼士兵路过此地，一切都被破坏殆尽。我还在那里发现了子弹、火药、军徽和一些黄铜做的多米诺骨牌，骨牌上的点数和我们玩的一样，都是刻在上面的。在利尼埃尔先生的指挥下一队步兵将负责特使的安全。

得到的消息令人不快。巴夏礼先生、杜吕克神甫、格朗尚上校都没有回营地，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联军司令官昨天已写信给通州道台，要求让失踪者回到各自营地，并对他们可能遇到的意外负责。威妥玛负责将此信送到通州。

额尔金、威妥玛先生、雷布尔先生、司法长官奥斯曼以及弗利上校凑巧在我的住所碰面了；威妥玛讲述了他昨天的通州之行：带着随从来到敌人岗哨前，他出示信函，一个人上前。他所招呼的那个鞑靼骑兵笑了起来，拿枪瞄准他开了一枪，又重新装上子弹。威妥玛退了回来，朝另一扇门走去，他没有遇到阻碍，被带到道台面前。这位中国官员很冷静，但是听说巴夏礼先生和他的同伴们音讯全无时，他感到十分惊讶，说他们早在战事发生之前就出城了。威妥玛先生知道亲王和兵部尚书已离开通州去了僧格林沁处，道台先生说他很快就给联军指挥官回信。

额尔金很不安；令中国人讨厌的巴夏礼先生的命运一直牵动着他的心。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巴夏礼一个人就可以顶一支部队。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越想越觉得不能再犹豫：必须马上进军北京；但是，只有联军指挥官才知道，能否挺进北京，将其攻下并在那里安顿下来。对于一位将军而言，能够在其业绩表上记下某年某月让祖国的旗帜在北京城墙上飘扬是极大的荣誉，这可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一支法国侦察队正前往通州；明天我们将向前挺进，彻底击溃

据说在通州另一头重新聚集起来的鞑靼军残余。

大清庄务村营地，1860年9月19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在河西务村收到您的回信，从信中得知，中国人打算用可怕的阴谋对待我们的诚实，再次因自己的行为而接受严厉的教训。

通过正式照会和钦差大臣商定的协议，因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而在事实上和法律上不再有效，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我们采取一切措施让这个政府为自己再次不讲信义感到后悔，并迫使其答应法国提出的全部要求。

目前情况下，占据通州并向北京推进也许是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唯一办法，但是这应由联军指挥官根据此类征战的获胜概率行事：要考虑到所能支配的军队力量、季节气候，还有必要的谨慎，因为有好几名军事或文职官员还在鞑靼军队或中国当局手里，额尔金勋爵和我对于他们的命运十分担心。如果大沽、天津、通州和北京都被我们占领，那么，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只能选择屈服，或者逃往鞑靼地区。而后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一直力求避免的，但其作用已经不大，因为我们必须让中国人因其可憎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的行为令我们忍无可忍，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必须向他们表明，愚弄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

请接受……

大清庄务村，1860年9月19日

蒙托邦将军前来拜访我；他想继续追击，击溃僧格林沁的营地，据说，僧格林沁的部队又在北京附近集结了。特使将随部队行

动，中途住进一家农庄。他将在那里等候将军的指示，直接前往通州，或者去将军所在的司令部。

特使团于21日清晨从大清庄务村出发，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住下了，周围是豪华的陵墓。11点钟，我们听到激烈的炮击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4点，一名军官给我捎来了将军的便条，告诉我僧格林沁已被彻底打败，八里桥附近的营地也被攻占。在攻克的黑毡营地的帐篷内发现了从巴黎寄给我的一捆完好无损的信函，这让我十分意外。

我动身前往司令部，由于向导走错了路，穿越了整个英军营地，晚上9点才到达。

我住进了一座寺庙，里面很脏，破烂不堪，连一条凳子都没有。桥上、路上布满身穿黄色衣服的中国士兵的尸体，黄色在中国是皇帝用的颜色。桥是花岗石砌成的，很漂亮，坐落在一条运河上，这条运河将北京和白河流经的通州连接在一起。

八里桥附近的寺庙，1860年9月22日

一位白顶官员，手里拿着白旗，送来一封通州来信。信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写来的。他向我保证，所有被中国人扣押的欧洲人都得到了善待，一些人目前在北京，另一些人在内地。

两处营地的军需品不够了。沙内海军少将又沿白河而下，催促船队加紧运送。

以下是恭亲王的来信：

恭亲王致葛罗男爵函。

全权钦差大臣恭亲王照会葛罗男爵。

由于怡亲王载垣和军机大臣穆荫办事不力，皇上已下旨将他们革职，另下谕旨，任命我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谈判事宜。我立刻命令恒祺、蓝蔚雯等人前往与阁下会面，共商议和大事。希望阁下

能停止军事行动，以便缔结和约。

这就是我此次写信给葛罗男爵阁下的目的，1860年9月21日。

八里桥，1860年9月22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殿下函。

本函署名人收到恭亲王殿下昨天的来信，得知亲王殿下已被任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其谈判两国重建和平之事。

首先，署名人必须提醒恭亲王，多名法国皇帝陛下和英国女王陛下的臣民遭中国当局扣押，目前被关押在北京。

联军指挥官命通州最高当局让早先在通州的法英两国军事或文职官员尽早回到各自营地。

到目前为止，署名人既没有他们的音信，也没有收到中国当局关于此事的消息，因此，署名人恳请亲王殿下将所附信函交给被押北京的一名法国人，让他转告其同胞。这封信嘱咐他们立刻回到署名人身边，署名人必须告知亲王殿下，只要被押人员没有回到法军司令部，他就不会要求法军指挥官停止军事行动，其本人也不可能重启和平谈判。

联军指挥官告知通州道台，如果阻碍被押人员返回各自营地，中国政府将承担严重后果。

1860年9月23日

大清帝国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恭亲王致葛罗男爵阁下函。

我刚收到阁下来信，信中阁下要求还没有回营的贵国官员立刻返回他们的营地。在仔细阅读信函后，我想告诉阁下，经查，这些官员来到通州，与前任钦差大臣载垣及其同僚讨论贵国提出且已被接受的八项条款，我们料想这应该令阁下满意了；这样就只有贵国

向皇上递交国书的问题需要商讨，但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这些官员大为不快，离开了通州城。不料途中遇到双方军队交火，混战中失散被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不想恢复和平。他们现在都在京城，没有受到虐待；但因和平没有恢复，现在还不能将他们送回。如今天津城和大沽炮台被你们所占，军队尚未撤离，贵国几个官员暂时不在，会对你们造成什么损害？

如果两国缔结和平，军事行动终止，贵方战舰撤出大沽河流域，那么，在对提出的每项条款进行商讨和敲定之后，为巩固和平，我们将在确定这些官员的身份后，将他们送回。至于阁下写给他们的信函，由于军事行动尚未终止，转交信函多有不便，等军队撤离后，我们才能把信函转交给他们。

重要信函，寄送葛罗男爵阁下，1860年9月23日。

八里桥，1860年9月25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署名人刚收到恭亲王殿下本月23日所写的信函，这封信似乎会使中国政府的处境更加危险。如果中国政府出于文明国家才有的名誉感和公正意识，立刻将在押官员送回联军营地，那么和平协议很快就能签署，贵国也无需遭受战争之苦。据钦差大臣所说，当时这些官员正从通州回来，因此，扣押他们完全违反了国际公法和礼节，他们是作为谈判代表前去通州的。

联军指挥官手持武器，俘虏了不少鞑靼士兵，但最后都把他们放了。至于在战场上发现的敌军伤者，他们都在我们的医院接受与我方士兵一样的治疗。愿中国政府比较一下双方的行为，或许它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羞愧。

署名人认为，要答复恭亲王，最好的做法只能是将收到恭亲王

本月 21 日信函时正要寄给钦差大臣载亲王的信转寄给恭亲王。今天，署名人特别强调此信所具有的重要性，将它寄给恭亲王。希望恭亲王阅读时用自己的名字替换载亲王的名字即可。

署名人不相信殿下会赞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的背信行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看来是要将清王朝引向灭亡，因此我恳请亲王殿下防止还有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希望殿下立刻送回那些被中国政府无视国际公法和公正而扣押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将他们送还联军指挥官，而后者已将因战争而光明正大落入他们之手的俘虏全都释放了。我希望一切能像本月 18 日通州背信事件之前所商定的那样，在通州重启协商并签订和平协议，然后在北京换约，法国军队将不再前进一步；相反，如果在北京一切顺利，法军将立刻从北京周边撤离。

署名人认为有必要正式通知殿下以及军机大臣，法国政府希望在位王朝能继续其统治，不愿看到其首都变成废墟，期盼两国重建和平；但是，如果尽是不计后果地盲目拒绝，或像多次表现出来的那样缺乏诚信，中国政府不接受法英两国的正当要求，那么将由战争的胜负来决定一切。

中国政府不应该忘记，战争的结果至今一直对它不利，出于善意，署名人提醒殿下，如果握有决定权的亲王殿下拒绝给予署名人以中止军事行动的理由，那么战争给天朝造成的后果肯定远比现在严重。

在本函日期以后的三天内，署名人静候亲王殿下答复。倘若中国政府接受信中的全部建议，那么，一旦通州和北京的事情办完，法国军队将立刻退回天津过冬；中国政府缺乏诚信并因此造成时间上的延误，致使联军不可能在冬天到来之前撤离，中国政府必须接受对其所犯错误的惩罚。

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接到殿下令人满意的答复，署名人将敦请联军指挥官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措施进驻帝国首都，让中国政府

知道，违反国际公法侵犯法国皇帝陛下和英国女王陛下的臣民，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的。

署名人……

八里桥，1860年9月25日

拟给钦差大臣怡亲王和穆荫，后改寄新任全权代表、皇帝胞弟恭亲王的信函。

本函署名人刚收到两位大人通过特使一等秘书转交的信函，后者有幸能与他们在通州会面。之后发生了严重事件，署名人因此未能尽早回信。

两位大人和署名人商定的安排，在双方来往信函中得到完全确认，为了执行这些安排，法英联军放心地朝着指定的扎营地前进，但是当他们离该地还相当远的时候，鞑靼军队违背国际公法和起码的礼节，打伤或者打死了几名从通州返回的欧洲人，他们是作为谈判代表前往通州筹备下一步议和事宜的。傲慢的僧格林沁自认为能击败联军的先遣部队，结果自己溃不成军，不但因背信弃义而名誉扫地，还遭到一场灾难性的失败。

由于僧格林沁的背信弃义，联军不用再履行其信守的承诺，向鞑靼将军在首战失利后设在八里桥的军营发起了进攻，迫使僧格林沁再次弃营而逃，白白损失了手下的精兵不说，还将整个营地让给了联军。

两位阁下数次来信说，他们言必有信，不会像不守诺言的桂良那样行事。署名人对此一直坚信不移，他的希望一定不会落空。如同双方约定的那样，和平协议仍可在通州签署，只是形势有所不同，一是僧格林沁的部队遭遇两次失败，二是联军营地靠近通州，而非张家湾。

因此，按照之前的约定，协商可在通州举行；和平协议在通州签署后，署名人将前往北京交换 1858 年条约批文。北京换文结束，驻守北京附近的法国军队将撤离。

接下来的三天，署名人将等待对此重要信函的回信。此函再次为中国政府提供了缔结和平的机会。

署名人不得不正式向阁下声明，法国皇帝陛下真诚希望目前统治中国的尊贵家族能保住王位并更加巩固；然而，在署名人看来，联军占领北京城会使其面临重大危险，而这一种不测事件发生之前，署名人仍愿做最后一次和解尝试；因此，要么在通州签署和平协议，要么联军挺进北京。

署名人借此机会……

八里桥，1860 年 9 月 26 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我刚收到阁下写给钦差大臣恭亲王的信函的副本，谨表感谢。在回执中，我附上了写给这位钦差大臣的信函副本。阁下可从中看到，我要求释放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臣民，提出的条件与我要求释放被中国当局违反国际公法拘押的法国人所提出的条件一样；阁下还可以看到，我完全同意分担阁下在其发货清单中提到的连带责任。

您忠诚的……

八里桥，1860 年 9 月 26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很荣幸随函寄上昨天我给恭亲王的信函之副本，这是我对他

最近一封来信的回复，恭亲王来信的内容我已告知将军。额尔金勋爵给这位钦差大臣的答复至少在内容上与我的相同。

目前形势的唯一变化是出现了一个间歇期，致使联军事实上而非法律上自愿中止还在进行的军事行动；该间歇期使联军有时间补充所需各种物资，并赋予其在天津过冬的权力——如果在中国政府全面让步的情况下，联军指挥官认为在驻守天津两个月期满时仍在该城过冬时合适的话。我们必须留守天津两个月，将其当做抵押，以确保中国政府在这两个月内向我们支付 100 万两白银。

中国政府答复昨天 25 日信函的期限应延长到我方信函日期后三天，即本月 26、27、28 日，因此，本月 29 日应收到答复，而从第二天起，也就是本月 30 日，联军指挥官就可以根据其拥有的兵力和共同制定的计划，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给北京以决定性打击，如果有必要，可进驻北京，但如果他们认为在天津过冬能确保部队安全舒适的话，则回天津过冬。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是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我们的要求，而我们又觉得有必要给它一个严厉的教训。

相反，如果中国政府全盘让步，联军将暂时待在现在的营地，或者到北京的附近扎营，如果那里更合适安顿军队的话，但不能再向前挺进；法英两国特使将在护送队陪同下前往通州和北京，北京的事情一完，他们就撤回天津的冬季宿营地，一直待到春天，或者等 100 万两白银的两个月付款期限一到，就前往山东，而具体做法要视情况而定，军队指挥官在为捍卫需要捍卫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时，应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实际发生之事。

我一收到答复，就马上通知将军。额尔金勋爵和我的信函都是今天早上 8 点交给通州道台的，后者会立即将信函送往北京。

请接受……

1860年9月27日

恭亲王致葛罗男爵函。

我收到阁下来信，并已仔细拜读了。如果事情办得不好，责任并不在我，因为我没有负责此类事务。您说大清王朝面临重大危险，此话不当！

此外，为何贵国军队一直在向前挺进，而您的信却限定我三天必须答复？这是重建和平的做法吗？

我是皇帝的亲弟弟，做事一向光明磊落，从不瞒上欺下，我向您保证！既然协议已准备签署，现在中断谈判岂不令人遗憾？——即使中断片刻！如果法国政府已经决定攻打天朝国都，那么我们的士兵，与家人同在城里，将誓死抵抗，您将会看到与此前的交战截然不同的战斗。

此外，各省军队和民兵人数众多，久经沙场。一旦京城受到攻击，不仅您的在押同胞会是第一批受害者，而且贵军主力部队也难全身而退！虽然扣押您的同胞是那些处事不当之人所为，但我身为钦差大臣，拥有最高权力，我本人不允许虐待俘虏；不过，眼下要释放他们是不合适的！只有等和平协议签署后，他们才能回到阁下身边，到时您将看到，我的所言所为只会受到赞许。

咸丰十年阴历九月^①十三日（1860年9月27日）。

八里桥，1860年9月29日

恭亲王的来信并不友善。额尔金勋爵前来拜访，他也这样认为。我们坚决要求明天为释放被俘人员的最后期限。

^① 应为八月。——译者注

我们等待的军需物资和增援部队都还没有到。部队离北京不到一里，侦察队深入北京城郊，居民对他们并无敌意。蒙托邦将军要求召开将军和特使协商会议。这有用吗？我们又不讲同一种语言，而且只有联军指挥官才有权根据他们拥有的行动手段决定做什么。恭亲王执意要等到协议签署后才肯放人，这使我对他们的命运不再存有怀疑，如果我担心的事情成为现实，那将是此次征战中最令人痛苦的一段！

八里桥，1860年9月29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本函署名人晚上收到亲王殿下昨天写的信函，愿作简单的回答，而不进行已无必要的讨论。

殿下宣称，作为皇帝的胞弟，他一向言而有信，从不瞒上欺下，因此署名人可以与他开诚相见。这些话说得很好，署名人愿意相信，并希望殿下能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用行动来证明他完全可以信任。

因此，署名人向殿下声明，我们不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天津拟定的协议及1858年条约规定之外的任何要求，除了让法国军队在天津过冬之外。之所以需要这样，也是因为中国政府背信弃义，造成延误，致使部队在冬天来临之前难以开拔。

如果得知这一声明后，殿下愿意在规定期限即本月30日前释放被中方无视国际公法拘押的法英两国人士，之后尽早与署名人签署和平协议，那么北京城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法国军队将留在目前的营地，署名人将在护送队的陪同下进入天朝国都，交换1858年条约批文，换文仪式一结束，部队就将撤回天津。

至于法军在北京附近的侦查活动，完全是合法的，殿下知道，

自从攻占大沽炮台以来，军事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且只有和平协议签订后才会停止；中国政府背信弃义，但法英两国宽容大度，不希望它倒台，京城才至今没有受到威胁。

在规定期限内，也就是明天白天，署名人等着对此重要信函的答复，并将立刻通知法军指挥官，他们将根据回信内容行事。

和平掌握在殿下手中。署名人希望殿下不要放弃。

借此机会……

八里桥，1860年9月29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很荣幸随函寄上我给钦差大臣恭亲王的回信抄本。我承认自己很担心，这位亲王恐怕不愿意像两位特使要求的那样，提前释放被中国政府无视国际公法而扣押的人员。不过，额尔金勋爵和我给亲王提供了一个尽快讲和的简便方法，如果出于一种我为之惋惜且无法解释的盲目自大，恭亲王给北京乃至清王朝带来一场令人遗憾的灾难，那我们至少可以说，为防止这场灾难，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今天，最迟明天上午，我等着恭亲王的回信，到时候再将回信内容转告您，以便您和霍普·格兰特将军一起采取你们认为适当的措施，迫使中国政府现在或晚些时候妥协，作为这一方面的决策人，你们需要共同协商，通力合作。

请接受……

八里桥，1860年9月29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我刚收到恭亲王给阁下的最近一封信函的抄本，以及阁下给恭亲王回信的抄本。十分感谢您给我这些抄本。

我也赶紧将我对钦差大臣最近一封信的回复转告阁下，而钦差大臣来信的译文我已递交阁下了。

和我一样，阁下将会发现，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就同一内容写给我们的信函之间，首次出现了明显差异。在给您的信件中，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们攻打北京的话，被押北京的法国人性命堪忧；这在给您的信中没有提到。亲王在信中说，在北京换约仪式完成之前，拒绝释放被押的法国人，这一点在给您的信中也并没有涉及；最后还威胁说，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法军的退路将被切断。

不管怎么样，阁下，在给恭亲王的回信中，我认为应该坚持要求立即释放被押北京的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臣民，释放条件与同被关押的我的同胞一样。

您忠诚的……

八里桥，1860年9月29日

蒙托邦将军派人通知我，明天下午1点，霍普·格兰特将军将在司令部与他会面。额尔金勋爵很可能也来。我一定准时到场。

30日下午1点钟，法军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与会的有格兰特将军、蒙托邦将军、额尔金勋爵和我、威妥玛先生、英国上校弗利、雷布尔先生以及霍普·格兰特将军的一名副官。蒙托邦将军宣读了一份形势报告，后经讨论，大家认为两位特使应再次声明，事务处置权已交到联军指挥官手上；等军需物资和增援部队一到，他们就向北京进发，如果遇到僧格林沁，会再次将他打败；到了北京城下，要派谈判代表会晤鞑靼将领，如果后者希望北京城免

遭攻城带来的可怕后果，那就开城投降。联军指挥官将答应有效保护百姓，同时要求释放被押的法国和英国人！

唉！他们是否还能活着回来？我不敢奢望！

如果遭到拒绝，我们将进驻北京郊区；从那里的高地，向鞑靼人的城市发射炮弹和火箭。一旦北京被攻占，联军指挥官要决定是否能在北京过冬，或者在捣毁或夺取城里的档案馆和粮仓后，撤回天津。我会给恭亲王和蒙托邦将军写信。后者认为后天就可以行动了。我将住在离司令部尽可能近的地方。额尔金勋爵骑着马，与其妹夫霍普·格兰特将军寸步不离。

1860年9月29日

白天收到亲王的来信，其内容如下：钦差大臣恭亲王致葛罗男爵函。

我于今天中午收到阁下来信，我已完全明白阁下的意思，尤其是阁下保证，除了原来在天津谈妥的八项条款和两年前签署的条约外，不会增加任何新的条文。阁下还要求我们就已经谈妥的八项条款签字盖章。

然而，贵国军队离我国首都那么近，以致我们双方都心存戒心，难以签署和平协议。因此我要求贵方军队退回张家湾，之后在三天期限内，我派人将协议条款抄写清楚，并委派一位代表将副本送往通州和张家湾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协议一签署，我们立即商定第二次会晤时间，使和平得以巩固和持久。

至于目前被押的人员，他们并未受辱，都受到善待。只要贵国军队撤离，和平协议签订，他们将立刻被释放。

至于我的为人，在上一封信中，我已坦诚相告：我说话算话，从不食言。希望阁下相信我，不要有任何担心。

重要信函，1860年9月29日寄送葛罗男爵。

亲王的想法没有改变，他假装没看懂我的信函。他对我说：“撤走你们的军队，我们再来签署和约，然后被押人员将回到各自兵营……”他在欺骗我们：一切都让我担心，他可能已无法将他们交还于我们！

八里桥，1860年9月30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本函署名人于今天早上8点收到亲王殿下昨天写给我的信函；在信中，亲王殿下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建议，而不是利用至今所能获得的最好机会，满足署名人提出的适度而又合理的要求，迅速缔结一个体面的和约。

上一封信中，署名人已经明确告知亲王殿下，如果本月30日之前，被中国当局无视国际公法拘押的法英两国人员还没回到各自营地，那么联军指挥官将根据情况采取行动。

被押法英两国人员没有被释放，联军指挥官得知这一消息，将采取他们认为合适且必要的措施，用武力迫使中国政府满足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已对中国政府屡示善意，屈尊迁就，却仍无法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署名人……

八里桥，1860年9月30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我很荣幸给您寄去恭亲王本月29日来函的翻译件，以及我今天给他的照会抄本。我在照会中说，由于他敷衍搪塞的答复，现在

该由联军指挥官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来迫使中国政府依从我们的正当要求。

随时为您……

八里桥，1860年10月1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很荣幸给您寄去恭亲王回函的翻译件，以及我昨天给他的照会的副本。从这两份文件中您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又一次迫使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联军指挥官将根据情况，按照法英联军指挥官和两国特使在法军司令部举行的协商会议上制定的计划来行动。

如果恭亲王在最后时刻醒悟，通过还在他们手里的被困法英被俘人员，给我们带来无条件接受我方建议的信函，我将立即通知将军阁下，但是我得承认，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请接受……

恭亲王致葛罗男爵函。

钦差大臣恭亲王照会葛罗男爵如下：

今天早上8点收到阁下来信，也完全理解信的内容，特写此信回复。

至于释放您的同胞一事，我已经说过，和平协议尚未签署，故不可能因为要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而立刻将他们交还阁下。

关于2年前签署的条约和在天津谈妥的协议，我是完全赞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阁下说我拒绝接受您的要求。也许阁下并没有仔细阅读我最近的几封信，或者是阁下的译员没有翻译正确。

如果贵国用武力迫使中国让步，那我们一定会对已经达成的和约感到惋惜，我还担心目前还在京城的贵国同胞得不到充分的保

护。不过，由于英国领事巴夏礼精通汉语，口笔头俱佳是出了名的，我将派一名代表与其协商，共同解决有关同法英两国特使会面以及和约签字等事宜。不知道贵国政府为何如此多疑？希望双方代表立即碰头商谈和约签字的日期。

这是我 1860 年 10 月 1 日给葛罗男爵的答复。

八里桥，1860 年 10 月 2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很荣幸随函附上昨晚写给恭亲王的回信的抄本，他最近一封来信内容我也已告知阁下。不得不承认，我很担心中国政府不愿意，或者说无法按照法英两国特使的要求，提前释放被中国当局无视国际公法予以扣押的法英文职或军事官员，尽管我们用友善的语言，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在几天内缔结和平协议的简便方法。如果出于一种我为之痛惜却有无法解释的盲目，中国政府给京城甚至整个王朝带来令人遗憾的灾难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已为防止这场灾难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

我在等恭亲王今天或者明天对我最近一封信的答复，并将尽快转告您，以便您与霍普·格兰特将军协调一致，采取你们认为合适且可能的措施迫使中国政府妥协。

请接受……

八里桥，1860 年 10 月 2 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本函署名人很荣幸收到殿下昨天的来信，作为答复，他不得不说，事务的处置权已经交到法军指挥官手上，而且，殿下应该知

道，法军已经向前推进；另外，昨天下午4点，有一支法军纵队抵达了八里桥。

但不管怎样，如果殿下还愿意立即释放被中国当局违背国际公法而扣押的法英人员，将他们送回各自营地，并且如陛下自己所说，派一名代表与巴夏礼先生和法国翻译员协商，就安排会晤及和平协议签字一事达成共识，那么署名人将请求法军指挥官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和平即可恢复。

署名人……

钦差大臣恭亲王致葛罗男爵函。

阁下昨日来信收悉。1858年条约和今年在天津拟定的协议都已被接受，我们决不食言。在前几次来信中，阁下正式宣布，您只要求得到1858年条约和天津和平协议规定的东西。您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然而，和平协议几年都定不下来，实是因为有人总是手持武器谈判，使每项条款都得不到心平气和地讨论，由此造成双方互不信任，想到这里，我认为巴夏礼领事中文能说会写，你们的另一个同胞洛图尔也会说中文，我想派几名代表在北京与他们就1858年条约和今年在天津谈成的协议进行最后协商，一旦谈妥，巴夏礼和洛图尔就会给阁下去信，我希望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既然目前事情还在商讨之中，我无法将在押贵国臣民交还阁下。

至于我方军队，我已命他们暂时后退；贵国的部队也应考虑撤退。如果阁下执意随军继续挺进，谈判只有在军营里举行，这不利于双方选任能够前往军营的代表。如果不能重建和平，恐怕在京的贵国同胞会有危险。希望阁下慎重考虑。在这封信中，我已将我的想法和盘托出，希望阁下派人准确翻译，以真正理解信

的内容。

重要信函，于 1860 年 10 月 3 日呈送葛罗男爵阁下。

还是那几句老话，命令你们的部队撤离，让我们签署和平协议，然后释放被扣押的同胞！为什么恭亲王提出让洛图尔来当翻译，而只字不提精通汉语的杜吕克神甫呢？洛图尔只会说几句汉语，我的脑海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但我不敢多想！

八里桥，1860 年 10 月 3 日

没有被押人员的任何消息。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征兆。

我收到了下面这封以北京商贾名义写的信。在一个尊重皇权竟至荒谬程度的国度里，同我们拉关系这样的事必然是由政府授意的。

以下就是这封奇怪的信：

同仁堂药材铺老板乐平泉、恒利木厂老板王海、旺亨银庄掌柜陈忠海、福寿珠宝店老板王通、金口饭庄老板蔡崇义，谨以在京城商界的名义，很荣幸于本月 2 日致函法国特使。此信不长，希望阁下能将它看完。今天，他们中有几位前去拜访阁下，送上几份薄礼，如蒙阁下笑纳，他们将感到十分荣幸；这也是我们的请求。此外，本月 4 日，商界全体同仁将前往您的军营，当面向阁下解释，但我们不知道阁下愿意在何处接见我们，是在阁下的府邸还是地安寺附近？我们等着阁下的回音，以便前往拜访。这就是我们给阁下写信的原因，祝愿阁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860 年 10 月 3 日

随函送来的还有一份红色礼单，具体如下：

“牛五头，猪二十头，羊五十只，酒十坛，上等好酒十坛，苹

果十筐，石榴五筐，小苹果五筐，柠檬五筐，白葡萄五筐，梨五筐，红葡萄五筐，另一品种的苹果五筐。”

如果这些礼品交给我，我肯定会付钱给送货人。

1860年10月5日

已等了13天的军需物资于昨天晚上送到了。部队已于今天早上出发前往北京。根据原定计划，特使团将与半个步兵连一起住进八里桥附近的一个农庄，离英军存放火炮行李的库房不远。情况不是十分理想，英军指挥官只带了300来人，他派人告诉我，在附近出没的鞑靼骑兵人数众多，他担心夜里会有事，还说如果我遭到袭击，他也救不了我，但他会派出骑哨，在农庄前沿执勤，一有动静，我就躲到他的军营，那里容易防守。

晚上6点，法军司令官通知我，明天早上，他将与英军指挥官一起前往北京，据说那里集结了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司令官劝我住到一个有围墙的宽敞瓦窑里，他将在那里过夜，我也会很安全，因为军队宪兵司令让尼赛上尉率领三个步兵连保护着我们。

我们终于有了部分在押官员的直接消息，巴夏礼给额尔金勋爵写了一封信，不过是用中文写的，以便中国官员能看懂。在信中，巴夏礼肯定地说他受到恭亲王的善待，应该相信恭亲王。他和罗亨利先生以及三名士兵被关在一起，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但他不清楚其他人被关在何处，要求我们给他送一些衣物和日用品，他用英文签字，以便额尔金勋爵认定他的身份。这个理由合情合理，他可用它说服中国官员同意他写信，但在他签名周围的花缀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些都是在授意下写的！”英军司令官派人送去了衣物，海军上校海约翰在手帕的一角用棉线绣了额尔金勋爵口授的鼓励话。这一消息又燃起了我们对人质命运的希望；如果中国人按照他

们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把被押人员全部斩首示众，那巴夏礼肯定首当其冲。

定福庄砖窑，1860 年 10 月 6 日

10 月 6 日早上 7 点，我们顺利到达定福庄砖窑，这里安全无险。从围墙内硕大的砖炉顶上，可以清楚看到北京城主要建筑物以及一段筑有雉堞的城墙。9 点，城墙上升起白旗。一整天没有听到任何枪炮声。

定福庄砖窑，1860 年 10 月 6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们很可能就要进入北京城了，要么强攻，要么对方投降。此时此刻，请允许我提醒将军，在这座大城市里，有几处宗教建筑是过去由法国政府出资建造的，但由于天主教在天朝遭到多次迫害，这些建筑很早就被中国政府没收了。

1844 年法中签订了一份条约，钦差大臣耆英代表当时在位的道光皇帝，也就是当今皇帝的父亲，同意将这些宗教建筑归还其合法主人。此次征服能否赋予我们权力，收回并保护昔日被夺走的、但战败的结局迫使中国交还我们的东西呢？如果中国人投降，我们能否在投降条款中规定这些建筑必须归还我们？外省还有许多同类建筑被没收；也许，有必要笼统地要求遵照道光皇帝敕令，归还历届政府没收的全部天主教建筑。

如果我们靠武力强行进城，那么立即占领城里的这类建筑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有权使这一归还合法化，以免日后节外生枝。

请接受……

7日，星期天，一大早就有人来报说听到炮声。炮声间隔时间相同，很有规律，我猜想这可能是礼炮而不是交火：炮声响了二十一二下，有可能是城门开了，联军向恭亲王致意。

1860年10月8日，早上9点，额尔金勋爵的随员海约翰上校在前往八里桥司令部的途中来拜访我，并告诉我这两天北京城发生的事情。

“在联军靠近北京时，全城到处是白旗。这座鞑靼城市未作任何抵抗，僧格林沁和他的部队全都没了踪影。皇帝、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和恭亲王都往北逃窜。没有代表前来司令部；至于昨天有规律的炮响，是格兰特将军发出的信号，目的是集结迷路的骑兵，并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告诉法国军队。

蒙托邦将军占领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发现了大量珍宝。将军已通知英国军队，将和英军一起分享这些珍宝。下午4点，翻译巴夏礼先生和额尔金勋爵的另一名秘书罗亨利被释放了。至于其他被押人员，据说还需等待，因为他们被关押在离北京较远的地方。”

当天晚上，一名英国龙骑兵给我送来恭亲王的来信、额尔金勋爵的短笺和蒙托邦将军的便条。

恭亲王还在信中指责我嘴上说要恢复和平，实际上却让军队继续前进，他承诺一旦和约签订，立刻释放被押人员。对这封信的内容我早已作答，在此不再重复。

将军告诉我已占领圆明园，并已知会格兰特将军，将与他一起行动，敦促京城投降。

总之，我们即将成为北京城的主人。如果军队首领认为北京安全有保障的话，特使和指挥官们可居住在那里。在这一新的形势

下，考虑到逃亡政府对京城尚存的影响，我们仍将建议它重启谈判；倘若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会将首都交还。

以下是恭亲王写给我的信函。

本月3日，我已就阁下来信做了确切回答，然而，至今我都不知道阁下收到没有。洛图尔和巴夏礼两位代表目前正在北京商谈和平协议问题。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今年在天津提出的条款我方都已接受，现在要做的只是正式确认每一个条文，以巩固永久和平，并体面地交还您的同胞。由于天气渐冷，贵国译员洛图尔先生以及其他人士希望送些保暖的衣物、香烟和火腿来。请将这些物品交由送信人带回，并请附上一份详细的中文清单，以便做到物交其主。两三天后，等一切都与法国翻译员洛图尔谈妥之后，我将和阁下一起商定签约和交还贵国同胞的日期。我诚心诚意希望缔结和平！阁下是否也有此意？盼阁下能给我个肯定的答复。至于我们的部队，我已命军事将领选择合适的地方撤退扎营，这也是我们希望避免一切冲突的明证。但是，既然和平要得以恢复，在我看来，为公平起见，贵国部队也应暂时撤退。万望从速赐复为要。

1860年10月8日

恭亲王总是老话重提，命令你们的部队撤退，让我们签署和平协议，然后交还被押的贵国同胞！

对我来说，这些人中大部分无疑已经遇难，恭亲王按照他对我们的判断，担心我们在和平得到巩固之前得知这些不幸者的命运，会实施残酷的报复。

10月9日星期二。“杜舍拉”号舰上的卡斯塔诺医生从北京城

前的营地回来。巴夏礼先生、罗亨利先生、洛图尔先生以及一起被抓的五六名士兵已被交还给联军指挥官。洛图尔先生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伤，但医生认为双手功能不会丧失。

没有人怀疑其他在押人员已经惨遭不幸。大家都不知道皇帝、僧格林沁和恭亲王现在藏身何处。

当联军在圆明园待了两天撤离时，我想，许多中国强盗洗劫了这座园林并放火烧了好几处地方；据说圆明园有一半被毁坏了。

巴夏礼先生和罗亨利先生被送回英军司令部，洛图尔先生回到了法军司令部；与他们一起关押的六名士兵被交还联军。

10月11日，北京城下

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城下的司令部。特使团躲进了北京城和法军兵营之间的一间破房子。这间破房子背靠一堵十米高的土墙，这堵土墙绕城而筑，与砖砌的内城墙相隔两公里。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住进一座富丽堂皇的寺庙，寺庙就坐落在通往北京的一条大路上。我前去拜访，在那里见到了巴夏礼先生和罗亨利先生，他们给我讲述了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以及他们被迫跪拜僧格林沁的情形，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任何被押同伴的消息，并对他们的命运同样感到担心。

12日，伊格那替叶福将军的副将巴留捷克先生给我带来重要消息。他还告诉我就在北京城墙脚下的练兵场有好几座漂亮的喇嘛庙，其中广济寺最适合我居住……我请特里科前去打探，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就住那里了。

仍然没有被押人质的任何消息。杜吕克神甫、军需助理杜比上校、英国公使团专员诺曼先生、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以及12或

15 名士兵被转移到了北面。

但是，帮办钦差大臣恒祺对威妥玛先生说起伤者得到医治的情况，他甚至说漏了一句令人痛苦的话：“棺材倒非常合适！”

英军司令部将派一名专差经由天津前往上海。额尔金勋爵命其兄弟卜鲁斯先生立刻前来见他，我也写信让布尔布隆先生一有可能就来见我。我恳请沙内少将给在上海的法国公使提供一条船，以便他北上……我想远征快接近尾声了。

联军指挥官敦促北京城投降，要求在 13 日中午之前献出两座城门，不管结果怎样，联军开始在安平门布炮，我深信城门将被交出。

以下是我刚收到的恭亲王来信。我给额尔金勋爵、布尔布隆将军和沙内少将各送去了一份抄本。

恭亲王致葛罗男爵函。

钦差大臣恭亲王照会葛罗男爵阁下：

我很荣幸通知阁下，我已经下令善待贵国翻译洛图尔先生，并希望在与他就协议签字事宜协商一致后，立刻以适当的方式送回您的被押同胞。这一主张我已经多次写信告诉阁下。这不正体现了对贵国的宽厚仁慈？为什么法国士兵要洗劫并火烧皇帝的圆明园呢？法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其士兵应该遵守军纪；他们怎么会擅自焚烧皇帝的夏宫？而将军们与阁下好像对此事一无所知呢？

您准备如何了结眼下这一纠纷，阁下务必在回信中明示。

今天我收到了法军司令官蒙托邦将军来信；他要求占领安定门，并声称在得到我的答复之前，他将下令架起攻城大炮，如果我拒绝其要求，本月 13 日他将攻打北京。在天津拟定的协议内容没有任何改变，前任全权代表和我都无条件接受，阁下定京交换 1858 年条约批文，法国军队按约定应驻扎在城外，只有护送队被允许陪

同阁下进城。阁下也宣称没有额外要求，只希望尽快换约，以确保天津拟定协议所体现的永久和平。京城各座城门由专人看守，如果我下令打开城门，恐怕会有强盗趁机制造骚乱，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贵国在信中提出，法国军队必须占领安定门，我同意这样做，因为两国已经讲和了；只是阁下得告诉我这一占领的条件是什么。一收到阁下回信，我们就定个日子签署和约并交换批文；在此之前，我们将就如何巩固和平这一问题开始谈判。至于那些被前任全权代表扣押的法国人，我会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择日将目前在我手上的人员全部释放；我已下令寻找交战中失踪的人员，并医治伤员，我一定信守承诺。

这一切我已在给阁下的信中说过的；的确，我收到了法军司令官的来信；但是，由于和约已经缔结，我必然要将这封回信寄给阁下。

重要信函，于10月12日寄送葛罗男爵殿下。

不幸的是，亲王的这封信与之前几封不同，它第一次提到在战斗中受伤和失踪的法国士兵！这完全证实了我之前痛苦的预测，白天我们得到了可怕的消息，据说被押人质受到中国人最野蛮的严刑拷打。

恭亲王指责法国士兵火烧圆明园是不公正的……他非常清楚，联军刚撤离这座皇宫，中国的强盗便闯入圆明园，在将其洗劫一空后，放火焚烧了好几处宫殿，而亲王也正是怕看到如果放弃守卫两座城门，这些强盗会制造动乱。

特里科舰长前去查看了那座叫广济寺的喇嘛庙。明天，特使团将带一个步兵连住进庙里。我劝庙里的和尚都留下来，并给我们找些粮食，一切都付现金，这座大庙收藏的珍宝都将免遭洗劫。和尚们打着哆嗦答应了，我希望他们能很快放下心来！

1860年10月12日

特使团住进喇嘛庙。

1860年10月13日，北京城前广济寺。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本函署名人收到恭亲王本月12日来信，并愿坦诚作答，当然这种坦诚决不会令殿下不快，因为署名人无意背离事实，而只想提醒亲王殿下尊重他似乎不甚理解或者已经淡忘的事实。

恭亲王的出发点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事实！殿下好几次提到，和约既已缔结，他不明白为什么法国军队还要前进并继续军事行动。亲王搞错了，和约并没有缔结，从北塘开始的军事行动也从未中止。与署名人保持书信往来的各位钦差大臣始终被告知，军事行动不会中止，除非和约得到签署！但是，恭亲王非常清楚，和约并没有缔结。在天津时，本来一切都可以和平结束，一切都已商妥，但中国政府背信弃义，一切都停了下来，并且迫使联军挺进通州，同时解除了署名人对各位钦差大臣所做的承诺。

不过，一切还可以在通州解决，因为双方商定，联军在离城不到6里处扎营，随后署名人将在护送队的陪同下进城签署和平协议。殿下完全知道，僧格林沁将军违背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甚至在联军未到达钦差大臣亲自指定的扎营地之前就向他们发动袭击；又一次的背信行为让中国军队再次溃败，并迫使联军向前挺进，同时取消了署名人刚刚作出的承诺。

在八里桥，中国军队遭到了比在张家湾还要惨重的失败，尽管中国政府再次背信弃义，且违反国际公法扣押了作为不可侵犯的谈判代表、在通州受到正式接待的法英国民，但一切都还可以挽回，

署名人给殿下信中明确表示，如果9月30日之前被押法英人质被送回各自军营，和平协议可在原商定条件基础上签署，法军也将退回天津；但是如果人质未在指定日期返回，法军将立刻挺进北京。殿下不愿在指定日期释放被押人士；相反，他还要求法军在合约签署之前撤离，并且宣称只有这样才能释放被押人员。

恭亲王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拒绝释放被押人员，从而迫使联军挺进北京。正是在这次挺进北京的过程中，亦即在战争中，法英联军占领了皇帝的夏宫。联军并没有像殿下所说的那样洗劫了这座宫殿；他们只是根据战争法，分享了战斗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亲王殿下完全清楚，夏宫后来遭到洗劫并被部分烧毁，那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盗匪所为；比如在河西务村，这些盗匪抢劫并毁坏自己同胞的住宅，联军不得不开枪制止。

事实已经明确，亲王殿下英明过人，不会不辨真伪。不过，署名人仍然同意抓住任何缔结和约的机会，条件是中国政府摒弃这种不奏效的背信做法，愿意诚实办事，并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每一次食言，都取消了署名人作出的承诺，使他得到一次又一次战胜中国军队所赋予他的全部权力。

以下是署名人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特致恭亲王，亲王殿下如果愿意，将能预防这一致命的灾难。

联军指挥官不愿意北京城遭受炮击和破坏，居民流离失所，已要求还在北京的当地政府在本月13日中午之前交出一座城门，以便修筑工事自卫，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而不是派部队占领该城门。

这座城门在规定期限之前交到了联军手上，但这是居民交出来的，而不是军事当局，因此，联军指挥官对其没有任何承诺。

对于一个毫无顾忌违背诺言的政府，署名人现在很难再信任

了。这个政府不顾礼节和自尊，扣押并残忍杀害那些手无寸铁、在谈判白旗保护下前去与其坦诚交谈的代表。因此，署名人不能只在仪仗队的陪同下进京，他现在需要一支护卫队，以防范某种背叛行为；当他和护卫队住进为其在北京准备的住所后，谈判就可开始。关于在天津议定的和约，署名人必须做几处改动，内容无非是要求贯彻 1858 年条约精神，以及履行道光皇帝在 1845 年谕旨中所作的承诺，也就是归还原本属于基督徒却被中国政府没收的教堂、墓地、土地和附属建筑。这样和约才可以签署，和平因此得以恢复，等 1858 年条约实现换文，所有的条款都得到严格执行后，法国军队将按原先的约定撤离。

恭亲王一直坚持，在和约签署之前决不释放被中方无视国际礼节拘押的法英国民，这只会加深署名人的担忧，犯下该罪行的中国当局粗暴野蛮，甚至会杀害其中数人，这些人并不像恭亲王试图要别人相信的那样是在战斗中失踪的，而是落进了中国政府设下的可鄙圈套。恭亲王的来信含糊其辞，而署名人又收到了相当真实的不幸报告，被押人员在圆明园被一些中国官员虐待致死，成为中国政府永远抹不掉的耻辱，这一切都证实了署名人的担忧；今天，署名人以其政府的名义，要求赔偿 20 万两白银，此赔款将由法国政府分发给 9 月 18 日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和被虐待致死者的家属。

中国政府必须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惩罚这一罪行的责任人；对于犯罪官员对被押人员的所作所为，如果中国政府不予愤怒谴责，不能按其所能进行补救，这个政府与南海诸岛上的野蛮部落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在天津设想的协议应由双方秘书拟定，同时加入署名人因中国政府的行为而被迫要求增加的条款。

通过第一项条款，中国政府承诺向 9 月 18 日事件中的法国受

害者赔偿白银 20 万两，并随即向法军财务官交付此款项。

根据第二项条款，中国政府保证依照道光皇帝谕旨，将教堂、墓地、房屋、田地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归还法国驻华公使。

只有这份协议被签字盖印，1858 年条约批文得以交换，条约中所有的条款都得到严格执行，法军才会撤回天津冬季营地；但是，到目前为止，署名人绝无可能要求法军指挥官中止——即使片刻时间——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

如果中国政府接受上述所有条件，且这些条件所规定的内容在本月 23 日中午之前得以执行，那么和平就可恢复，军事行动也将停止。相反，如果署名人的要求遭到拒绝，或者得到的回复含糊其辞，亦或者对此保持沉默，那么军事行动将重新开始，且更加猛烈，目前仅限于北方的战事将蔓延到全国各地；在外省，联军曾为保卫一个政府而与起义军作战，比如在上海，而这个政府却对举着谈判旗帜的联军军官和士兵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来。

署名人必须提醒亲王殿下，尽管广东在联军控制之下，但其海关收入仍上交贵国国库，而且往北京运送粮食和贡品的船只从没受到握有制海权的联军舰队的骚扰。但是，亲王殿下必须知道，如果战事继续下去，这一局面将立刻被打破，这些船只、海关收入和贡品都将被联军扣押。

署名人仍然信赖恭亲王，殿下是出了名的仁慈，对某些受到亲王皇兄信任的官员所犯恶行一定感到非常痛心。

恭亲王肩负恢复国家和平之重任，万望殿下毅然为之，毫不犹豫。

署名人谨盼于本月 23 日中午之前收到答复，并再次向殿下致以……

葛罗男爵(签字)

北京城前，1860 年 10 月 3 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我不得不回复了恭亲王的古怪来信，现附上该信的译文。随信还附上我打算寄给恭亲王的回信草拟稿。在信中我纠正了被恭亲王歪曲的事实真相，要求对我们的不幸同胞被谋杀一事进行赔偿道歉；不幸的是，这一谋杀已不容我们怀疑。此外，军方已收回北京城内被没收的财产，即道光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承诺归还基督教徒的教堂和墓地，我想让军队今天交给我的战利品合法化。您在大沽取回了中国人 1859 年从您手中夺走的大炮，我在北京收回了被历届中国政府没收的法国财产。

首都恢复基督信仰，欧洲使团常驻皇城，在我看来，这是一扇待开之门的双扉，让现代文明更快深入清帝国……

我希望能尽快将我的照会交到亲王手上。

请接受……

额尔金勋爵告诉我，他完全明白我向恭亲王提出的新要求，并让我知道他即将要求中国政府把九龙这一小块地方割让给英国。九龙是广东的延伸部分，离香港岛只有一海里，形成了维多利亚港口，这块土地对于香港岛的安全至关重要；英国政府根据一份无限期租约独占香港岛，并派驻军守卫岛上的工事。

九龙半岛事实上是香港的强制属地，但现在仍归中国所有，香港法庭不能对其行使司法权，这对于司法执行来说相当不便。

额尔金勋爵知道，中国政府不会对出让九龙半岛一事提出任何异议，也不会提出任何增加租金的要求。原先是不得不暂时向英国作出让步，现在却是最终的。

广济寺，北京城前，1860 年 10 月 14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刚收到将军的来信，以及我准备给恭亲王的答复之设想，这份设想是我昨天私下交给您的。我打算今天就将这个答复寄给恭亲王，我不会错过任何时机，以尽快签署和平协议，并交换 1858 年条约批文。我的想法和将军一样，同胞不幸被押，这不应该成为中止或延期议和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命运此刻已定，而且在我看来，这一残酷事件在当前重大利益面前只能屈居次要了；我给亲王的信中也确认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没有要求他在谈判开始之前释放人质。

我会把将军与部队不在北京过冬以及 11 月 1 日离开北京的想法转告额尔金勋爵。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英国同僚和我们一样，急盼外交问题能尽早解决。

请接受……

广济寺，1860 年 10 月 14 日

昨天，中国当局催促联军指挥官在规定投降时间之前占领安定门。据说是当地居民要求官员不要抵抗联军的。

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也不在城里过夜了，而是在乡下不同的地方过夜。

亲王反对释放人质只会让我强烈预感到有些人质已经被害。结果，在 9 月 18 日被扣押的 37 名人质中，只有 19 人活着回来，另外还有 16 副棺材！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那些令人悲伤的名单中还缺的两名不幸者的命运，一名是法国人杜吕克神甫，另一名是年轻

的英国炮兵军官布拉巴宗先生。一名中国教士证实，9月21日八里桥上有两名欧洲人被处死，尸体被丢进运河。

一些人质提供的细节令人发指。年轻的诺曼先生是英国女王陛下驻上海公使团专员、额尔金勋爵的随同，他被四肢反绑，用马车运到圆明园，就这样捆绑着扔在一个庭院的角落，没人来救他，又冷又饿，活活被老鼠和虫子啃噬，四天后痛苦地死去。在宫中发现他时，他浑身爬满了蛆。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和蔼可亲，机敏风趣，大家都喜欢他，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遭受的痛苦也许不及诺曼，他被绑着扔进了下水道，很快就窒息身亡了。

格朗尚炮兵上校、阿代尔勤务中尉、杜比军需助理、奥祖夫轻步兵以及两名勤务兵是被装在棺材里送回来的，死了的和活着的一样，身上都有受虐待的伤痕，有的深有的浅。两地军营都愤怒至极，但要克制强烈的复仇欲望，不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忍耐力！我的英国同僚好像要把事情闹大；他是想推翻清王朝，帮南京反叛者一把？不管怎么样，事情得有个了结。联军指挥官宣称11月1日后不可能继续待在这里，而这要他们自己来决定。

伊格那替叶福将军也进了北京城，他恳请我们把在皇帝夏宫里可能发现的俄国资料交给他。

广济寺，1860年10月4日

以下是两名中国教士寄给我的报告，内容涉及1860年9月18日我们的不幸同胞被捕以及他们所受虐待的情况。

“中国军队（其中有大约400名鞑靼基督教徒）由僧王（僧格林沁）、瑞麟、胜保以及其他将领指挥。好像是兵部尚书穆荫提议在欧洲人离开通州时将他们拘押，但下达逮捕令的是载垣亲王，据说巴夏礼在商谈过程中大怒，掀翻了桌子并打碎了桌上的瓷器，此举

激怒了亲王。

两名欧洲人在通州被杀，另外两名没有像其他不幸的同伴一样被押往北京，而是根据命令留在胜保将军处，受到了很好的对待。被杀的两人中，其中一人会说中文，劝说将军前往联军营地缔结和约。但是，这位脖子上有伤的将军看到联军向八里桥挺进，就在桥上下令将他们斩首，并将他们的尸体和首级抛入运河。

4名欧洲人率先由马车送到北京，另外6人是自己走的，还有20人是下午骑着马被押回来的。据说其中一人骑马逃走了。被押到北京的人手脚都被反绑，其中有几个被捆成某种羞辱人的姿势，各被两名男子用棍子撑着抬了回来；不难想象这些不幸之人的痛苦和叫声；他们受到挖空心思的折磨，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绳索浸湿了勒得更紧；他们叫着要喝水，声音凄厉，但连润润嘴唇都遭到拒绝！一些异教徒看不下去，纷纷指责皇帝御林军对受害人残酷无度。有一名受害人倒显得十分温和，很能忍耐，其他人则怒不可遏，陷入绝境，一名懂英文的中国人一定是心怀恶意，对刽子手说这些人质在诅咒他们。其中一名可怜的欧洲人说话很大声，为了让他闭嘴，一名中国人朝他胸部捅了一刀。好几名人质就是这样被绑着押往圆明园，关在载垣亲王曾经住过的宫殿院子里，没有食物，没人照顾，没有希望！不久，幸存者被分了开来，一些人押往北方，另一些人被押往南部，从此再也无人问津……”

德拉玛神甫翻译了两位中国牧师的报告，认为出了通州就被张家湾战役中溃败的鞑靼士兵杀害的两名欧洲人是阿代尔勤务中尉和奥祖夫轻步兵，而在八里桥上被斩首的两名人质肯定是杜吕克神甫和英国人布拉巴宗上尉。我认为他的分析很有道理。报告中只提到了34名受害者，没有说起9月18日被拘的37人（26名英国人和

11名法国人)中的其他3人,这3人不会就是没有出北京监狱的洛图尔先生、巴夏礼先生和罗亨利先生?

广济寺, 1860年9月14日^①

恭亲王又写来一封急件,同时送来的还有额尔金勋爵写给我的一封信。

以下是恭亲王来信:

恭亲王致葛罗男爵函。

皇室成员、钦差大臣恭亲王……

我刚得知阁下仪仗队士兵已经进城。队伍纪律严明,使百姓恢复安定,消除了他们的不安和恐惧。这也证明了阁下对和平的渴望是真诚的,对此我甚感欣慰,并将竭诚行事,故命武备院卿恒祺与阁下指定的代表协商,解决天津协议签字的相关事宜和商定1858年条约换文日期,希望一切都能提前准备就绪。如果这些准备工作在阁下进京后匆忙进行,安排恐有不周,这完全违背我的意愿。

重要信函,1860年10月14日呈送葛罗男爵阁下。

这封信完全体现了中国外交的风格。恭亲王把发出警告后占领北京城的法国军队说成是一支被允许入城恭候特使的仪仗队!

广济寺, 1860年10月16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昨晚我收到阁下打算写给恭亲王的信函之草拟稿,以及这位钦

^① 应为10月14日。——译者注

差大臣的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走出困难局面的大门。

阁下在信中用庄重的话语对我们的不幸同胞所遭受的野蛮对待表示了最强烈的愤怒，并要求中国政府竖立赎罪碑，我深信中国政府**绝不愿意也绝不可能同意**。清政府宁愿放弃一切，丧失一切，也不会让人在自己国家里建立一座赎罪碑，去纪念自己的背信、耻辱和懦弱。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至于摧毁皇帝夏宫这座毫无防御能力的园林，至少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做法绝不可能挽回同胞所遭遇的厄运；对于同胞的不幸，我们为之悲痛，但也不该一直耿耿于怀。

如果阁下在给恭亲王的信中不提要摧毁圆明园，也不提您的想法，即让中国政府在天津竖立一座赎罪碑的话，我深信一切都将很快结束。至少我认为，阁下提出的其他条件和我提的条件都将被接受，坦白说，如果这样就能走出或许我们已卷入过深的困境，我将十分高兴。

今晚我才能派人把我的答复寄给恭亲王，对于我们所处的境况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除了我的建议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能够拥有的兵力、提前到达的冬天、随时都可能无法通行的道路、法英两个军营看待时局的方式、对我们的最后依靠恭亲王可能被迫**逃亡鞑靼**的担心，所有这一切使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

如果谈判开始，我将派巴士达先生前往与恒祺商谈。我选定衙门为我在北京的住所。据说这里附近还有几处漂亮住宅，若能与阁下为邻，我将感到十分荣幸。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营地彼此离得太远。

请相信……

10月16日，广济寺

今天，额尔金勋爵、霍普·格兰特将军、蒙托邦将军一起来到我的住所商讨。会议毫无结果。额尔金勋爵坚持其彻底摧毁圆明园的方案，而在我看来，此举毫无意义且十分危险。我们一直在向中国人宣讲我们的文明和基督徒的仁爱，可是为什么还要像他们那样行事呢？我和他一样，为我们可怜的同胞所遭受的暴行深感悲痛。然而，过于严厉，没有必要的严厉，不会使我们处于孤立的境地吗？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许可以去摧毁北京的冬宫^①！还是应该撤回天津，等待援军和其他命令，等春季到来，再开始一场新的征战？但是，如果我们果真走到那一步，欧洲就不可能有人宽恕我们了。

感谢上帝，额尔金勋爵让步了，至少放弃了一部分主张。我没有完全失望！

法英两个军营送来了一长列棺材，里面装着通州事件遇难者的尸体。英国人将他们的同胞葬在俄国人的墓地。我本想出席这个令人悲伤的葬礼，但我不得不告诉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我接到通知时葬礼已经结束！

广济寺，1860年10月18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告北京居民书正被译成中文。我将派人去要几份副本给您寄去。

^① 此处指紫禁城。——译者注

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劝说额尔金勋爵放弃摧毁圆明园的想法，但是没有成功。从我写给这位英国特使的信中您也可以看出，我不能同意与他合作，做一件我认为毫无意义且十分危险的事情。不过我又补充了一点，如果您觉得可以与霍普·格兰特将军共同执行这项计划，我不会有任有意见。

您还是拒绝了，我为之感到高兴，您的拒绝和我的拒绝是我们根据各自行动自由的原则分别表达的，这事实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反对；据我看，这一反对比这种拒绝行为本身更有价值，虽然为时已晚，却在法英联军非常需要一致行动的时候正式确认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请您相信，在欧洲和中国民众看来，我们将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将军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葛罗男爵(签名)

广济寺，1860年10月18日，星期二

下午5点，我们看到滚滚浓烟在北边升起，继而飘荡在北京上空。这是英军正式焚烧被洗劫后的圆明园。我很心痛，担心这一无谓而野蛮的报复行为吓坏恭亲王，促使他逃往鞑靼。他已经躲到了乡下，他的马车都装满了东西并全部套上了马匹，稍有动静便可上路。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在北京已有些时日了，不知他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劝阻恭亲王放弃一切？

有人告诉我，两名红顶官员前来自蒙托邦将军提出，在9月18日事件中遇害的法国人可安葬在北京大教堂的一座天主教墓地里，这座墓地长期以来一直委托在中国的俄国教会管理。

广济寺，1860年10月19日

葛罗男爵致函蒙托邦将军。

将军先生：

我很荣幸随函给将军送上一些文件的副本和译文，其内容我在之前的信中已经相告。通过这些文件您可以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以及在目前情况下，我和额尔金勋爵在对中国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很庆幸，将军先生，您的看法和我的相同，并且很高兴看到我的英国同僚对我的某些建议作出了一些让步，尽管他对此表示了强烈的遗憾。

北京城传闻四起，说皇帝已经驾崩，恭亲王想在联军的扶持下登上皇位。我只是将这些传闻如实告诉您。

明天中午我们就能得知恭亲王的决定了。据说，他已经凑齐了我要求支付给9月18日事件受害者的赔偿款，还将于今天给我寄来一封令人满意的回信。如果这封信能按时送到的话，我会在给欧洲写信之前让您知道信的内容。

请接受……

钦差大臣恭亲王照会葛罗男爵如下：

阁下本月17日来信收悉。我认为向您的受虐同胞和家庭赔偿20万两白银是合理的，我会认真履行，亲自将钱交给您。让您的同胞遭受虐待的官员将依法受到严惩，我刚接到皇上谕旨，削去僧王（僧格林沁）爵位，将瑞麟革职查办。

我将派人在北京为阁下准备一处寓所。

至于从康熙皇帝以来各省建立的教堂、墓地以及附属建筑，待查实后全数归还，这完全合乎情理，双方代表共同主持的会议上将予以最终裁定。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让葛罗男爵阁下知道上述

决定。

1860年10月19日。

值得注意的是，恭亲王在写给额尔金勋爵的信函中，没有提到依法严惩那些虐待其同胞的中国官员，也没有提到僧格林沁和瑞麟被革职一事！

广济寺，1860年10月20日

上封信是今天凌晨4点送到的。我承认，收到信时我真是从心里感到高兴，马扎然主教会对我们大加赞许，在成功原因中，他向来只看重运气！不得不承认，在这次非同寻常的征战中，运气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我还记得有一天上海道台给我相面，说从我的耳廓可以看出，我是个事事都会成功的人！我当时还付之一笑，不以为然！老天爷站在我们这边！是我的士兵们执行了上苍的旨意！

我将恭亲王的来信抄本送至司令部，呈给沙内少将和额尔金勋爵。

广济寺，1860年10月20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本函署名入于今天早晨收到恭亲王殿下来信，获知中国政府接受署名人在本月17日信中代表其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署名人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此信让他看到了两国能很快重建和平的希望。

中国政府答应采取措施，依法惩处9月18日违背国际公法的当事人，皇帝罢免了僧格林沁和瑞麟的官职，并同意向此次事件中的受害人赔款，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拒绝对这一暴行承担全部责任，但对责任人进行了应有的谴责。这一决定为恭亲王赢得了尊重。

署名人将委派特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会同法方翻译，和亲王指定的官员合作，按谈妥的条款拟定和约，为了加快工作进程，署名人让人将和约译成中文。这份有四个副本的和约将在商定的时间和日期及为此而选定的地点签署。第二天，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交换 1858 年签订的天津条约的批文，两国永久和平就此恢复，法军司令官将被要求中止非其部队的防御和安全所必需的一切军事行动，并立刻采取措施与其部队撤回天津。

署名人很感谢恭亲王殿下在北京替他准备了一处府邸，他将和护卫队一起前往，尽快签署和平协议。

署名人……

我立刻派人给蒙托邦将军送去了此信的抄本。

广济寺，1860 年 10 月 22 日，早晨 8 点

司令官先生：

我很荣幸告知阁下，皇帝胞弟兼钦差大臣恭亲王所做出的承诺已开始付诸实施。

20 万两白银即 150 万法郎的赔偿款将于今天即 22 日下午 1 点在北京交给我。恭亲王殿下还希望我出具证明，确实收到了这笔由中国政府支付的赔偿款，这笔钱将给予 9 月 18 日被拘、后来回到司令部的法国人和被押期间遇害法国人的家属。该赔偿金应由法国政府分发给当事人，因此我将向亲王出具收据；但这笔钱必须当着代表我到场的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的面，由军队财务官员或其委托人当场存库，并随即给我一个收条，将收条转交中国政府是我的职责所在。

因此，将军先生，如果您能下达命令，让部队发饷官先生带着运输工具和卫队，与您参谋部的一位或几位军官会合后，今天中午

从这里出发，在下午 1 点之前赶到北京城里指定的会面地点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将军先生，我以为可以住进城里预先为我准备的衙门；如果明天一切已经准备妥当，我想在 11 点左右前往那里。我不清楚额尔金勋爵对随行仪仗队或护送队有什么考虑，我本人认为，为保护公使团安全并为条约签字和换文仪式增加些隆重气氛，300 精兵已绰绰有余。

恭亲王在北京替我准备的住所非常宽敞，如果其中有一间能中您意的话，我将十分高兴；您若愿意，今天可派人实地查看一下，然后告诉我那地方您是否满意，您是否愿意与我合住。

如果一切如我所愿，从此没有任何事情阻碍谈判的进程，一切便可在两三天后结束，我们将在您认为合适的时候撤回天津。如果我能从通州顺水而下，我就走水路，以避免从天津来到北京一路上所受的那份劳累。

一旦双方代表就和约文本达成一致，我就派人给您送去一份副本。

请接受……

广济寺，1860 年 10 月 22 日

巴士达致葛罗男爵函。

男爵先生：

根据您的指令，我前去与恭亲王的代表会面，并以您的名义，接受中国政府给予九一八事件受害者的赔偿金，并与亲王代表就协议草案达成一致，以重建和平。

双方于今天下午两点在北京会面。赴约途中经过司令部，司令官先生应您的要求，派了 20 名精兵作为我的护卫队，并派军需官

及部队发饷官、几名出纳和一个步兵连陪同前往，步兵连将负责护送装载银两的马车，将中国政府承诺支付的赔偿款运往法军军营。

在事先约好的时间和地点，我见到了皇宫总管恒祺，随行的还有天津盐运使德椿和一个粉顶官员，后者名叫孙治，官职不祥，这三名代表受恭亲王委托和我商讨和约签订事宜。

从9月18日以来我没有见过恒祺，他变化挺大的，见到我就说，20万两白银要立刻交给我，他指给我看的那些马车把我们所在衙门前那条小街都给堵住了。据恒祺说，车上箱子里装的是说好的赔偿款项。其中一只箱子当着我们的面打开，里面确实装满了银锭，恒祺告诉我，箱子一共67个，除一个箱子装了2000两外，其他箱子各装3000两。箱数核对过后，军队发饷官先生告诉我，他所拥有的工具，没法当场查验银锭的重量和成色，所以，如果就这样将眼前这批金属存库，他无法给我开具收据，该收据将由您转交恭亲王阁下，这是您的职责所在。查验工作只能在法军营地进行，我要求恒祺同意将银锭运抵法国军营称重和计数，当然，要有他指派的中国官员在场。可以说，恒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也向他保证，车上银锭的数额一经核实，就会把准备给恭亲王的收据交给他；车辆是在陪同我前往的军需官、军队发饷官和出纳官的率领下，由步兵护送直接来到城外法军营地的。

此事办完，恒祺从随行特使团翻译美理登手上接过天津议定的协议草案，他对这份草案很熟悉：在天津，我们已将草案内容通告过他；9月17日，在通州，我与载垣亲王会晤，将这份草案交给载垣亲王，当时他也在场。

新增的第六条款和第九条款，涉及归还天主教堂和中国人移民自由，他肯定不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在阁下与恭亲王的来往公函中决不会不谈这些方面的问题。恒祺还是反复读了三遍，他要求我更

换了法方翻译使用的两三个词；美理登先生向我保证这一改动绝不会改变协议的意思，于是我赶紧表示同意，恒祺接着强调，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中国政府没有能力用现金付清第四条款规定的 100 万两白银，因此他请我将他的意见呈告阁下；他说，他提出这一看法只是为了表明中国政府还清赔款的真诚意愿，也为了证明中国政府的诚意，因为是中国政府首先预见到它无法完全履行其义务，但这完全是因为不可抗力。

第六条款被中方接受，并无异议，双方还商妥，全国范围内交还天主教教堂和慈善堂一事不可能今天就办，而要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团斡旋，由中国政府实施。

第九条款也没有引起任何异议，恒祺对我说，这一条与英国协议书的相应条款一样。

恒祺还告诉我，恭亲王已经做好协议签字和 1858 年条约换文的准备，时间和地点看阁下方便。依照您的指令，我答复说本月 25 日下午 1 点，可以在北京举行签字和换约仪式，具体地点可以定在英国特使签署类似协议和条约换文的王宫。

恒祺的两位同事参加了会晤，但未发一言。只有官员孙治看上去非常专心。

男爵先生，愿为阁下……

莱昂·德·巴士达(签名)

广济寺，1860 年 10 月 22 日

广济寺，1860 年 10 月 23 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本函署名人很荣幸告诉恭亲王，正如亲王殿下托人向他转告的那样，他准备于本月 25 日下午 1 时在殿下指定的地点签署双方秘

书正在商讨的和平协议，同时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

亲王殿下已派人把用于赔付 9 月 18 日被拘法国国民和拘押期间遇难人士家属的款项交给了署名人；这笔款项的收据是事先准备好的，因此，法军财务官虽已将这笔钱存库，但需要再核实这批银子确实达到 20 万两之后，收据才能给您，这必然需要一些时间。

署名人很高兴最终看到两个帝国之间恢复和平，且衷心祝愿这一和平能永久绵长。

署名人借此机会……

广济寺，1860 年 10 月 23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打算明天，也就是本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11 点动身前往北京城内替我准备的寺院。25 日星期四，我将签署和平协议，并在同一次会议上，与恭亲王交换天津条约批文。如果将军愿意在您认为合适的军官陪同下参加我与恭亲王的会晤，我认为比较方便的办法是您先来我的新住所，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礼部，那里已做好了接见特使的准备。

恭亲王催促我尽快将军队收到银两的收据交给他；但我希望军队发饷官给我出具一份收据，为我承担的责任作担保。希望将军帮我催一下，对此我将不胜感激，我不想让恭亲王久等。

我希望入城有一定的气派，可惜没有制服，因为锡兰沉船，我的制服也都沉到了海底，我就穿黑色衣服，佩戴勋章和饰带。我将带着您派给我的护送队一起进城；我要经过您的住所，所以我想护送队无需来此接我了。

根据您的要求，随函寄上您交给我的、一位中国小官写给他母

亲的中文信函。

今晚我要派美理登先生前往北京城里打点一切，并将我的一封急件转交给帮办钦差恒祺。

请接受……

1860年10月24日上午11点，我离开广济寺前往北京。恭亲王在贤良寺为特使团准备了住处。我在北京期间，101部队普杰上校、旗手、乐队和三个连的士兵将和我一起住在这里。贤良寺围满了无敌意的百姓。附近的街道上出现了集市，商品很丰富。

特使团住在离城门至少5公里处，我们入城经过的城门和城墙十分雄伟。城内就像个大村子，房屋周围种着树；街道很宽很脏，没有铺砌石块。一队一队脖子下垂着长长鬃毛的骆驼来来往往穿行于街市。在主要街道上有一些井，警察不断从井里打水装满公共水槽。

在城外喇嘛寺保护我的连队继续留在那里，以免该寺遭受洗劫。周边凡锡克骑兵住过的寺庙都被洗劫一空。喇嘛寺的和尚们暗自庆幸。

广济寺，1860年10月23日

葛罗男爵致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

将军先生：

我很荣幸几天前收到阁下来信，得知阁下进入北京后给中国官员所提出的建议；这些中国官员没有效仿皇帝放弃首都，从而组成了一个形式上的政府。

我已经口头多次告诉阁下，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某种决定，可能影响到俄国皇帝陛下使团在北京的利益，我会及时通知阁下，以

便阁下考虑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捍卫他受命捍卫的利益。

阁下清楚，几天来，事情看上去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恭亲王接受了联军提出的所有条款；昨天，他将 20 万两白银交到了我手上，以赔付给 9 月 18 日事件的幸存者以及被押期间受害者的家属。

本月 25 日中午 12 点，我将签署已在北京被接受的和平协议，同一天，同一时间，恭亲王和我将交换 1858 年 6 月 27 日天津条约的批文。两国和平就此恢复，军事行动（除我方的单纯防御外）将立即停止，法军司令官将立刻率部队撤回天津，我也打算前往那里。

一旦和约签字，我将私下给阁下寄送一份和约副本。

在此之前，将军先生，请允许我告诉您，我已禀告我的政府，您在我们正看到将成为现实的圆满结局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并为促进以您为首的俄国皇帝陛下使团和法国皇帝陛下任命我率领的特使团之间在中国的真诚关系作出了努力。

葛罗男爵(签名)

星期三，1860 年 10 月 24 日

接到奉恭亲王之命下达的通知，给公使团居住的衙门已经准备妥当，下午 1 点我动身去了北京。101 部队的两个精锐连、普杰上校、旗手、乐队护送公使团进京。人群密密麻麻，充满好奇，毫无恶意，有好几群人朝我的轿子俯下身子，好让我看得更清楚，他们都手画十字，表明自己是基督徒！我十分感动！

这是我漫长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我双眼含着泪水，幸福的泪水！

在衙门、贤良寺安顿下来，顺天府尹就前来询问是否住得舒

服，还缺什么东西。他想请我吃晚餐，我谢绝了，推脱旅途疲劳，并说和约暂未签署。

8天后额尔金勋爵才住进城里。军事指挥官们希望待在城外。在我的请求下，蒙托邦将军同意原先和我住在一起的步兵连留在我离开的那座寺院。没有离开寺院的和尚都很高兴，没有人敢来抢走他们任何东西。不幸的是，周围的宗教建筑已被还驻扎在里面的锡克骑兵洗劫一空。

北京城内，1860年10月24日

下午4点，额尔金勋爵在北京城内签署了和平协议，接着就回到设在城外的英军司令部。他的护送队至少有2000人。许多中国官员在安平门迎接，陪同他前往礼部，恭亲王在那里等候。

我将准时赴约。明天一早我就出北京城，再隆重入城。我将直接从法军司令部前往礼部。

我已派美理登先生去恒祺那里；迎接法国特使的仪式将和英国的仪式一样。

北京，1860年10月24日

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明天早上9点整，我将从这里出发前往您的司令部，11点左右我们一起进城，在您为我配备的护送队的陪同下，前往签署和平协议的礼部。我已派人通知恒祺，中国官员为额尔金勋爵做了什么就必须为我做什么，此事不容商量。

额尔金勋爵今天签署了他要签署的条约。

请接受……

1860年10月24日

白天我得知，准时赴约的恭亲王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英国特使才姗姗来迟！英国特使表现出来的强硬吓坏了这位年轻的亲王，整个会晤令他感到非常艰难。

星期二，1860年10月25日，北京城内

今天我与恭亲王签署了中法重建和平的协议，紧接着双方交换了1858年6月27日签署的天津条约的批文。

早上8点我就出城前往法军司令部，带着随行人马正式入京，队伍浩荡，仪式更显庄严隆重。司令官、冉曼和柯利诺两位准将和2000名士兵护送皇帝使团进京。101部队和102部队的军旗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军旗齐头并进，后面是特使坐的轿子，由8名身着灰色和猩红色丝质号衣、头戴三色流苏中国软帽的苦力抬着。

用蓝丝绒做封面的天津条约被用金流苏饰带与一个用镀金银盒装的皇帝印章系在一起，连同特使印章，由四名不同兵种的士官捧着。一个炮兵连跟在轿子后面，他们骑着马，但没有带武器，随行的队伍有几个步兵营。在城内，由步兵组成的人墙陪我们走了几乎整个路程。身穿猩红呢斗篷的北非骑兵和非洲轻骑兵在前面开路，接下来是军乐队，乐队后面是一个营队，三位将军走在军旗之间。条约敞开，放在一个天鹅绒垫子上，大家都能看到。我没有制服。在锡兰，我的制服在“马拉巴尔”号沉没时丢失了，所以我只能穿黑色服装，佩戴勋章和饰带。

十多名中国官员身穿礼服，骑着马在门口迎接，向我致意。随后他们带我前往礼部的一个大厅，恭亲王在那里等我。路上花了两个小时，需要穿过潮水般的人群。警察用皮鞭维持秩序。当轿子进

入会议大厅正对着的院子里，我看到年轻的王爷起身要与随行人员来迎接我时，我让苦力们停轿，抢在亲王迈过门槛之前迎上去。他向我伸出手来，我握住他的手，向他行礼致敬。我感谢他派官员前来城门口迎接我，并表示很荣幸能与他签署旨在恢复两国和平的协议，真诚希望和平不再遭受破坏。我还告诉他，我只是表达法国皇帝的想法，祝福他的尊贵的皇兄、皇室和清帝国繁荣昌盛。亲王再次向我伸出手表示感谢，并带我来到他左边的一把椅子，这在中国是贵宾的座位。蒙托邦将军坐在我旁边，陪同他的官员占据了礼部大厅的左半边，而头顶各色帽珠的中国官员身着礼服，占据了大厅另一边。

众人就位后，我让巴士达先生向亲王呈上预先准备好的四份协议中文文本，请恭亲王先签字，同时我将先在四份法文文本上签字。

协议的八份文本签了字，又盖了章，盖章在中国司法程序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后我告诉亲王殿下，根据司令官的命令，在安定门的炮兵将鸣二十一响礼炮，以庆祝和平重建；我将要求司令官停止一切非防卫性的军事行动。

接下来是天津条约换文仪式，在开始之前，恭亲王指出，他不带一兵一卒，放心大胆地来到了法国军队之中。我回答说，他的信任是完全正确的，我很荣幸看到亲王能公正评价我有幸代表并负责传达其命令的法国皇帝陛下之诚信。

亲王仔细审查了条约和与条约系在一起的法国国玺，我对他说，皇帝的头像也是玉玺的印记，在法国所有的钱币上都能见到，我就这样有意制造了让他看看法国钱币的机会，并趁机送了他一套法国钱币，从币值 100 法郎的金币直到只是金币千分之十的铜制生丁。也许我这样做是立了一个标尺，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想要改变

现有荒谬不便的货币体系，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尺指示的路径行事了。我的赠送令亲王大为高兴，他长时间察看每个硬币，饶有兴趣地读着这个以法郎为单位的货币体系的说明，这些说明类似于图例，是我让人用中文写在每个固定在钱币边上的纸上的。

从钱币上的头像很容易就说到肖像，我给亲王看了两张法国皇帝和皇后的照片，并请他留作纪念。

整个仪式期间我尽量表现合乎礼仪和对亲王的尊重，而昨天，在同样的地方和同样的场合，据说有人对他十分冷漠和严厉！亲王感到很高兴，在他那张表情丰富但又不失威严的脸上，会议刚开始时流露出来的忐忑不安很快消失了。最后，在签署了恢复两国和平的文件后，快要分手时，恭亲王派人大声告诉我，如果我能在北京再待上几天，他将作为朋友而非钦差大臣拜访我。

整个仪式过程中，恭亲王一直盯着我的衣服看，我只好告诉他，我很遗憾未能穿着礼服与亲王会面，因为我所有的东西在锡兰海难时丢失了！恭亲王脸上泛红，指着身上的长袍对我说：“彼此彼此，我也没有穿最华美的礼服，阁下的礼服沉于水，我的礼服毁于火！”他已经知道我不想参与焚毁他哥哥的夏宫。

离开时，恭亲王一直把我送到轿边上，我们在融洽的气氛中道别。

我回去仍走来时的路，而司令官和部队退回城外的司令部。

下午3时，亲王派人送来15个篮子，里面是一顿完整而精美的中国晚宴。不用说，衙门里卫队和军官一个个兴致勃勃，享用为快。

以下是1860年10月25日在北京签署的法中两国恢复和平的协议。

今大清国大皇帝、大法国大皇帝，切愿将两国不协之处调和，

以复旧好，是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大法国大皇帝特派内阁大学士世袭男爵葛罗，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彼此既将所奉便宜行事之上谕及钦奉全权之诏敕，公同较阅核查，俱属妥当后，即将所立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大法国钦差大臣于己未年五月进京换约，行至大沽，该处武卒拦阻前进，大清国皇帝甚为可惜。

第二款：大法国钦差大臣进京换约时，或于途次，或在京师，大清官员俱以相宜钦差之优礼接待，俾得任便，称其职守。

第三款：从换约之日起，咸丰八年在天津所定之和约，暨遗补之款，除现在所改之款外，即日起均应一一施行。

第四款：己未年在天津所定遗补第四款内载，中国赔补军需银二百万两，兹已删去。今复议定赔补银共捌百万两。在此数内，已收到去岁粤海关缴银叁拾叁万叁千叁百叁拾叁两零。其余银两，宜在中国各海关每年收税银若干，按五分之一扣归。其交银之时，系三个月交一次。首宜于咸丰十年八月十七日起，而于十一月二十日止。但所交之银，或纹银，或洋银俱可。其银应交大法国驻扎中国之钦差大臣，或所派之员亦可。但限定于十月十八日在津郡一盘现交银伍拾万两。将来大法国驻扎中国钦差大臣，暨中国大臣，各派委员会议，定立如何交收银两，如何立定收单等事，再为妥定。

第五款：中国今所赔补之银，本系为军需，又为法国商人及其所保护者在广东省城所有行内物件被百姓或烧或劫，将来大法国将此赔补之银，均公允分摊与被累之法国人。其银扣壹佰万两，派与法国国民人及其所保护者，为补其害，或为慰其苦，其余皆抵军费。

第六款：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颁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筑礼堂，且将滥行

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

第七款：从两国大臣画押盖印之日起，直隶省之天津府，尅日通商，与别口无异。再，此续约均应自画押之日为始，立即施行，毋庸俟奉两国御笔批准，犹如各字样刊载天津和约内一律遵守。如此，大法国水路二军，俟在天津交银五十万两，方能退出天津，屯占大沽、烟台二口。待至中国将所赔之银全数交清后，所有法国武弁占据中国各地方，均应退出境界。然任水路各大将军于天津扎兵过冬，而俟所定赔补之现银给清后，则撤大军退出津郡。

第八款：戊午年所定原约互换之日，所有法国屯于舟山之军，立当出境。续约所定应缴银五十万两，缴清之日，除统兵官暂驻天津过冬，谅不便即行撤兵外，应如第七款内所言，即驻津各军亦应离城，退至大沽炮台。登州、北海、广东省城各等处驻扎，俟续约所定赔补款八百万两全数缴清，以上各驻军再当扫数撤归。

第九款：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下法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法钦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

第十款：戊午年所定之和约第二十二款内，有错载之字样，即系凡船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钞银五钱。现在议定，凡船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钞银四钱，不及一百五十吨者，每吨纳银一钱。嗣后大法国船只进口，俱按现在议定之数输纳。

右续约于京师妥定。华、法两国钦差全权大臣各画押盖印。于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

葛罗男爵(签名)

恭亲王(签名)

10月13日给恭亲王下的最后通牒是希望通过法中两国签署和平协议，中国政府保证向法国支付20万两白银，用于赔偿通州事件的受害人；但是出于对恭亲王的宽容，我和额尔金勋爵一致同意，这笔作为惩罚要求中国政府支付的赔款已经按时付清，故不再列入旨在恢复中国和诸盟国之间和平的正式文件之中。正因为如此，条约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10月25日和平协议签字后，举行了天津条约换文仪式，有记录为证：

天津条约换文记录

1860年10月25日，法中两国高级专员钦差大臣，拥有经彼此核查认可之全权：法兰西帝国：葛罗男爵、帝国参议员、法国皇帝陛下驻华特使、法国二级荣誉勋章获得者、骑士会会员、多项十字勋章获得者；大清帝国：恭亲王殿下、皇室成员、钦差大臣，在北京礼部会晤，交换1858年6月27日于天津签订的和平、友谊和贸易条约的批文，与会者还有两国的秘书和译员。

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男爵将天津条约原件交予恭亲王，条约被译成两国文字，上有法国国玺盖印和法国皇帝陛下签字；在批文中，法国皇帝声明：上述条约所有条款均已被批准且将得到严格执行。

亲王殿下收到经如此批准的条约后，将经由中国皇帝陛下批准且盖有朱印的同一条约的一份文本交法国高级专员阁下。

1858年6月27日签订的天津条约批文换约仪式结束后，两国

钦差大臣签署了由双方秘书起草的本记录，并盖上各自的印章。

本记录一式四份，1860 年 10 月 25 日完成于北京礼部大厅之一。

葛罗男爵(签字)

恭亲王(签字)

在交给法国特使以换取法国皇帝陛下批文的天津条约原文中，恭亲王附加了以下声明。

北京，1860 年 10 月 25 日

1858 年 6 月 27 日签订的天津条约批文换约。

我，恭亲王、皇室成员、全权钦差大臣，声明且证明，上述全部条款是两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的正本文件，均盖有皇帝印章，证明中国皇帝已批准和确认该条约，并担保所有条款将得到严格执行，无需再由皇帝另行批准。

特写此声明，以作条约之永久担保。

北京，1860 年 10 月 25 日。

下来是亲王的签名，边上是钦差大臣印章。

天津条约第一页上盖着皇帝的朱印。

在此无需附上天津条约原文，因为算上附录和费率清单的话，可成一卷书了。在此仅附上条约之第十三款如下：

1860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批准的天津条约第十三款。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北京，1860年10月26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司令官先生：

我很荣幸随函送上已签署的和平协议批文抄本。这是昨天，10月25日，我和全权代表恭亲王在北京一个中国人叫做礼部的王宫里签署的。随函附上一份会议记录的抄本，该记录证明，在同一次会议上，两国全权代表还交换了1858年6月签订的天津条约的批文。

法中和平已顺利恢复；因此，根据皇帝的命令，我必须以法国政府的名义要求您立刻停止对中国的一切非防御性军事行动。

法中和平协议在本质上同本月24日英国和恭亲王签署的协议完全一样；您将从中了解，从今天起两个签约国必须履行的承诺，因此若有必要，我需要您的协助以确保承诺得到忠实履行。

在我回法国之前，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事情需要我出面或者给您以道义上的支持的话，可以说皇帝基于信任委派我来华执行的使命在今天几近完成。

将军先生，我对我们之间的互信关系感到十分满意，请允许我对您为圆满完成共同使命所作出的当之无愧的积极和出色贡献表示真诚的敬意。

我准备返回天津，在那里静观事情的发展并等待布尔布隆将军，他应该很快就到。我打算和部队一起出发，希望在特使团从北京回天津的途中，能像从天津到北京时一样，得到阁下的保护和援助。

请接受……

我给沙内海军少将寄去同样内容的信。

北京城前，1860 年 10 月 26 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我很荣幸随函给您送上 10 月 25 日我和恭亲王签署的和约抄本，以及在同一次会议上举行两国全权代表互换天津条约批文仪式的记录抄本。

我给法军在华司令官和沙内海军少将都寄去了这两个文件的抄本，并以法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他们停止一切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当然，纯粹的防卫行动除外。

法中和平已圆满恢复，现在只需忠实履行和敦促忠实履行相关的承诺，这些承诺自本月 25 日起已将天津条约和北京和约的签约双方约束起来。

我打算几天后随目前驻扎在北京城外的法国军队一起回天津，我想，等到了天津，我们还需要共同协商，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由于各项北京文件的签署而得以顺利恢复的政治和贸易关系。

我不用再说我是多么庆幸，在我们共同完成在华第二次使命期间，阁下同第一次时一样，向我提供了如此真诚有效的帮助；阁下也一定注意到，我总是力图与您一致行动，并尽我所能，报答您在道义上给我的支持，同时我很高兴尽到我的责任，将您给我的道义支持禀告皇帝陛下的政府。

我很荣幸……

北京，1860 年 10 月 27 日

今天我收到本月 22 日上交部队财务处的 20 万两白银的收据，内容如下：

我，署名人，驻中国远征军发饷员，声明以发饷官拉法热先生的名义收到法国特使所交白银 7400 千克^①，该数量在用我仅有的一杆粗陋的中国大秤称过后得到确认。折合法郎价值将在发饷官先生在此批白银出售入账时按信托局法定成色确定。根据我所使用的称量工具的称量结果，我可以肯定，这些银锭应相当于中国政府承诺赔付 1860 年 9 月 18 日事件中受害者的 20 万两白银。

1860 年 10 月 24 日立于北京。

杜迪罗(签名)

葛罗男爵致俄国驻北京大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

将军先生：

我很荣幸通知阁下，本月 25 日，我与恭亲王殿下签署了法中两国重建和平的协议，并在同一会议上交换了 1858 年 6 月 27 日签署的天津条约批文。

在此，我私下给您送上和平协议的抄本，以及 1858 年条约换文会议记录的抄本。

两国已顺利恢复和平，我随即要求法军司令官和沙内海军少将停止一切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当然，合法的正当防卫除外。

请接受……

北京，1860 年 10 月 27 日

额尔金勋爵的秘书罗亨利先生今天早上启程返回欧洲。我托他带回寄往巴黎的信件，以及一封电报，烦请罗纳河口省省长代发到巴黎。电报简单宣布了在北京签订和平协议之事。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北京，1860年10月28日

今天，几乎全体法军将士将9月18日事件的六名遇难者遗体护送到天主教墓地，该墓地事实上已归还北直隶主教孟振生。特使团昨天接到司令官通知，到了司令部后，被安排在运送六副棺材的炮车队后面，一直将它们送到墓地。伊格那替叶福将军、俄国公使团成员和两名北直隶地区的主教已等在那里。军队牧师和不少中国神职人员走在灵车前面。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参谋在路上与我们汇合，而额尔金勋爵由于生病卧床，对于不能参加葬礼托人向我表达了他的遗憾。在南怀仁、利玛窦和汤若望等著名传教士的墓旁，已经挖好一个共用墓穴，六名受害者的棺木按军人的礼节被埋葬于此。大家都很悲伤，眼泪洒在不幸同胞的坟墓上，他们为基督教信仰在远东的传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29日上午9点，下着冷冷的雨，特使团的全体人员都去了已归还孟振生主教大人的天主教堂。一队工兵已经将教堂清理干净，被砸掉已久的十字架被重新置于教堂的三角楣上。孟振生主教带着助理以及北京的部分教士在此举行了祝圣仪式，还替昨天埋在天主教墓地的遇难同胞做了追思弥撒。这个教堂地处远郊，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死人是不能埋在城里的。最后，《圣母颂》和《感恩赞》在这个有着5亿多人口的帝国的首都唱响，而不久之前，信仰基督是要被处死的！对于刚刚发生的如此重大的事件，任何思考都是多余的。请允许我只说一句，我多么高兴看到自己的名字与此类重要事件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上帝会帮助最谦卑的人成就重要的大事。

北京，1860年10月28日

今天接见了北京地区的两位主教，他们给了我一份中国神职人

员名单和住在北京的天主教徒名单。他们还当着我的面读了两份演说词，并将写在黄纸上的演说稿交给了我。这些演说词的译文将使我们了解对远东人的文体有所了解！

北京，1860年11月

北京主教致葛罗男爵函。

特使先生：

我力图将在您面前读的演说词尽可能翻译出来，但汉字往往言简意远，我们的语言无法用很少的词语表达汉字的活力和丰富含义。阁下将看到，北京的教士和基督徒知道如何评价阁下的个人品质和崇高使命，以及阁下给予他们的无量的宗教恩德。他们将对您永怀感激，并有幸将我们的皇帝，不朽的拿破仑三世誉为仅在上帝之下的救世主。

特使先生，请接受我对您的钦佩、尊敬、忠诚和感激之情；正是怀着如此情意和对耶稣及圣母玛利亚的爱，我有幸为阁下……

孟振生，北京教区主教

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签名)

在京中国天主教教士致葛罗男爵的祝词。

大法国高级全权特使、贵国君主的英明代言人和理事行家；法兰西帝国重臣，智勇双全，无人可比。您率领法军抵达中国北方，反对世界不平。面对强敌无数，将军们用兵如神，攻陷大沽，夷平炮台，勇猛无比，攻坚如折芦苇。您深入敌营，如入无人之境，敌方将领闻风丧胆。他们魂飞魄散，风声鹤唳，大败而逃。敌军如此惊慌失措，实是天主发威，挫其傲慢也。

敌首几番求和，却又不弃诈术，竟拘押您手下将士，甚至残害

数人致死。您义愤填膺，率部直捣皇城，但我们知道，您慈悲为怀，反对盟友主张，有意保全我们的皇帝夏宫。如同万能的天主，您为我们排除困难，您使我们获得新生，就像慈父将弱小心爱的孩子紧抱怀里。您交换和约，赢得世人好感。您立下的功劳、您表现出来的美德、您的名声，举世瞩目，万众敬仰。天主教堂已经开放；我们犹如从醉梦中醒来。废墟已经清理，杂草已经拔出，灯火明亮，如星光四射。短短三月，持续多年的迫害烟消云散，和平得到保证。神圣的宗教从此光照四方，行善之路将向所有的人打开。愿天主奖赏我们尊贵的皇帝和您的光荣君主。

我们全心全意为您的名誉和光荣祈祷，我们怀着敬意奉上这篇祝词，并恳请天主为您敞开所有宫殿的大门！

在京中国基督教徒致葛罗男爵的祝词。

所有在京皈依神圣基督的居民有幸告知阁下，中国当局反对我们的神圣信念，多年来一直禁止我们从事宗教活动，否则将受到酷刑折磨。贵国士兵为使条约得到执行而奋战，我们的境遇非常危险。但是，自从尊贵的全权特使受法国皇帝之命来到中国，我们得救了！现在，我们生活得像一个让母亲抱在怀里或爱怜地放在躺椅上的孩子。是您使神圣的宗教有了彻底的活动自由，因此，同过去一样，我们可以为天国唱响快乐的圣歌，视您为圣父圣母，您当之无愧！我们的感激高于一切！我们感激不尽！

我们无法在同一天一起来向您跪拜致敬，故写此文以呈特使葛罗男爵先生。我们向您致敬；我们希望您生活安康，并请求您一读此文，如果无意中有什么失敬之处，万望您原谅。

此乃我们之愿望。

北直隶的两位主教和德拉玛神甫恳请我为 28 名传教士发放通

行证，这些传教士中有的长期以来一直秘密居住在内地，有的想去那里；下面有我采纳的通行证样式，而恭亲王对我开恩，亲手签发了以下人员的通行证：德拉玛神甫、萨热、夏尔勒努、埃罗、埃玛纽尔、法比安塔比、樊索、雅克主教、富雷、阿尔纳、保罗佩尔尼、于奥、欧仁主教、约瑟夫蓬索主教、约瑟夫肖沃主教、安东尼帕潘、潘松主教、朱立安潘松、夏尔皮诺、法热、孟振生主教、让阿努伊主教、亨利巴杜主教、安东尼、蒂埃里、樊尚玛丽、亚历山大儒尼雅克和朱立安贝特朗。

署名人，法国皇帝陛下驻中国全权特使、高级专员，恳请中华帝国民政和军事当局根据 10 月 25 日在北京批准的天津条约第八款，允许赴四川行使其神圣职责的法国传教士德拉玛先生在帝国自由通行，必要时给予帮助。

德拉玛先生为法国特使团所了解，系正派之人，只从事值得嘉许之慈善行为；本通行证由颁发地中国当局签署，于 1860 年 10 月 29 日在北京发予当事人，但德拉玛先生不得以任何借口前往叛乱者占领的城市或者乡村。

北京

葛罗男爵

持证人签字

此通行证和其他 27 份同一天由恭亲王签发。

北京，1860 年 10 月 29 日

葛罗男爵致蒙托邦将军函。

将军先生：

本月 27 日，我有幸向您通报了英国特使寄给我的一封私人信函的内容，现随函附上该信函的抄本。您的回答是，回天津的部队

已临近出发，所做的安排已无法改变。但我还想在北京多待几天，所以，将军先生，我请求您同意尽可能给我留下一队士兵，确保我在京期间以及回天津途中特使团的安全。

布尔布隆先生是您为方便特使团和司令部的联系而派驻特使团的，我就派他给您送去这封信；如果您想了解我的随行队伍情况，布尔布隆先生将会提供全部详情。

将军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我要向巴黎的法国外交大臣提供九一八事件受害者的详细情况，我需要知道幸存者以及遇害者的名字、年龄、军衔或者职业。

天气那么糟糕，我尽责尽职出席了两次仪式，感到体力不支，否则我今天就会去拜访您，而不是给您写信。

请接受……

1860年11月1日

皇室成员、全权钦差大臣恭亲王致葛罗男爵的急件。

今天早上6点我接到上月28日皇上圣谕，特此奉告。我不仅要让中国人和外国人知道，还要派人张贴全国各省；且我有义务派人抄录并呈送阁下。

这是我给法国特使葛罗男爵写此重要信函的目的。

圣谕

上月28日，军机处收到谕旨，内容如下：

恭亲王关于10月24日、25日条约换文之奏折已阅，现宣布由恭亲王交换之条约以及与法英两国所签新协议之全部条款皆获确认与批准，并将得到执行，特此通谕。

从今日起，敌对行动永远结束，和平将重建，双方对和平充满信心，不被猜疑所迷惑，特命各省张榜公布全文，总督、巡抚和帝

国官员依令行事。

钦此。

北京，1860年11月3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本函署名人收到亲王殿下来信，以及内附皇帝圣谕的抄本。在圣谕中，皇帝陛下宣布两国和平已经恢复，敌对行动已经终止，天津条约以及中国与法英两国新签订协议的所有条款都得到确认和批准，并将在全国各省全文公布，以便天下周知并予以严格执行。

署名人很高兴看到法中两国重建永久和平；事实证明，他对恭亲王的充分信任是完全正确的。

署名人谨向恭亲王殿下献上对皇帝及其家人以及对中华帝国繁荣昌盛的最真诚的祝福。他仅仅是在表达法国皇帝陛下希望清帝国更加稳固的心愿，同时他也很荣幸代表法国君主表达这一心愿。此外，法国皇帝陛下的心愿也已写进了他给中国皇帝陛下的信函，如果当时情况许可，署名人已将此信呈交中国皇帝了。

署名人……

额尔金勋爵和我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得到中国皇帝召见，递上各自君主的信函。我们保证召见时遵守我们在参加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时必须遵守的礼节。这个问题很微妙，每次欧洲使节被派往北京都会引起严重分歧，即使1860年我们的军队取得完胜，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中国皇帝要求我们对他磕头，也就是进了被召见的宫殿时，全体朝臣位列两旁，使节虽然代表自己国家的君主本人，却必须有失体面地趴在地上三叩首，且每次都要额头碰地。

这样的要求实为苛刻，因此皇帝和女王的信函至今还在我们手上。

北京，1860年11月3日

通州来了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告诉我卜罗德海军上校从天津派来了14艘小船或者说舢板，让我带着特使团的所有人员和行李沿河而下。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九门提督通过孟振生主教告诉我，他非常希望上门拜访我，希望我能给他发一份请柬。我不想见他。他叫胜保，是八里桥战役时的副将，是他杀害了杜吕克神甫和布拉巴宗上尉，但他替自己辩白，说瑞麟是这一野蛮屠杀的唯一罪魁。

北京，1860年11月4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几天前收到阁下来信，正式告诉我要把中国皇帝的夏宫夷为平地的理由，而之前阁下已私下说过；就在这座宫殿里，9月18日被非法扣押的不幸同胞中有许多人惨遭虐待致死。由于事务繁多，我曾请阁下允许我不马上回复，而这一推迟不会造成任何不便。

现在稍有空闲，我就先请阁下原谅我迟迟才回信，但我的回信几乎只是一个回执，因为我无意开始一场很可能没有结果的讨论，特别是在今天，许多事情因为有了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再说，讨论几乎改变不了我们在彻底摧毁圆明园皇宫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毫无疑问，阁下您所采取并坚持的主张来自您内心的信念，我虽然无法苟同，但我有责任将您对我陈述的理由禀告法国政府，并为您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感到光荣。因此我将把我今天给予答复的信函之译文和抄本寄往巴黎。

我有幸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告诉过阁下，由于皇帝出走和帝

国中央政府群龙无首，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对恭亲王抱有希望，他是京城仅存有一点点权力的大臣，但圆明园一场大火可能迫使他逃离，特别是这个时候又要求中国政府自己掏钱在天津建碑承认自己背信、懦弱和自愿接受惩罚。如果坚持实施这些措施，那么，至少在我看来，恭亲王出逃就不可避免，这样一来，圆满完成我们所负使命的希望就会全部落空，总体利益无法捍卫，这一结果压倒所有其他的考虑，甚至压倒我们痛苦地置于第二位的考虑。

我很高兴阁下同意放弃在天津竖立赎罪碑并为此举行典礼的要求。但是我无法支持在我看来无异于逼走恭亲王的要求。事后我得知，这场大火差点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看到滚滚浓烟飘向北京，恭亲王意欲出走，最后差不多强迫之下才把他留住，没有离开令他胆战心惊的藏身之处。

听了明智的劝告后，恭亲王明白了，只要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仍可以保全一切。因此，在10月19日的来信中，他写道：

“我认为向您的受虐同胞家属赔偿20万两白银是合理的，我会认真履行，亲自将钱交给您。让您的同胞遭受虐待的官员将依法受到严惩，我刚接到谕旨，削去僧王（僧格林沁）爵位，将瑞麟革职查办。”

恭亲王还答应了我10月17日照会中提出的所有条件。

作为对九一八事件的物质和精神补偿，我承认这也许并不够，但我满怀信心期待皇帝陛下政府对我在这种形势下的决定做出评价。

幸运的是我们之间出现的分歧，如我所愿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不管该分歧多么微乎其微，我还是从心里感到遗憾，因为阁下知道，我一直乐意同您一致行动，而且，我们彼此信任，这使我

更容易忘怀得失，常常遵从您的见解。

我很荣幸……

皇室成员兼钦差大臣恭亲王照会法国特使葛罗男爵如下：

我很荣幸写信告诉阁下，11月4日来信收悉。阁下在信中祝愿大清国永远繁荣，国民永享和平与幸福，信的要旨我已悉知，我高兴至极。因为来信表明，两国真诚希望和睦相处。我也祝愿贵国永远繁荣昌盛。

至于北教堂和南教堂以及其附属土地，应该同正式文件一起交给阁下，通过阁下再转交到孟振生主教手上。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将南教堂及其附属土地归还您，并将给您寄去一份正式的归还证书，您便可将此教堂移交给主教大人。

至于北教堂，由于消失多年，我已下令让地方官员仔细调查，调查一旦结束，我立刻将该教堂和其附属建筑连同归还证书一并交给阁下。

这就是我通过本次信函想要告诉阁下的事情，1860年11月5日。

北京大教堂归还证明

皇室成员兼钦差大臣恭亲王特颁发此证明。

得知皇城内宣武门旁有一天主教堂，现将该教堂及其附属土地、房屋交还法国政府，由法国政府将其交由本地主教孟振生先生管理。

特此证明。

立于1860年11月5日。

北京，1860年11月5日

葛罗男爵致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函。

将军先生：

我曾有幸给您寄去在北京签署的和约之抄本，根据该和约第六款，中国政府承诺将帝国境内所有被没收的宗教建筑通过法国驻华特派代表交还给基督徒。据恭亲王命令，北京教堂已经交还给我，埋有南怀仁、利玛窦、汤若望和张诚遗体以及其他在华传教士的天主教墓地也已归还给我，这一墓地曾委托俄国皇帝陛下传教会负责看管。阁下也已答应了我提出的要求，将墓地交还与我，在修道院院长的虔诚关怀下，墓地没有受到任何亵渎，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了我们。

阁下知道，我已将这座墓地和北京教堂交由北直隶主教孟振生大人看管，不久他将与法国公使团协商，对可能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作出合法规定。

将军先生，我想俄国驻北京传教团为保护这座墓地花了不少钱，因此，我恳请阁下将墓地档案、账目、资料或其他凭证转交给法国驻中国公使或孟振生主教大人，以便根据法律和公正原则结算一切开支。

我无需对您说，将军先生，我已禀告法国皇帝陛下政府，阁下和俄国驻华传教团团长用伟大的基督教义取代一切宗教分歧，为在清朝首都恢复基督信仰作出了积极和有效的贡献。

请接受……

北京，1860年11月5日

葛罗男爵致北直隶孟振生主教大人函。

主教大人：

10月25日在北京签署的和约第六条款载：

“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颁示天下黎民，任

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筑礼堂，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

如您所知，主教大人，此款已开始执行，北京教堂已交由我来支配，而几年来由俄国驻中国教会负责看管的天主教墓地也已交还给我们。

主教大人，这两处宗教建筑已经转交给您；为了对某一天可能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作出合法的规定，希望阁下与法国驻华公使先生协商一致，因为根据北京和约，所有宗教建筑都应首先交还给法国公使先生。

随函附上我今天写给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的信函之抄本，以便您了解如何尽可能合法地确定宗教建筑的地位。

不用说，主教大人，我是多么幸运，因为我把我的名字与一次重大的行动联系在了一起，这次行动还使天主教信仰在中华帝国的首都得到公开和合法恢复。我愿与全体神职人员共同祈祷天主降福我们尊贵的皇帝，而我只是执行了他的命令。

主教大人，请接受……

1860年11月6日的附言

主教大人，我还来得及为5日写的信添加附言，因为信还没有送走。恭亲王寄来一份关于北京南教堂正式交还给我的文件，这座教堂我已交给您看管了。恭亲王提到另外一座在城北的教堂，一旦知道它所在的地方，就将它交还给我，至少交还它所占的土地和附属建筑，因为据说这座教堂被毁已有一些年头了。

主教大人，劳驾您把我今天给您的正式文件寄还给我，该文件应留给法国公使团存档，用以确认我们所拥有的权利。我也会给您

送去一份有效抄本，可用作归还证明。

1860年11月5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今天早晨收到恭亲王殿下下的正式文件，文件证明北京城南的天主教堂已由中国政府交还给法国政府代表，后者将教堂托付给孟振生主教，以便主教大人使用教堂及其附属土地。亲王殿下还说要调查北教堂的所在地，该教堂也应归还法国。

看到中国政府信守承诺，署名人感到十分欣慰；亲王殿下也请放心，法国政府也绝不食言。

署名人很感谢亲王殿下对法国及法国皇帝的祝福。他有责任在最近发往欧洲的信函中将殿下的祝福禀告法国政府；他回到法国后，也一定会将亲王殿下光明正大与盟国缔结和约以报效祖国的功绩呈报法国皇帝陛下。

请接受……

北京，1860年11月5日

今天，特使团全体人员在俄国公使馆用晚餐。在那里听说当中国政府被正式告知联军要彻底焚毁圆明园或将它夷为平地的时候，恭亲王准备逃往塞外，是别人苦苦哀求，甚至强行阻拦，才没有让已套好的马车走成！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如果他逃走了，我们就会陷入能想象到的最糟境地。

北京，1860年11月6日

卜鲁斯先生突然来到北京，和他的兄弟额尔金一起来看我。他认为英国和法国必须马上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他还说，他愿意待在

这里。但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也不够谨慎，我答应给我的英国同僚发一个照会，告诉他这样做的弊端。

北京，1860年11月7日

电报

葛罗男爵致法国外交大臣。

我与皇帝胞弟于10月25日签署和平协议。

上海最后通牒也被接受。

同一天还举行天津条约换文仪式。

中国向法国支付60000000法郎作为赔偿。

本月30日支付3750000法郎。

我收到中国政府1500000法郎赔偿，将由法国政府赔付给九一八事件受害人。

天津增设为对外口岸。

中国政府允许苦力移民。

中国境内过去属于天主教徒的所有天主教堂、墓地及其附属建筑都将通过法国驻中国公使交还天主教徒。

在埋有南怀仁、利玛窦、汤若望和张诚等人的天主教墓地，我们隆重安葬6名九一八事件遇难同胞。

墓地也已交还给我。

10月29日，北京教堂响起《圣母颂》和《感恩赞》圣歌，教堂已由我转交北直隶主教。

我们取得完胜，一切都使我相信胜利定会持久。

葛罗男爵(签名)

这封电报经由西伯利亚发给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蒙特贝洛公爵，烦请他发往巴黎。

北京，1860年11月7日

葛罗男爵致额尔金勋爵函。

阁下：

关于目前形势下在北京立刻设立两国公使馆，抑或推迟到明年春天再实施，我考虑良久，认为此举为时过早且十分危险；因为皇帝身边的鞑靼主战派投其所好，满足其淫欲，煽动起仇恨，而在京设立常驻机构会授人以柄，他们正好用来扳倒恭亲王及其支持者，这可能让我们至今所做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如阁下所说，中国皇帝回到北京，愿意在北京接见我们，那么在京设立公使馆是顺理成章之事。设立公使馆不过是我们与中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继续。可是皇帝已经出逃，我们在京期间他不愿回来，难道当我们的旗帜在联军公使馆永久飘扬时，他还会愿意回来？难道他不会更愿意实施他几次当真提出的看法，亦即迁都内陆的一个城市？

相反，如果我方军队撤离北京，我们也不再继续待在那里，皇帝就会回来，他的自尊也不会受伤害；一切将恢复正常，两国公使将根据条约常驻北京，皇帝也将接见他们而不是应付，这对皇帝以及对我们而言不是更好吗？

因此，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我就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会将法国皇帝的公使馆设在天津，同时宣布该公使馆只作为外交人员过冬之处。在天津，公使馆可与北京的官员直接通信联络，以便处理日常事务，比如法中双方如何履行各自承担的责任。在此期间，可在北京准备一个合适的住所，到明年四月，部队撤离天津之前，公使团可以进驻首都，那时，消息向外公布，人们也早有准备。

目前，在皇帝回京之前，尤其是在我们的军队完全撤离北京之前，恭亲王不希望公使团进驻北京，他一直让皇帝抱有这样的想法，和约规定，在条约换文后，部队将撤回天津，但没有专门规定，外国公使团必须立即进驻北京。

这个新的要求肯定是我们的权利，但中国皇帝和恭亲王对此毫无准备。但我认为，该要求是对恭亲王影响力的致命打击，也许会使他远离权力，而代之以皇帝身边敌视我们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两位公使在北京孤立无援，难道不用担心他们的安全吗？在东方人身上那么强烈的复仇思想可能使一些可怜人头脑发昏，难道不会发生什么灾祸？那时候我们两国政府就会卷入一场新的斗争，也完全有理由责备我们鲁莽行事。

阁下同样不要忘记，在清政府眼里，卜鲁斯的所作所为是中国最近所遭受一系列灾难的直接原因之一；而且，要使您的兄弟正式走进高官大员的衙门，也许有必要预先铺好他必须走的道路。我这样说并不带任何私念。

虽然我没有予以进一步阐述，但这就是我对当前问题的负责的看法；等您拿定主意后，我再作决定。

阁下能否告知打算明日几点启程？我打算与阁下错开 1 小时出发，免得路上拥挤，特别是与军队同行的话。与我随行的只有一营部队，也就是 600 人，外加 4 名非洲轻骑兵和 2 门野战炮，以及马车装载的行李和生活必需品。我打算直接前往通州，搭乘已在那里等我的帆船。营队将尽量走水路，路上大概只需 5 天时间。

请接受……

北直隶地区主教孟振生致葛罗男爵函。

特使先生：

昨晚我收到一信函抄本，上言恭亲王将已成废墟的北京教堂及已废弃的、主教及其教徒曾居住过的住宅交到阁下手上。前天收到阁下信函，以及随函所附阁下写给俄国驻中国全权代表的信函抄本，信中也写明从其手中收回原本属于我们的教堂和附属建筑。

在上述提到的信函中，阁下希望以拿破仑三世皇帝的名义，将这些体现帝国在华尊严的教堂、所属土地、教会人士住所、墓地及其辅助建筑交到我们手上，让我们立即接管。

特使先生，我十分高兴且万分感激，作为北直隶地区主教，代表庇护九世教皇接受阁下转交的基督教建筑和土地，并恳请阁下接受神甫和我以及所有在京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最诚挚的谢意。我们恳请阁下向皇帝陛下转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感谢他带给我们如此大的恩赐；同时向皇帝陛下申请资助我们重建在京天主教堂，我们将在原教堂遗址上建起代表整个法兰西民族尊严的建筑，而我们也将会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感到幸福和骄傲。

我很荣幸随函给阁下寄去以下地址的法文译本，在京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肯定已经向阁下提过这些地名。

特使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和谢意，愿耶稣和玛利亚保佑阁下。

我很荣幸……

孟振生(签字)

天主教宗座代牧，北京教区主教
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

北京，1860年11月8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本函署名人离京之前特向恭亲王殿下辞行，并感谢在京期间殿下对我的关心。明天上午9点，署名人将带着少数仪仗人员离京。当初保留这些仪仗人员，纯粹是为了体面。

署名人将在天津逗留几天，等待法国委派新的驻华公使。殿下可以完全信任他。

署名人将永远铭记和殿下的友好关系，并请殿下相信署名人对其的真诚和敬意。

1860年11月8日于北京。

额尔金通过一个短笺告诉我，他和弟弟放弃了立即在京派驻公使的想法。明天中午11点，他将和卜鲁斯一起前往天津，而后者将于明年春天出任驻京公使一职。

我打算明天和额尔金错开一小时启程，沿着冲击层上灰色花岗岩石板铺成的马路，从北京直达通州。我将携带一块碎石返回巴黎。

1860年11月9日

恭亲王不期而至，前来和我道别。他对我十分殷勤，离开我的住所时，还紧握我的手，再三感谢我没有参与火烧圆明园。

九点半，我离开了北京；101团在布洛指挥官的命令下，带着几名非洲骑兵和2门大炮一路护送我。抵达通州后，我将乘坐卜罗德上校安排供我使用的船只。101团将沿白河右岸前行；随我上船的只有1名士官和20名士兵。

苦力、轿子、马车和马匹都经由陆路返回天津。

在通州时，我住在运河边的一座塔楼里。这条运河直通白河，岸边悬挂的柳条笼子内装着刚砍下的人头！随行人员将它们放下并投入河中。

11日，星期天。——早晨6点，我离开通州。晚上抵达马头村。天气十分寒冷，有时候不得不破冰前进。

12日。——我们抵达河西务村。从天津来的一艘中国船只奉当局之命给我送来了新鲜食物。随船前来的中国官员奉命告诉我，我进京之前住过的房子现已修葺一新，我可以体面的入住。13日夜里，美理登所在的船只起火了，警报声很响，但火势很快被控制了。

14日。——我们抵达天津，并将在此逗留几天。前一夜，布尔布隆带着公使团所有人员也已抵达天津。

天津，1860年11月14日

联军两位司令官商定，法国海陆军队将占领芝罘，英军则占领庙岛群岛。直到中国政府付清赔偿款为止，但如果两国政府愿意的话可以提前结束。

天津

我将北京条约抄本正式呈送布尔布隆。并向他转达了政府当局的指示，他将作为法国在华唯一代表，常驻北京维护法国的利益。

15日。——蒙托邦将军把攻占皇帝夏宫那天在里面找到的与法国相关的资料交给我，包括天津条约、条约附约、通商章程以及海关税则。这些资料属于中国，一共八份，阐明了缔约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已全数交还中国当局。

天津，1860年11月16日

恭亲王派恒祺给我送来一封信函和一大捆中文印刷品，并委托我将这些资料从海路运往指定省份，因为这样可以比陆路快一些。

恭亲王信函内容如下：

钦差大臣恭亲王致葛罗男爵函。

很荣幸告知阁下，我刚派人准备了1000份公告，200份条约文本^①，1200份《京报》和5份公函，准备送往广东等省，每份资料都盖有皇上玉玺。

现委托阁下将这些资料送往广东及其他四省，以便今后各地严格按照条约内容行事。

这就是我此次致函法国特使葛罗男爵阁下的主要目的。1860年11月16日。

随函附上：

1000份公告；

250份条约文本，1200份《京报》。

恭亲王致广东、广西、福建、山东、浙江各省巡抚的公函。

皇室成员恭亲王，携军机大臣桂良和户部尚书文祥，特告知各位，今年10月，我与法国代表已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盖章，并交换了两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批准书，此外，我刚收到皇帝圣谕，在《京报》上刊登条约全文，发送到各省、各区、各县，以便各地严格按照条约行事。

^① 此处可能系笔误，条约文本共250份。——译者注

职责所在，故随函给各位送去 50 份条约文本，200 份《京报》和 200 份公告，希望各地政府严格按照条约行事。

特此致函两广总督大人以及福建、山东、浙江各省巡抚，1860 年 11 月 16 日。

天津，1860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天

晚上 7 点，大家都沉浸在即将返回法国的喜悦中，并为出发做准备，突然，皇帝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先生失心疯发作，令人十分担心，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回房间。军队总医师和当时正在天津的海军外科医师采用一切方法希望能将他治好。还用热砖敷脚、冰包敷头的方法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18 日。——我给布尔布隆寄去所有账目表、卷宗以及将北京南教堂归还于我们的正式文件。

1860 年 11 月 19 日

可怜的病人病情多次发作，且症状相同。

1860 年 11 月 20 日

巴士达伯爵病情日益严重。我用卜罗德交给我使用的一艘炮艇把他送到“杜舍拉”号船上。

蒙托邦将军已动身前往日本，将指挥权交给柯利诺将军。

1860 年 11 月 21 日

恒祺奉恭亲王之命设宴款待我。

天津，1860 年 11 月 21 日

军队出纳杜迪罗先生将 7625 千克银锭纳入金库，这是恭亲王交给我的 20 万两白银，本月 30 日中国政府应该支付赔偿款 50 万两白银。他给我开了收据。

他还交给我 140 墨西哥皮阿斯特，共值 160000 铜板，这是我在河西务村时托他保管的。现通过美理登连同以下信函一起转交给恒祺。

天津，1860 年 11 月 22 日

葛罗男爵致现处天津的帮办大臣恒祺函。

葛罗男爵向恒祺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恳请阁下帮他，同时也是帮助 9 月 14—18 日期间，法国特使在河西务村所住房子的主人。也许对阁下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

由于法国特使在此居住，这幢漂亮的房子才幸免于难，免遭强盗洗劫。如果房主全家没有弃房而逃，他们不会遭受任何损失。但是中国强盗人数众多，联军不得不开枪将他们击退，但是不等联军离开他们便又卷土重来，联军士兵来报，说房子里发现了一些钱，于是葛罗男爵将这些钱放进军库，希望一有机会便将其转交给房主。据军队会计统计，这笔钱共 148 墨西哥皮阿斯特及 500 铜钱，现葛罗男爵将盖过封印的这笔钱交给恒祺，恳求他代为转交。

葛罗男爵不知道房主的名字，但是他在河西务村的房子位于当铺附近，旁边是通往张家湾的必由之路。由于法国特使曾在此住过 5 天，这幢房子应该远近闻名了。

在此先行谢过，并恳请恒祺先生相信其诚意。

随函附上盖有男爵印章的包裹，里面装有 148 墨西哥皮阿斯特

及 500 铜钱。

借此机会……

天津，1860 年 11 月 22 日

葛罗男爵致恭亲王函。

署名人已收到恭亲王殿下本月 16 日的来信，得知条约文本、公告以及《京报》已被发往各省，以示天下。

殿下还恳请署名人将随函所附数量可观的文件带往广东及其他四省。

署名人十分感谢亲王殿下下的来信，并将尽快把殿下所托资料送往目的地。

借此机会告知殿下，署名人将于近日启程返回欧洲，从今天起，法国相关事务处置权交至现已抵达天津的布尔布隆先生手上，他是法国皇帝特派驻华全权代表。

殿下可以放心，布尔布隆先生将尽全力维持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希望两国永久和平。

向殿下辞行的同时，署名人恭祝殿下幸福安康，并将永远保持对殿下的敬仰和真诚。

1860 年 11 月 22 日于天津。

天津，1860 年 11 月 23 日

听说我在河西务村所住房子的主人名叫陆贵，我让美理登将这个信息转告恒祺。

186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

早晨 7 点，我搭乘德瓦拉纳驾驶的炮艇离开了天津。晚上 9 点

抵达大沽。

25 日。——晚上 9 点，我离开大沽。船上信号显示，河水深 2 米，水下为沙洲；河面上全是浮冰，一直漂到离陆地很远的北直隶湾海面上，好几次我们被浮冰所阻无法前进。1 点左右我上了“杜舍拉”号。巴士达病情日益严重，让医生十分担心。

布尔布隆先生奉蒙托邦将军之命护送我返回法国，十分感谢将军的安排。

傍晚 5 点半，我们准备起航前往香港，这是三年内，我第二次离开这万里长城的最东端——北直隶湾。

1858 年我曾画过从边塞内外所看到的长城。

28 日。——途经上海。天气很暖和，但是这丝毫没有减轻巴士达的病情。

186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天

抵达香港。巴士达已病入膏肓！我赶紧派人上岸请来一名教士。中午，交趾支那地区主教来给巴士达行临终礼。晚上 8 点，上帝将他召回了天堂！我不得不完成其母亲在我离开巴黎时交给我的任务。她对我说：“男爵先生，如果您不能将我的儿子带回来，请将他的骨灰带回来！”

1860 年 12 月 5 日

我从香港出发前往广州，了解事情进展情况。

这里十分安静且十分安全；欧洲人独自在城市及周边活动时，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政府当局对我们十分友好，希望我们不要撤

离，还指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对抗起义军。

德波瓦舰长自阿博维上校离开后负责统帅当地法国驻军，受到了驻军的喜爱和尊敬。中国政府认为他正直稳重，对他十分热心友好。

广州，1860年12月6日

我致函两广总督劳崇光，内容如下：

葛罗男爵致两广总督函。

法国皇帝在华高级专员、全权特使知会两广总督劳崇光阁下，他于昨晚抵达广州，并将在此逗留数天。昨日抵达时实在太晚，未能及时将恭亲王所托的资料转交阁下，敬请见谅。

今日一早，署名人赶紧命人将这些文件随函呈送阁下，但是为避免浪费时间，署名人已命人将四份张贴在天津城门了。

署名人很荣幸能为两国重建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衷心希望两国永久和平，祝愿中华帝国繁荣昌盛，清王朝万寿无疆。

从法国驻广州军队司令官那里得知，阁下与之相处融洽，双方都十分友善，署名人感到十分高兴，希望在我返回法国前能有幸向阁下辞行，并当面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借此机会……

广州，1860年12月6日

两广总督劳崇光致葛罗男爵函。

今日收到法国驻中国全权特使阁下来信，以及恭亲王托其转交的信函。同时收到与条约有关的官方文件，即：《京报》、公告及皇帝谕旨等。

所有资料已收悉，数目与阁下所说相符。

既然条约已被双方批准，从现在起，两国应当世代友好，没有任何事情能将其破坏。

我会根据亲王旨意，将他交给我的资料张贴到所有管辖的区域，各地都将严格按照新条约款项行事，以此证明两国友好关系。

如今阁下将荣归故里，一想到阁下所经之处一片和平景象，恩及广东，我不禁感到十分高兴。

我将择日前往拜访，望有幸能与阁下交谈。

重要信函，1860年12月6日寄送葛罗男爵阁下。我谨借此机会恭祝阁下幸福安康。

广州，1860年12月10日

两广总督致法国驻广东特派员函。

塔努阿先生：

法国皇帝在华特使先生已抵达广州，我将前去拜访并与之会面，以维系两国之间和谐友好关系。

我打算明日下午1点前往观音山。

特恳请法国特派员阁下代为转告，届时让翻译丰大业出席，以便交谈能顺利进行。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再次向特使先生表达最诚挚的祝福。

直到12月12日，我才得以从广州写信回欧洲，将皇帝使团在中国所蒙受的损失告知内阁，我也给巴士达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委托朋友转交。对于这一致命的打击，她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

巴士达伯爵，毕业于夏尔特学校，是个杰出、聪明、有教养、足智多谋且有分寸的人；在我远赴中国完成第二次使命期间，他是我忠心的伙伴和得力助手，对于他的离去，所有认识他的朋友像他

家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心。“马拉巴尔”号海难和通州事件让他深受刺激，私下交谈时他说的话以及他亲手写的笔记证实了这一点。

广州，1860年12月12日

葛罗男爵致巴士达伯爵夫人函。

夫人：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告诉您这个同样令法国驻华使团十分痛心的消息；您的儿子，我们深爱的朋友，我得力助手，在接受了交趾支那地区主教的临终礼后，被上帝召回了天堂，没有任何痛苦，当时身边围满朋友。本月2日晚上8点，香港锚地“杜舍拉”号船上，巴士达伯爵停止了呼吸。11月18日星期天，这位英俊聪明的伯爵曾短暂休克，之后便如闪电般一下子病倒了。

巴士达发病当天的晚餐比平时丰盛，他曾抱怨离京以来，一直感觉不太舒服，当时我也注意到他过于兴奋，但没引起重视。晚饭后一个小时，他突然大声尖叫，我们好不容易才将他送回房内躺下；随军总医师和当时正在天津的海军外科医师们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将他治好，这位广受爱戴和尊敬的伯爵，此时却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其病情发展迅速，但我不愿将他独自一人留在战地医院，便用一艘炮艇将他运送到“杜舍拉”号船上，交给驱逐舰主治外科医生和船长照顾，他们曾陪同我们前往北京，是巴士达忠诚的朋友。第三天，我上船准备和他一起返回欧洲。希望从北直隶湾的冰海转至热带地区后，温暖的天气能让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经历最初的不适后，他的病情确实有所好转，但是上帝自有他的安排，我不得不完成我们离开巴黎时您交待给我的任务。夫人，我至今没有忘记您说这些话时的冷静与坚强，这令我十分钦佩。我们出发时，您恳请

我，若不能将您的儿子活着带回，一定要将他的骨灰带回。简短的话语中透露着坚强，表明夫人准备接受上帝任何安排。但您的坚强对于同样感到十分心痛的我们而言是一种安慰。

夫人，按照您的意愿，我将完成一位母亲交给我的使命。巴士达的朋友兼战友、使团秘书韦努耶先生和蒙托邦将军指派于我的年轻步兵军官布尔布隆先生将与我一起负责保管和护送巴士达的骨灰回国，届时我将亲手交到您的手上。

夫人，请相信……

1860年12月15日我离开广州返回香港，乘坐“杜舍拉”号船前往苏伊士。

18日我们离开香港。——22日，抵达马尼拉，在菲律宾群岛上，皇帝使团受到了西班牙当局的热烈欢迎。

1861年1月5日，我们抵达新加坡；17日抵达加勒角，海港深处我们还能看到几个月前让我们的日常用品全部付之海底的“马拉巴尔”号船桅。

2月1日，我们抵达亚丁湾；12日抵达苏伊士；15日抵达开罗，法国特使还成了开罗总督府总督赛义德巴沙先生的座上客。

18日，我们乘坐幼发拉底河流域皇家邮轮离开亚历山大港，途经马耳他，于1861年2月25日抵达马赛。

我于4月23日离开巴黎，一切都在一年时间内完成了！我的

外交生涯始于 1823 年，在这漫长而辛劳的岁月结束之际，能够成功地履行一项外交史册上没有先例的使命，一项由于其成果巨大可能成为人类历史重要里程碑的使命，我是多么高兴啊！

葛罗男爵



附 录

选自新河村所发现的档案

1860 年 8 月 21 日

人们可能还没忘记，北塘登陆不久之后，联军占领了位于白河左岸的要地新河村，河两岸及入口处均有修筑得不错的防御工事，这条河从北直隶湾一直通到通州，几乎直通北京的大门。

联军发起猛攻，让之前驻守新河村的人数众多的敌军匆忙逃窜，慌乱中无暇带走这些保存完好的中文资料。我在这些资料中挑选了一部分重要内容让人翻译且刊登于此，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深受中国皇帝信任的政府专员是如何向皇帝汇报中国和法、英两国之间正在商讨的微妙问题的。

第一份资料是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投递照会办理情形折。他是到上海负责处理外交事宜的皇帝特派专员。信中提到了布尔布隆和卜鲁斯就 1859 年 6 月大沽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得到满意答复的两份最后通牒，以及贺布将军建议用武力强行打通白河通道，让卜鲁斯沿河直抵北京，交换 1858 年 6 月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

第二份资料是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有增兵攻津

之讯著周密布防及勿令俄船近岸并密拿由京去北塘之俄人等上谕。

第三份资料我个人认为最重要，是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严防海口酌量布署情形折。皇帝的这两位重臣好像怀疑法英两国图谋不轨；并且指责何桂清向北京转达最后通牒而没有正式回绝法英特使的行为。在起义军攻占总督府衙所在地苏州府^①后，这一备忘录或许起到了致命的作用，尽管他年轻有为，深受皇帝宠爱，统辖4千多万人口，并处理外交事务，他仍然被处斩首。

其他资料也十分重要，属机密文件，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外国天真的认识，由于缺乏基督信仰，这个地球上的古老民族仍擅长背信弃义。

1860年8月12日，在新河村司令部档案中找到的中文资料。

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投递照会办理情形折。

臣何桂清跪奏，为接收英、佛各酋照会大学士公文，意在胁制夷商，使其不为我用，恭折由驿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上海夷情及华夷各商力图转圜缘由，于正月二十七及二月初四等日先后专折驰奏。兹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钦奉上谕一道，仰蒙圣主指授机宜，曲全大局，跪诵之下，莫名钦服。伏查夷酋所拟八条，经江宁藩司薛焕逐层辩驳，交给华商转向开导以后，夷商允俟从缓再商。适因大江南北军务同时吃紧，苏常一带均形震动，诚恐民情滋惑，是以薛焕暂缓起程。嗣据署苏松太道吴煦、候补知府蓝蔚雯密禀，华商续向夷商探询，该夷商等佯称卜鲁斯万分执拗，一闻劝其不可用兵之语，便称我行我法，不为尔等所愚，且甚怒天津诱其中计。我等虽愿意息事，一时难以劝

① 两江总督府在常州。——译者注

令就范。现又接到本国来信，因佛国添兵，英兵亦有续调等语。华商答以佛夷添兵是欲生事，焉能请我撤防。前拟八条，若非设法议改，亦断不能转禀乞恩。夷商复称，议和之举，出自该商等保全贸易之见，揆卜鲁斯私意，必欲战胜胁和，可以惟所欲为。若能勉允，我等所请八条，或者尚可转圜，迟亦恐来不及。华商又访诸此外各夷商，所言大抵相同等情，并钞录新闻纸禀呈前来。臣查新闻纸本系无据之词，亦未必尽属子虚。所称英、佛添兵，不可不防。且英夷志在天津，佛夷欲占舟山，即定海厅之说，与前次探报，大略相符。此外封港阻漕等谣，上海传闻，日日有之。虽遽难深信，然卜鲁斯复与布尔布隆狼狽为奸，真情实属凶狡。惟夷商所拟八条，诸多窒碍，而该酋因闻各路军情吃紧，一时难以化解。若拒之已甚，转无可乘之机。

现蒙圣谕，准其仿照米夷，进京换约。正拟飭令薛焕亲往会办间，续据吴煦等具禀，英酋前有赴津投文之说，经夷商劝令即在上海投递。旋与佛酋密议多日，即于二月十七日由英夷威妥马、佛夷梅尔登送到卜鲁斯、布尔布隆照会信函各一件，转呈到臣。内各有照会大学士公文一件，请为转递。臣不敢拘泥，当将照会折阅，所言甚为狂悖，可恶已极。英酋首辩天津之役并非该夷肇衅，欲令中华认咎，是欲我为之文过也。又言不驻京城，虽经额尔金奏准，后因天津见仗，该国王复行改议。是欲借口翻异，彼既可改，则我亦可改也。其赔兵费，以所请各款照办之迟速，定数目之多寡。是空言要挟，彼可索费，我亦可索费也。惟仍以进京换约，以礼优待为请。其情概可想见。佛夷所请四条，专重赔偿兵费，而又以驻京挟制，余与英夷大略相同。

又据吴煦等密禀，探闻该夷等兵船实已陆续遣发，又畏我天津兵威，是以先递此文，不过自明兵端不自彼开起见。此又卜鲁斯自

占地步，恐将来再有败衄，该国王自必添兵援应，并欲以此胁制夷商，使其不为我用之诡计。佛夷本非肇衅之人，大抵随声附和，说上年米酋华若翰在京，桂良等告以天津之仗非出自佛酋本意，且佛夷兵船不多，早邀圣明洞察，该夷谅有所闻。第该酋等自天津滋事以后，从未言及换约，今忽有此文。臣已分别照复，允为转递。该酋等既有三十日内等候大学士回文之说，其三十日之内，或可不致决裂。相应奏请训示遵行。一面遵旨飭令薛焕先行前往上海，会督吴煦等密谕华商，笼络夷商，为设法铃制之计。

海运第四批漕粮，计期已将兑竣，臣已会同抚臣徐有壬，密飭薛焕、吴煦等侦探夷情，与苏藩司主王有龄斟酌办理，以重正供。上海英夷兵船二月初三日以前，共存六只；初三以后，共有进口兵船六只，出口兵船五只；出口之船探有两只北驶。佛夷兵头，称闻已到香港，有不日至上海之信。佛夷梅尔登自吴煦等将撤防索费两事回复以后，亦未复来理说。

除仍会同抚臣督飭薛焕等设法羁縻，相机妥办，一面密探该夷举动随时具奏，并将该酋等照会大学士之文，封送军机处听候训示外，理合恭折密奏，并照录新闻纸一件，及往来照会信函四件，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有增兵攻津之讯著周密布防及勿令俄船近岸并密拿由京去北塘之俄人等上谕。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英、佛各酋，呈递照会，意存挟制，并抄录新闻纸呈览一折。英、佛各酋，呈递大学士公文，有欲令中华认咎，派员赴津迎接，及长驻京城，赔偿兵费各节，大致相同，所言狂

悖已极，已由军机大臣，照会何桂清，转复该酋矣。所递译出该夷新闻纸，有英、佛增兵共有三万之众，携带炮械等具，仍攻天津，并有于北塘左右，觅得水势深处登岸，直抄津口炮台之后等语，虽不足深信，然卜鲁斯与布尔布隆，狼狈为奸，其情凶狡，所言添兵及登岸攻我炮台之后，亦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恒福，相度形势，妥为布置，务使防御周密，计出万全，方操胜算，毋涉大意。原折及所呈新闻纸，著抄给阅看。

俄酋伊格那提业幅，因吉林地界一事，不允所请，呈递照会，有兵船数只，欲来北塘，并有俄酋书信，求为由京送至上海等语，当经给与照会，将原信发还。现届春融，如有俄夷兵船前来北塘，僧格林沁等，即告以原定和约，并无兵船前来之语，所立专条，系海口无事之时，方准俄夷由北塘行走。现在海口设防，若随带兵船前来，则各国言语像貌，无从辨认，且恐别国冒充滋扰。倘被官兵误伤，反失和好，勿得在海口逗留，致多不便。该夷若以解送枪炮为名，驶至近岸，著仍遵前旨，令在拦江沙外停泊，由内地另派小船，搬运进口，仍当严密防范。至在京俄酋声称派人前赴北塘，难保不别生诡计，如果有俄夷由京来至北塘，著该大臣等严密查访拿获，派人解京，毋令窥探虚实，是为至要。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严防海口酌量布置情形折。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相度地势，妥为布置，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何桂清奏，英、佛各酋呈递照会，并抄录新闻纸，有英、佛增兵共有三万之众，于北塘左右登岸等因。钦此。查英、佛

各酋所称增兵三万，固不足深信，亦不可不加意严防。北塘虽未设守，而左右皆系盐滩，该夷登岸不易。即使冒险越过盐滩，北塘后路现有马队各营，该夷亦不能直抄炮台之后。夷兵果有三万，现在马步兵力，加之逐层布置，足资抵御，可以仰慰宸廑。至俄酋欲派人前赴北塘，奴才等已密委妥员在天津大沽、芦台、营城、北塘等处，不动声色，留心密查。如有俄夷前来窥探，一经拿获，即行派人解京。

再，查英、佛各酋自上年五月受创之后，初未尝不即图报复，揆其兵力有所未逮，更恐再经失挫，难以为国；欲就我求和，既虑我索兵费，又虑海外各国从此轻侮，是以屡经风示夷商，冀其转圜，而仍以虚声恐吓，借此不失体面。此等情形，已属显然者一也。上年该夷携带兵船炮火，驶至海口，系属有心以兵力要挟，是以明知大学士桂良等在上海守候多时，并不往见，惟恐窥破奸计，预为隄防，不能逞其狂悖。本年果欲增兵报复，上海必不稍露风声；节次何桂清奏报，探闻夷兵或称二万五千，或称三万，兵船若干只，炮火若干位，上海添盖棚厂，不日兵到栖止，某商认办面食，某商认办牛肉，明目张胆，随意宣扬，至愚之人，计不出此，况非至愚。夫兵行诡道，千里袭人，则当衔枚卧鼓，出其不意，攻其不防，焉肯使人知觉，豫作准备。是其有意求和，不肯先出诸口。此等情形，已属显然者二也。夷商夷酋，何所区别，言未出口，他人难以窥测。夷商窥测卜鲁斯之意，欲请中国先行给予一文，嘱其弭兵，约其何时赴津，何时进京，兵费两不赔偿，卜酋必欲以礼相待，方能照办。此即卜酋有心就抚，授意夷商，而又将万难准行数条故意刁难，欲使我先行给伊照会。此等情形，已属显然者三也。上海道吴煦等历次与夷商辩论之词，不抗不卑，颇为得体，且办理一切，均合机宜，惟此次接收该夷给大学士照会，并允

其转禀代奏，办理似为失计。无论所言如何狂悖要挟，总是照会先自彼出，则我措词立论皆易着手。该酋在上海将及一年，大言恫吓，虚壮声威，百计图维，诡诈毕露，因我不堕奸计，万分情急，不能忍耐，是以另生小巧，专给大学士照会，以避自彼求和。且该夷二十年来养成骄性，一旦望其俯首贴耳，摇尾乞怜，是诚不能，所以照会内仍不免有狂悖字句。在吴煦等当告以两江总督系中国重臣，又系办理夷务钦差，此文不能寄京，即当送至钦差办理。该大臣接到此文，立即答复，先责其上年不遵理谕之非，然后婉言训斥，妥为安抚。果能悔过抒诚，许以奏请恩施，免交兵费，仍准照旧通商。若不愿和好，仍要报复，前在大沽受创，自应再往大沽决战，方不失尔国体面。战胜则任尔所为，倘再挫败，毋貽后悔。如此答复，亦断不至决裂。该夷势必强词置辩，于渐次就我范围之中，仍寓要求谋利之意。无伤大体而有利于彼者，不妨俯允数条，即可稍如其意，又足全其体面。息兵就抚，在此一举。过此机会，办理又费周章。此次该夷固属不能忍耐，先出照会，仍借此尝试，看我如何答复。今该大臣与该夷照会，遽允代为转递京师，未免示之以弱。该夷既经窥破，从此意外要挟，不一而足，稍拂其意，必以兵力胁迫。两江总督何桂清接奉批折，自应照会该夷，而该夷复文，势必另有一番要求。可否飭下该督臣体查情形，倘该夷情词恭顺，所请似可俯允，自当代奏请旨。如仍前狂悖，所请难以准行，应即飭驳，不得迁就拘泥，致令该夷视为轻易。

至上海系通商之处，该夷不肯滋扰，势必沿海窥伺。大沽布置地势，该夷尽知，非计出万全，不敢轻举妄动。即或驶至，不过停泊游奕，假以投文为名，窥探虚实，暗施奸计。奴才等公同商酌，夷船驶至投递照会，概不接收，令其仍回上海，告以该处有专办夷务大臣，看其如何举动。现在惟有将各处炮台营垒，严密布置，以

期稳固。惟土性不坚，干则酥裂，一遇阴雨潮浸，即行脱落，必须不时修补。现当防务万分吃紧之际，明知饷项不能充裕，亦不敢顾惜经费，有误事机。本年大沽、山海关防兵加添数千，各月支饷银甚巨，幸蒙皇上天恩，由部拨解银二十万两，连直隶设法劝捐、藩库筹款接济，计可放至四月。四月以后，尚在无着。奴才等赶紧设法筹画，尽力劝捐，能否捐有成数，再行具奏请旨。

再，二月十一日奴才僧格林沁承准军机大臣转传二月初十日奉旨：都察院山东监生谭维清，以地城图说等因。钦此。奴才等详加披阅，各项地城图说，尚属详细，所论不为无见。至大沽海岸土薄地湿，潮水长落无常，能否按照图说制造，应令谭维清酌量试办。二月二十七日由地方官将谭维清解送到营。奴才等悉心谘询，并令周历海岸，遍观营垒，应如何制造地城，及布置一切有无未尽妥善之处，令其据实指出，以凭采择，不可稍涉拘泥，亦不可意存缄默。旋据禀：海口洼下，地城不宜，夙愿虽了，无益实用。海口地势，二尺即水，地城之说，难以措手。恳请飭令回籍等语。既据察称地城不能试办，应毋庸议。惟海口形势，炮台营垒，该监生均已周历遍观，可否即令回籍，奴才等未敢擅便。伏候训示遵行。

所有奴才等遵旨严防海口酌量布置各缘由，谨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柏贵致北直隶总督恒福函。

柏贵念及与恒福总督大人的旧交，感激大人让下官在镇压南方起义失利后免遭惩罚，奉皇帝之命前往天津三沽地区（大沽、盘沽、塘沽），受僧格林沁统辖负责指挥白河北岸军队，内心十分不安。蛮夷战船数量过百，已于十月十五在三沽地区沿岸停靠；十七日，占领北塘，展开军事行动。联军已有数十人伤亡，而我军损失很

少。皇帝处境安全；但蛮夷很难对付，他们不愿就此屈服。

写信人现在新河村，这是白河北岸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一个村落；目前能做的就是尽力防卫，无论如何都不可放松警惕。

咸丰十年十月初六。^①

恒福和柏贵的奏折。

启奏陛下，被派去会见美国蛮夷的官员已回来复命。据说法英两国打算立刻发动战争，已在北塘的蛮夷部队打算向我们发起进攻。

恒福和柏贵恳请陛下批阅以下奏折：

“十月十七日^②早上5点左右，冯甘福副将带着美国蛮夷的信函返回营地，信函中说此事无回旋余地。美国蛮夷还说，北塘地区现有5000广东兵和3000黑人（英国人的印度兵），均蓄势待发准备从背后攻击大沽炮台。

早上5点左右，瞭哨来报，有一支人数近千的蛮夷军队从北塘出发，一些士兵和马匹拖着大炮，朝盘沽进发。臣等从炮台瞭望，看到蛮夷架设枪炮，还不断往膛里填充子弹炮弹；而中方将士在舒敏见、周明、潘朴和佩清等护卫和舒亭、常成番偏将的陪同下，率领属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伊克昭盟的科尔沁、齐齐哈尔骑兵。（内蒙古49旗共分为6盟）

我方3名士兵阵亡，一些马匹受伤。蛮夷多名士兵和骑兵或受伤或阵亡。当日，蛮夷士兵前进近十里路，向我方炮台进攻，必须将其击退。现敌军已退回北塘，臣等提议再次致函美国蛮夷，请其

^①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译者注

从中劝诫法英两国停止战争，与中国握手言和；但战事已发，若想双方和颜悦色进行商谈，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旦蛮夷方面有新情况，或者收到美国人的答复，臣等将立刻启禀陛下，并恳请陛下批阅美国蛮夷的答复及恒福的回函。

此外，臣等致函美国蛮夷时命人一并送去一些甜瓜和其他水果……”

天津道台致柏贵的非正式信函节选。

无日期

苏根据刚接到的命令，要在阳淮川上建一座桥，故派人驶来百艘船只。总督收到皇上圣旨，不管怎样都要议和。昨日，总督已致函英国特使，希望停止敌对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答复。

根据柏贵的要求，随函送上 50 顶帐篷。

柏贵致恒福函。

无日期

感谢恒福阁下数次来函。

十月二十三(8月)^①，1 点左右，下官看到蛮夷从北塘出发，骑兵和步兵共千余人。其中步兵朝一茶园前进，骑兵则朝新河村前进，离各自目的地路程相当。

新河村的驻军群情激昂，迫不及待请缨出击；但由于总督已着手与蛮夷议和，柏贵认为在敌军尚未动手之前，不宜先行开火。不久，敌军退回北塘。

现将之前呈交军机大臣的报告连同此函一起呈送恒福总督，此

^①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译者注

外，捷报中，下官不忘把总督大人的名字写在显眼处，而把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二行。

十月二十四日^①，恒福总督致柏贵函。

写信人刚收到贤弟来函，对你在面对蛮夷战船所作所为时表现的克制十分赞赏；这样做也是因为收到皇上要求和蛮夷和解的命令，故不得率先向蛮夷开火。眼下的蛮夷像狗和羊一样温顺……

他们先是举着停战旗，现在又不承认曾想议和。前天，总督致函蛮夷，但没有收到答复，故不知他们打的什么算盘。尽管昨日收到皇上圣旨，命其不可鲁莽生事，赶快签订和平协议，但皇上同时还命僧格林沁严加防范，担心其不够警惕。因此，总督认为若蛮夷只是出城卖弄武力，而不率先开火，我方军队应加强防守并严加监视。总督认为我方军队不可率先展开军事行动；但若蛮夷狂妄自大，继续前进，那么就该让他们为其鲁莽付出代价。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白白流逝。总督认为途经新河村前往北炮台入口路上，此处附近有我方军队军需用品库，故新河村是十分优越的中心位置，切不可让敌人靠近。我军亦不可以任何理由过于靠近敌军，让其失去自由行动的空间。如果敌人占领新河村这个要地，必将围攻我军四周设防的兵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若蛮夷意图围攻我方，必须从正面和两侧将其围住，击退其勇猛的先遣队。这是制胜唯一法宝。

总督已将收到的指令转寄于柏贵贤弟，谨希望你更好地做出决定。贤弟不可犹豫，亦不可困惑，而应在所有问题上和僧格林沁保持一致，尽管总督已开始着手议和，贤弟亦不可贻误时机。若贤弟违背僧格林沁命令，总督所担负的责任让其很难保全你。对于贤弟

^①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译者注

你的军事天才和在此危急关头的判断力，总督完全有信心。

署名：不才^①兄长恒福叩首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60年8月)^②。

附言：在方驹陪同下前去送信的蒋恺回到了大沽。他带回了英国蛮夷首领额尔金的回信；此人说话晦涩难解。总督将前往司令部与总司令商议，一旦有新的决定将即刻通知柏贵贤弟。

恒福致柏贵函。

无日期。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点(1860年8月)^③总督收到柏贵贤弟的来函，信中告知新河村是个要地，要加强塘沽的防卫，它是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总督很佩服柏贵贤弟的预见性和警惕性，贤弟关于如何让蛮夷同意和解的建议已初显成效，关键在于让蛮夷从心里臣服。等到蛮夷擂响战鼓向我们进攻时，应给予严厉打击。若俘获蛮夷首领，不可将其释放。总督认为目前蛮夷气焰嚣张，若只是得到一点小教训，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总督数次收到皇上命令，要求迅速与蛮夷达成令人满意的和解协议；但蛮夷生性狡猾且不愿屈服，三言两语怎能令其臣服于我大清国威？问题是要知道两军对抗时到底谁更厉害。无论如何，断不能现在眼睁睁看着时间流逝而任由蛮夷为所欲为。新河村和大沽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若蛮夷对这两个地方发起进攻，或者胆敢冒险靠近这两个地方，则必须实施严厉打击，让蛮夷感受到我大清将士的作战才能。总督十分担心河北岸防守薄弱，好在贤弟军事才能卓

① 不才是中国人的谦称，此处指总督自己。——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译者注

③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译者注

越，如同中国的万里长城一般令人完全放心。

贤弟打算在给皇上的捷报中添上不才兄长的名字，而只把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二位。尽管这在贤弟看来只是排名先后的问题，不必拘泥，但胜利来临之时，总司令必将论功行赏。

昨日1点左右，蛮夷约三四百人再次从营地出发，直抵茶园后才返回北塘。这正如柏贵贤弟所料，若未遇抵抗，蛮夷将自动退回营地。总督怀疑他们有什么阴谋，命人密切监视其行踪。

恒福(签名)

柏贵致恒福函。

柏贵已收到总督大人的来函，信中说若两军遭遇，不可按兵不动贻误时机。此函充分证明了总督大人的英明远见，柏贵为之折服。柏贵深知率军打仗最重要的是要鼓舞士气。若奖赏丰厚，将士必个个勇猛。因此，必须昭告北岸营地各色人等，不管是否为军人，凡俘虏蛮夷首领者，赏白银1000两，俘虏普通士官者，赏白银50两，俘虏一般士兵者，赏白银5两，带回一个敌人首级赏白银4两。此外，英勇善战者将被引荐给皇上。

请注意，俘虏蛮夷首领者，赏白银1000两，俘虏普通士官者，赏白银50两，俘虏一般士兵者，赏白银5两，带回一个敌人首级赏白银4两，昨日我见到了总司令，但并没有和他提到这项计划。

岗哨也将获得白银奖赏，英勇善战者将择时被引荐给皇上。此通告已发往所有驻军营地。

一旦这些慷慨的奖赏得以实现，将士定当万分勇猛。岗哨应该在获得金钱奖赏的同时，得到晋升，当然他们的金钱奖赏不得高于所列的最高额。

总督希望总司令赞同此项计划。